

炎黄春秋



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花园口决堤60周年祭
湖南“闯王陵”是昂贵废品
阎宝航与他的“阎家老店”
在鄂西受错误处置时的陶铸
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中国情结
戊戌变法的夭折

6

1998

总第75期



《阻归图》稿

唐以书旌超俗，肃宗初即诏下诏征超，超还至子而，王侯以下皆号泣迎，"保以信如父母，诚不可去。"至相超写帅。

1964年博物馆汉唐时期陈列，余奉作《阻归图》，图以唐以书旌超俗和程兰及得克松瑶干出土文物照绘与木乃伊头所绘《阻归图》成并陈列于博物馆展厅，十年浩劫中，《阻归图》被兵团斯某窃取。

至忽二十七早，余今年近古稀，在西藏拓墨笔耕近四十春秋，手至余百余个卷，于废纸中拾得《阻归图》稿，疑之不胜今昔之感，深庆新图尚存。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夜补记数语。

唐之

《阻归图》作者徐晋文介绍，详见本期《黄河之滨晋文山与风情》一文，左为一批文字即画中作者的题字。

1998/6 (总第 75 期)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镗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 价: 4.80 元

春秋笔

- ②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 (上) 杨奎松
- ⑭花园口决堤六十周年祭 马仲廉
- ⑳何忍“南昌”舰永沉海底? 王 彦

求实篇

- ⑳湖南“闯王陵”是昂贵的赝品 王戎笙

英杰谱

- ㉔阎宝航与他的“阎家老店” 嵇钧生
- ㉓有云水襟怀的续范亭 屯 棵

陨星篇

- ㉕在鄂西受到错误处置时的陶铸 聂菊荪
- ㉗不拘一格的项南 钟沛璋
- ㉘陈毅赋诗悼念亡妻肖菊英 陈干群

人海浪

- ㉙我所拍摄的“文革”纪实照片
主人公任仲夷 李振盛
- ㉚蹲过敌我四次监狱的贾植芳 孙觉民

轶闻录

- ㉛田家英临终坦露心境的见证人 曾 自
- ㉜重读 1940 年延安一次大会的
名誉主席团名单 于光远
- ㉝购军需巧遇许厚钰 王超北

赤子心

- ㉞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中国情结 耿一民

时代风

- ㉟女科技实业家雷菊芳在西藏 庄志霞

古今谈

- ㊱我看“对敌狠，对己和”及其他 李 庄
- ㊲师复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刘中刚

文藝园

- ㊳近作六首 王福民
- ㊴徐庶之泼墨天山写风情 韩文辉

古镜台

- ㊵戊戌变法的夭折 张健伟

毛泽东发动 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上)

● 杨奎松

1940年秋冬,在判断蒋介石有无联合日本夹击八路军的阴谋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几经往复,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先发制人,集中15万精兵进入甘肃与河南,打破日蒋夹击的军事行动计划。紧接着,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大部分牺牲,部分被俘,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毛泽东再度提出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采取攻势的策略,并多次告诫莫斯科不要再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援助,双方为此又一次发生重要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考虑根本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既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之举,也是毛泽东这时不得不为之事。

毛泽东尖锐批评“言必称希腊”,主张对俄国人的话“不可尽听”

自从共产国际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中共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理论上又形成了足以对国共关系乃至中国革命起指导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工作得可谓得心应手。但皖南事变的发生,尤其是在此前后与莫斯科之间的激烈争论,不能不给毛泽东敲了一个警钟:双方的争论与其说是一时的政策分歧,不如说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相差甚远,既然如此,究竟能不能与莫斯科始终保持一致呢?

如果不能,后果又将如何?

国共合作三年多的实践表明,国共两党可谓格格不入,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不采取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不能取得。因此,毛泽东已渐渐在怀疑,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那些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统战指示,是否正确。为什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能够取得支配地位,为什么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能够发展壮大,而项英领导的部队在皖南竟会几乎全军覆没?在他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华北和华中方面坚决实行了独立自主的斗争策略,而皖南的项英等人却继续拘泥于十二月会议的精神,作茧自缚,畏首畏尾,犯了右倾错误。

依据这一观点于事变后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明确地指出,新四军的失败首先就在于,项英“对统一战线的了解,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

项英的错误是怎么来的?还在1月15日讨论皖南新四军失败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讲过,这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就

已经在倡导“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主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矛头所向，自然是党内那些赴过苏、留过洋，善长引经据典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顾虑不是多余的。自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些留苏学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留苏学生一多，弥补了过去党内理论基础薄弱的欠缺，但同时也带来了教条主义盛行的问题。而让毛泽东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当中留苏学生不占多数，但对于一个视自己的意识形态为生命的党来说，这些熟悉理论教条的留学生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却非常之大。1944年整风运动临近尾声之际，康生曾经公开讲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是搞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这件事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它表明，在延安整风之前，对于一般党员干部来说，王明等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确实有一点理论权威的架式，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理论成就的党的领袖，也不能不对他们敬而远之，尽可能不去涉足他们的“专业领地”。

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国门也没有跨出去过，这显然是一个弱点。正因为如此，当大批留苏学生开始在江西苏区指手划脚之际，毛泽东就已经痛感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不足了。因此，正如后来人们从回忆录所看到的，在江西时的他已是“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

问题是，发愤读书，乃至发愤写书，也不能让那些留苏学生从内心改变唯书唯上的思考习惯。这里讲的“书”，指的是俄国版的理论著作；“上”，指的是来自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至于毛泽东的书和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在其中的。

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已接连写了《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文章

和小册子，但并没有得到负责理论报刊宣传工作的领导人的足够重视。《新华日报》竟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出来后，负责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志也“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与时事教育之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已蔚然成风。皖南事变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公开批评这种现象说：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的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研究上”，“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专门唬那些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

在这个时候的延安，谁会“言必称希腊”？什么人会把自己当成“钦差大臣”？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这里所说的“希腊”，无疑是指苏联；而能够成为对党指手划脚的“钦差大臣”的，自然也只有来自莫斯科的人。

博古犯错误，乃至项英犯错误，在一贯重视实践、轻视教条的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理论不联系实际，说到底就是不从中国革命的利益考虑问题，一味地照莫斯科的指示或苏联的模式去做。外国人如此也就罢了，如果中国党内部一些人也这样来考虑问题、决定政策，“言必称希腊”，习惯于唯莫斯科是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势必出现严重问题。

如此认识，毛泽东当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但是，在与共产国际关系还相当好的时候，在中共的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时候，毛泽东还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以免惹得莫斯科胡思乱想。而皖南事变之后，在与莫斯科发生明显争执以后，考虑到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微妙的上下级关系，和中国党已经相当壮大的现实，依照毛泽东的性格，继续容忍党内这种唯莫斯科是从的风气发展下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毛泽东1941年5月14日给周恩来的一封批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电报，很能够反映出他那时的心态。毛在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要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中共怎么做自有中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同干部谈话

共的道理，要他“不要随便乱说”。毛同时告诫周等一定要明白：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

几天后，即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公开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大谈“很多留学生”对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很明显，毛泽东是有备而发的。

毛泽东成功“打通”博古、张闻天的“思想病”，路线错误基本认定

在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话后一个月，还在担心是否存在莫斯科干预中国党内事务的时候，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准备不足，苏联的形势一时间十分

严峻。

战争刚刚爆发，苏军情报机关就侦察到在华日军有向外蒙古边界集结的迹象。由于德日结盟，莫斯科急忙致电它在延安和重庆的代表，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地区的八路军迅速采取牵制行动。对此，毛泽东明确地实事求是地表示，我军之配合只能限于情报和破路两个方面，因“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

在以往苏联受到帝国主义威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以“保卫苏联”，甚至是“武装保卫苏联”为号召。如今，当苏联急切需要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时候，毛泽东却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在俄国人看来低调的、令他们愕然的反应。他们显然感到不可思议。然而，这正是毛泽东与过去中共领导人不同的地方。也正是因

为这一点，他与莫斯科的关系迟早要走到这一步。

既然事至于此，改造那些“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甚至“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拿着教条来唬人的领导人，肃清党内对莫斯科的盲目迷信心理，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了。有过江西时期挨整的痛苦教训的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江西挨整的经历，毛泽东始终记忆犹新。江西的红军和根据地是他和大批当地干部千辛万苦地创立起来的，一批自称代表“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来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清除了几乎所有原来的领导人；再一个“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左”政策，又把红军和根据地弄得精光。还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激动地提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至今都还没有给予平反，这是说不过去的。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相反，过去中央整个干部政策都是错误的，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要不得的。博古同志来到苏区后，对中央苏区原来的领导人统统加以拒绝，被排斥在外的竟有24人之多，这完全是一种宗派主义的行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不够的。

遵义会议开过不久，博古已经下台。在博古部分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又主动出来承担责任之后，毛没有能够继续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皖南事变之前，他再度试图提出总结和清算博古等人在江西时期所犯错误的问题。为此，他在1940年下半年多次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谈论这一问题，得到了包括王明在内的多数政治局成员的响应。因此，博古11月从重庆回到延安之后，王明很快向博古转达了毛泽东对他不愿意坦率承认过去全部错误的不满态度，促使博古不能不正视自己过去错误的严重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数领导人都同意就江西时期的领导责任问题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和讨论，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给全党

一个交待。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江西时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他指出：“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博古坦然表示愿意对当时的错误负责，希望有机会时能够作出检讨。与会者大都赞同毛的说法，并希望就这个问题进行历史的总结。当然，会上也有不同意见。张闻天就表示说：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由此可知，要解决江西时期的问题，仅仅批评一个博古显然是不够的。

1941年春，毛泽东已经不止一次地开始批评张闻天主持的宣传教育工作。5月19日他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的公开讲演，尖刻批评当时延安的宣传和教育“理论和实际分离”，“只知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其矛头所向，显而易见。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措辞尖刻，态度激烈，不可避免地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了震动。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讲话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因此，不难想象张闻天听了报告之后，会如何坐卧不安。

张闻天为此几度私下里向政治局其他领导人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看人有些走极端，一件事办得不好就什么都看不上。经过其他人的劝说，张闻天终于下决心与毛泽东当面交换意见。第一次谈话事先没有约好，毛泽东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态度平常，几乎没有对张展开批评。几天之后，毛泽东和任弼时、康生、陈云等就张闻天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取得共识后，他约好这几位领导人一同找张闻天谈话。毛泽东历数张闻天过去在政治上的不坚定、态度摇摆的情况，进而严厉批评张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听不

进不同意见,对中国的事情一窍不通,却自视极高,热衷于空谈。

尽管毛泽东的批评相当尖锐,但这是以信任的态度当面把意见讲清楚,仍旧让一直感到委屈的张闻天受到了感动。因此,除了对毛泽东所说的个别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稍加辩解以外,他相当痛快地接受了毛的批评。事后,张在行动上也确有改进。这种情况显然也使毛泽东对根本上“打通”党内这几位“犯思想病最顽固的”领导人的思想,开始有了相当的信心。

王明一时兴起,揭穿一个秘密,毛泽东转而决定澄清党史问题

7月1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反对任何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坚决杜绝任何小组织和派别活动。

紧接着,中共中央根据毛的建议,进一步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求全党树立立足中国革命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系统考察江西时期错误路线的根源,开始收集中共“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从已经搜集到的大批临时中央制定的“左”倾文件中,他更加认定这批留苏学生的错误是有系统的,是盲目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既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也是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据此,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于9月10日开始举行党风学习的专题会议,讨论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在这次会议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

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的,党风则是宗派主义的。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面提倡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提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消过去的所谓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是理论家。

毛泽东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都紧接着表示了态。张主动承认:过去的错误,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共产国际把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一定要补课。博古也表示,他应当对1932年到1935年之间的错误负责。他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是些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来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四中全会上和王明等一道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只是站在更左的观点上,用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罢了。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

唯一让人有点儿不可理解的是王明。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犯有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竟无动于衷。相反,他自信江西时期博古中央的错误他不仅没有沾边儿,而且还有批评纠正的功劳,因为毛在六中全会上也承认,他对中国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功不可没。至于毛提到的抗战初期的右倾,他自信也与他无涉。那毕竟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要他承认错误,岂不等于说共产国际犯了错误?

因此,在邓发检讨之后,王明当天只作了一个自我表白式的发言。他肯定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好处,承认自己在莫斯科学的都是些洋教条,但强调自己回国比博古、张

闻天等人也都早,因此参加实际工作时间长些,工作作风已有些转变。以后回到莫斯科,能够看出博古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同意他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反对他们在五中全会提出两条道路决战的观点,并且较早地提出了实行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套办法,只是当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还不够,对国内各派人物的情况还不甚清楚。以后一直忙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各种领导工作,弄得既没有理论又没有实际。好在1939年后开始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最近又参加边区管理工作,应当能够学习实际工作,纠正思想中的主观主义。

这次会议接连开了三天,直到12日告一段落。本来,这次会议并无深入讨论党的历史的任务,讨论内容只是要求与会者对照毛的报告,对照自己的问题;就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明确表态。会后,毛泽东准备在延安召开一个全党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出席表态讲话,在全党造成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空气。

想不到,因为没人把矛头指向王明,王明自我感觉太好,9月12日下午,他忽然一时兴起,竟揭发批判起他自己的那些同学来了。他先是批评李维汉自我批评的态度不诚恳,想马虎过去。然后批评博古、张闻天等人,说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去,先是夺了毛泽东的党权,转而又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竟连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也给夺走了,说他早在莫斯科时就对这件事深感不满了。发言到最后,他突然又一本正经地提出,他还要揭穿一个“秘密”,说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

这个“秘密”顿时在不明真相的部分政治局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并且也极大地刺激了毛

泽东本人。

几天后,原定的全党动员的计划和研究自“六大”以来的党的决议的提议被暂时取消了。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一场触及灵魂的党史问题大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内部迅速展开了。

王明断言,他和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看法,毛泽东的政策太左

1941年9月29日,中央学习组开始深入检讨江西时期党的历史问题。博古、张闻天、李维汉、邓发等人先后发言,具体说明自己当年所犯错误的情况。但多数发言者显然对王明前次的表现颇多不满。

博古明确讲:自己所犯的错误确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后不作说明,也确有篡位之嫌,犯这些错误怪不得别人。但共产国际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当时是助长了这种错误的。

张闻天也承认:当时的路线的确错误,临时中央到苏区后也确有篡位问题,但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不打电报来纠正也是不对的。况且,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些事情上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

邓发表示:对于当时的错误,博古的确要负第一位的责任,李维汉、张闻天其次,但这些错误政策莫斯科是否也批准了呢?在夸大红军力量、断言党的路线正确等问题上,王明不是也同意了吗?

就连当时同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的康生也批评王明说,王明在莫斯科其实与当时国内博古中央也犯着差不多同样的错误,他在个别策略上有对的地方,但基本思想与博古相一致,这是应该承认的。康生还特别提到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问题,称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听劝告留在延安,非驻武汉不可,以及在武汉时期所犯的错误,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

在九月会议召开前，毛泽东的确没有把矛头指向王明的意思。7月31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接替任弼时负责西北中央局和边区工作；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等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每周开会两次。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毛当时对王明并无打击排斥之心。包括对张闻天和博古，毛泽东的态度也很明白，那就是，“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8月27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负责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干部教育、学校教育的办法，彻底打破目前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也显示出这时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中，尚无惩罚个人的想法。

王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对他抗战初期的表现不满，因此一直小心翼翼，甚至在张闻天、博古等人还没有意识到应该突出宣传毛泽东的情况下，他就在1940年5月4日破天荒地公开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演讲。号召全党要“始终追随毛泽东为毛泽东事业而奋斗”，肯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唯一正确政治方针”。如今王明又在12日会议上作如此表演，明显地是想进一步表白自己，以争取毛的信任。然而众怒难犯，这次他做得太过头了，终于引火烧身。

在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当中，最主

要的张闻天和博古等人也都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唯一没有认错的就剩下王明了。

9月中旬至10月初，毛泽东两度找王明谈话。第一次谈话是王明9月12日的发言引起的，毛泽东很想要具体了解王明所说的那个所谓篡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顺便委婉地提到了希望王明能够正视他在抗战初期所犯错误的问题。

第二次谈话是在9月29日会议之后，毛泽东约了任弼时等人一起，正式向王明提出，他在武汉工作时期犯有四个方面的错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态度问题；拒绝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问题；在武汉会战期间的形势估计问题；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问题。虽然毛泽东两次谈话的态度仍是商讨的口气，但过去在莫斯科整惯了人的王明却神经高度紧张，深感谈话的背后有什么文章。

还在九月会议之前，王明就曾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告诫博古：毛泽东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因此，他深信这回毛肯定是要借机会和他算总帐了。恰在这时，季米特洛夫于10月初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质询电，一连提了15个问题。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是针对皖南事变以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不妥协立场，和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苏联求援的冷漠态度而发的。在电报中，季米特洛夫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回答：面对日本



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陈绍禹（王明）、何凯丰、项英

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在华北地区加强进攻,中共准备如何改善国共关系?如果中共因为其尖锐对立的态度而破裂了与蒋介石的合作关系,还能与哪些人继续合作抗日?在苏联受到德国入侵的严重关头,中共准备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援助社会主义苏联?如此等等。

得知这封电报之后,王明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10月7日晚,当毛泽东找到任弼时、王稼祥和王明几个与共产国际较熟的领导人商量回电办法时,王明竟借着共产国际批评中共中央的机会,按捺不住地对毛泽东发起了反击。他断言,他早就与季米特洛夫有同样的看法,即中共中央目前的政策太“左”,是自我孤立。

据王明事后悄悄对博古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那边(按:指共产国际)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问题,后来就有文章的”。

经过一夜的紧张准备,在次日举行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毛泽东介绍了头天晚上谈话的情况后,王明底气十足地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最近共产国际来电要我们考虑如何改善国共关系,我认为目前共产国际提出这个问题要我们考虑是有原因的。我们与国民党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而且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固然反对我们,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敌人,但它也反对日本,即反对中国革命的民族敌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与他们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毕竟,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民族敌人是主要敌人。因此,即使在国共摩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是能够执行统战政策的,仍然是应当拥护蒋介石的。而我们现在军事摩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得过分了,对地主的政策搞得太“左”了,并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还把中国革命的民族革命任务,即反帝任务与反封建任务相提并论,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只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无疑是一种两面作战的路线,是要同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及其代表着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的。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自我孤立的政策。

对于毛泽东批评他在武汉时期的四大错误,他坚持认为:这里的许多问题,都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他只是转达而已。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因此他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缺点错误罢了。

由于自信有共产国际指示为依据,王明的发言多少表现了有恃无恐。但这回他再度错误估计了形势,“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任弼时、王稼祥转达季米特洛夫的批评,王明从此一蹶不振

王明的说法当即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反对。王明讲话时,不时有人插话。讲话刚一结束,凯丰、陈云等人就明确表示不能同意王明推卸责任的态度,指出许多问题的发生并非与王明无关,尤其是与中央的关系问题,是各种错误的根源,王明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王稼祥和任弼时关于共产国际尖锐批评王明的发言,完全出乎王明的预料,本来还决心仗着共产国际的电报与毛泽东一搏的王明,一下子被打懵了。

据王稼祥和任弼时介绍说,王明关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的说法,有许多不准确,有些关键部分没有谈到。如斯大林明确主张用军队创造自己的政权,主张搞游击战争;季米特洛夫强调现在不要谈领导权问题,当面告诫王明要与国内同志搞好关系,不论谁推举,也不要当总书记等等。另外,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因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都明确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

毛泽东显然已经和书记处的主要成员交换过意见,他对王明在这次会议上公开表露其反对自己的态度,表现得很冷静。他简单地说明了“我们”同王明之间的分歧。强调王明在武汉时期虽然还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但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许多原则性错误。我们等了他许久,

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过。他说,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目前双方面分歧的症结就在于:“王明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的让步太多,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毛泽东主张,鉴于王明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目前不能不迅速改变前此的计划,暂时停止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的讨论,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请王明说明他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供政治局会议检查讨论。

8日会议的结果,特别是王稼祥和任弼时讲述了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不信任态度,使王明如堕深渊,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使王明心脏病突发。原定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被迫延期。

10月13日上午,中央书记处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去医院参加医生会诊,医生们提出,王明目前的情况至少应当卧床休息三个月。王明亦托李富春转告政治局,请求休养期间不参加书记处工作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听说后,马上又派任弼时去医院看望,王明见到任弼时时,明确表示,他接受毛泽东在8日会议上对他在武汉期间错误问题所作的结论,即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他很抱歉暂时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了,但关于对目前时局的意见,仍可请政治局同志到他房间去谈,然后由政治局讨论,他病好之后再记录。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还是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曾拐弯抹角地向任弼时打听,季米特洛夫到底还说了他一些什么。

13日下午,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听取任弼时汇报王明生病的情况,同时由毛泽东宣布停止关于原定的讨论武汉时期王明错误的日程安排,并对前一段中央学习组讨论江西时期问题作一小结。毛泽东说明,王明错误问题暂以10月8日书记处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即肯定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是个别的,工作路线是对的。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则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

张闻天又次之,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至于其他领导人这一时期的错误,则属于不自觉的。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要从这次检查过去的讨论中得到经验和教训,要治病救人,使犯错误的人能客观地看问题,逐渐纠正过去的错误。他再度强调,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中国问题的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务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清算过去的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成员为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另一个是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审查委员会,由陈云牵头,成员为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通过了前此中央学习组有关过去历史的基本结论之后,毛泽东当即开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草案长约两万字。它在肯定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路线基本正确的情况下,明确认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间,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形成了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的思想特点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其突出表现就是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了解太少,“他们的唯一本领是引证马、恩、列、斯,作得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得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这条路线的组织特点则是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1931年未经任何法定机关的选举,仅依两个政治局委员指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且故意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表现在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打击一切上层、中层老干部,以及多少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其他干部,实行“钦差大臣制度”;表现在把中央领导变为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计的权力,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其所作

所为,是过去任何路线错误时期所未见过的。鉴于政治局多数已经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准备速战速决,于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一决议草案,结束有关苏维埃后期历史问题的讨论。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介绍,在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起草的决议草案结尾处,当时曾特别注明“1941年11月×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字样。

从毛泽东此时就王明问题所作的结论,和他起草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定性都可以看出,他对王明仍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即使是对王稼祥、任弼时在书记处会议上介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个人品质方面的种种批评,毛泽东也明确提议不要扩散,包括在政治局会议上也不必再讲。

先纵后收,斗争矛头发 生变化,思想问题意外变成 敌我问题

1941年11月1日,毛泽东指示各地高级学习组着重学习理论材料,包括《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季米特洛夫文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另有两部哲学著作、三篇与学习《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有关的苏共决议和文章,强调先从理论学起,包括要研究思想方法论。在反对唯书唯上,反对唯莫斯科是从的同时,又提倡仍要以来自莫斯科的文章和著作作为思想武器和理论依据,这既反映出毛泽东仍在小心翼翼地维持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这时仍旧多少认为,列宁、斯大林以及季米特洛夫等的著作在方法论方面更具权威性。

不过,仅仅着重于思想方法问题的讨论毕竟不是目的,讨论思想方法的关键在于使党的高级干部彻底转换观念,使他们从党的历史成败的比较中,从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11月12日,毛泽东在再发有关学习内容的指示时,其侧重点已经开始变化,决定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中共“六大”以

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要求理论材料只学习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与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其他着重于通读“六大”以来的83个文件,准备明春对“六大”以来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

12月中旬以后,毛泽东更明确决定要着重研究中共党史,强调各地应“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但差不多在整个1942年,毛泽东都没有决定把整个斗争矛头指向王明。他在这一年的2月下旬曾有一封电报,明确表示他仍然保持1941年10月会议期间的观点。他当时写道:“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恩来)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通过决定。”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认为,对中国革命危害最大、最需要清算的那段“左”倾错误,还应该从博古主持中央工作之日,即1931年“九一八”以后算起。

1942年出现的一重大事态,是毛泽东开始在全党肃清教条主义倾向的尝试。

年初,张闻天自己说,“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也为了实践自己在十月会议中表明愿意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的决心,他主动申请率团去陕北和晋西北农村作调查研究工作,中宣部长改由凯丰代理。于是,毛泽东对中宣部的工作重新加以部署,很快亲自起草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中心内容的中宣部宣传要点,强调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有多大效力的”。这以后,他接连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个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目的在于肃清教条主义的余毒,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风气,造就一个真正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党。

一向主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泽东，相信可以通过群众运动来暴露问题，监督各级干部。也正因为如此，1942年发动这次整风时，很快引出来几个热衷于冷嘲热讽的墙报，最有名的莫过于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干部创办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年轻干部创办的《矢与的》。由此又引出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高等级制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之类，矛头所向，大都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的。这难免在一些领导人，包括一些军队领导人当中造成了严重反感。

注意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亲自出面在报上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在批评中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同意由艾思奇接替丁玲来主持《解放日报》第四版的编辑工作。但是，毛泽东最初并不反对这种自下而上的斗争形式。他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是看重的，他甚至私下里委托自己的秘书胡乔木找王谈话，还托胡一再写信给王，要其注意方法，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

4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提出，《轻骑队》以及王实味、丁玲两篇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于收场。毛泽东的态度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难免的；一面仍主张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收，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

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它一面肯定墙报的作用，提倡讨论，并主张“在规定检查期间内，

不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见，都得自由发表，不得加以抑制”，强调“在讨论中要发展争论”，反对“明哲保身，有话不说”；一面要求各机关领导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引导讨论方向，反对避开自己专攻别人和“一切冷嘲热讽、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

4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的一些激烈批评意见之后，毛泽东专门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过墙报。但直至5月底，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相反，他相信形势是好的，并试图缓和新老干部中正在白热化的矛盾，要求老干部注意爱护新干部。他为此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当然，毛泽东这时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他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做“落后分子”罢了，不仅还是称其为“同志”，而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这也就是说，一直到5月下旬，毛泽东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

不过，从5月份开始，毛泽东毕竟已经开始对王实味的问题用“坏”字来概括了。这反映出他在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压力下，对王实味问题的认识已在变化中。当然，影响到毛态度变化的背景还有两个因素。

其一是这时毛泽东深信苏联和中共都处于最困难时期，而情报显示蒋介石正乘机而动，准备军事进攻与内部破坏同时并举，搞垮中共，这使他对敌情估计渐趋严重。中共中央为此接连两度发出“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得已

时不惜投鼠弃器的通知,同时全力部署破获“国特”,以绝内患。故5月初毛泽东已经开始提出“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的考虑。

其二是自5月以来,陆续得到消息说国民党的舆论对王实味及《轻骑队》等颇多呼应和赞赏,这明显引起政治局领导人的普遍关注,并不断加以强调,表示不满。这样,毛泽东不能不把过去未能引起重视,或者从积极方面理解的许多言论,重新加以考察,逐渐引起警惕并力图制止之。作为这种考虑的一种直接反映,就是决定将王实味的文章印发各单位讨论,不仅要组织反驳,而且要在各单位联系实际。这个决定是毛泽东在5月下旬作出的。这说明,他这时固然还不认为王实味就是反革命,但在党内诸多高层干部憋了一肚子气和敌情反映严重的情况下,把狂妄自大、锋芒毕露的王实味现象打击一下,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把王实味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提供给干部群众去反驳,并且要求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老干部之间、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关系的紧张。再加上毛泽东这时还要求社会部、组织部和宣传部联系检查坏分子,把考察思想问题与组织问题结合起来,这就使得事情更加趋于复杂和严重。

毛泽东最初设定的延安整风的对象逐渐开始发生转移。他本来是想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揭发党的中上层干部的问题,烧一烧这些人,达成打通思想,肃清这些人当中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的目的。此后,虽然毛泽东仍旧继续强调:这次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事实上,运动却在明显地开始以下层党员干部群众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为对象了。据这时被指定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解释说,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全党“八十万党员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新党员,而这些新党员中又有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贫农)出身,这些同志们都是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但免不了带着颇长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甚至封建思想的尾

巴,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不能容许的,如不改正,也将造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毒害”。

有组织地批评王实味,并且把思想考察和组织考察结合起来,立即使自运动开始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之中的各级领导人获得了斗争的主动权。

从5月底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王实味的大会,结果6月中旬,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待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作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立即转变。

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这样,对王实味的定性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受苏共的影响,“托派”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一直是最危险的敌人。王实味的问题,由此也得出最简单的答案。就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第二天,即6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的结论上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的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既然王实味都能隐藏得这么深,肯定还会有张实味、李实味。因为毛泽东一直认为,可怕的并不是那些一触即跳的人,这些人往往没有严重问题,最要警惕的是那些表面服从,实际上不服从,“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据此,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有坏人”,强调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查,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那些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

(未完待续)

(本文采用了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并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原文有注释,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删掉了注释)

(责任编辑 萧 徐)

花园口决堤六十周年祭

回顾历史
目寇进逼

外患内忧
决策失误

感叹中华当自强
无辜同胞葬鱼腹

马仲廉

1938年6月9日，位于河南省郑县花园口的黄河大堤决口，滚滚黄水向东南方向奔腾而下，……多灾多难的豫、皖、苏三省的人民，刀兵之灾未过，黄水之祸又至。这次黄水泛滥受灾44县，面积达5.4万多平方公里，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89万多人死亡，财产损失难以计算。

花园口决堤到今年已整整60年了，恰是我国干支纪年的一个周期。笔者仅以此文纪念60年前在我国历史上发生的这一重大的悲惨事件，并祭奠在此次事件中死难的数十万无辜同胞。

日军西进

1938年3、4月间，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所部在鲁南台儿庄大败后，老羞成怒。日军大本营决计要在中国军队主力大量集结的徐州地区，决一死战。于4月17、18两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在大本营代表参加下，在济南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以七个师团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徐州进攻。此时的国民党军事当局，也在台儿庄胜利的刺激下，调集大量军队增强第五战区的力量，企图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决战。

徐州会战从4月中旬展开。在台儿庄曾遭受失败的日军第二军第五、第十两个师团再次向台儿庄及其两侧地区展开攻击。接着第一一四师团加入峰县以南台儿庄西侧战线，抽出第十师团经微山湖中部协同由济宁南下的第十六师团向徐州西北侧攻击，以切断在徐州东北地区中国军队的退路。日军华中派遣军第九、第十三师团，于5月3日从津浦路西徐州西南方向进攻；第三师团从右翼沿宿县方向进攻；另以佐藤支队从江苏的东台北上盐城、阜宁配合主力作战。南北两个方向上的日军迅速形成对徐州的包围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唯恐被歼，便于5月13日开始全线突围撤退，向豫南、鄂北地区转移。徐州于5月19日被日军占领。

在此期间，日军第一军为配合徐州会战，

令其第十四师团在鲁西濮县地区南渡黄河，以截断陇海铁路，阻止中国第一战区部队东进增援徐州。该师团于5月14日占领菏泽后，于20日进至兰封东南之内黄集、仪封、野鸡岗、楚王砦地区。蒋介石令薛岳指挥第六十四、七十四、七十一、二十七、三十二军和新编第三十五师以及第三集团军等部队，围攻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但未奏效，兰封于23日被日军攻陷。蒋介石令第十七军团胡宗南部由西安、潼关一带赶至开封增援。

日军华北方面军因第一军之第十四师团被困于兰封地区陷于苦战，因而于5月28日命令第二军以更多的兵力向开封东南地区进攻，第二军于当日命令第十六师团和第十师团西进。至31日，第十师团攻占涡阳、亳州；第十六师团进至杞县以东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国第一战区即令位于豫东和鲁西的部队向西转移；开封以西的黄河南岸以守备部队严加警戒。

5月29日，日军大本营虽曾决定暂停对中国军队的追击，但是华北方面军仍于6月2日将第十四师团配属给第二军，决定向中牟、尉氏一线追击；另以一部迅速挺进，切断平汉铁路。

6月3日，日军第十六师团攻占杞县、通许、陈留。国民党新三十五师放弃兰封。4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占领兰封后，继续向开封进攻。开封守军第一四一师于6日凌晨退走，开封失守。此时，日军第十六师团已占领尉氏、扶沟；第十师团已占柘城。

日军第二军的西进，严重地威胁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郑州及平汉铁路的安全。当时，第一战区虽然拥有近三十个师的数十万军队，而且大部分是中央嫡系主力，但却无能抵挡日军的西进，更担心日军攻占郑州后沿平汉线南下直取武汉，因而决定“以水代兵”，将黄河大堤决口，制造水障阻止日军的进攻。

以水代兵

将黄河大堤决口，以水代兵，制造水障，

阻挡日军的进攻，是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建议下，由蒋介石批准实施的。但是，这并不是蒋的独断专行，也不是其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国民党政府及军队内许多人早已存在的设想。早在1937年7月间，蒋介石的德国首席顾问法尔肯豪森就曾设想并建议，在日军向华中进攻时“将黄河决堤”阻击日军。1938年4月13日，台儿庄战役即将结束，中国军队正在攻击败退在峄县的日军之时，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主张在河南省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但他主张决黄河北堤的目的，不是阻止日军的西进，而是“恐敌以决堤制我”所采取的反措施。他说，“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以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时，且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

蒋介石阅后，即批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徐州失守后，更有多人向蒋及国民党军事当局致函或致电，建议决黄河大堤阻止日军进攻。决堤地点，有的建议在河北省的刘庄、山东省的朱庄决口，使黄河改道南向；有的建议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堤，使黄河流入清咸丰五年（1855年）以前的故道；有的建议在兰仪下游与铜瓦厢之间决堤，由旧黄河故道顺流而东；有的建议在河南省黑岗口决堤，使黄水向杞县、睢县、柘城、涡阳、蚌埠入洪泽湖。而陈诚则主张在黑岗口决堤。他说，“查黑岗口水位较开封高出三十丈，堤身两面皆水，历来称为险工，如在该处决口，其大溜直趋开封，经朱仙镇、尉氏直贯汴周公路，横断亳、柘、淮、周、漯河公路，于军事价值关系最巨……”，“请钧座毅然决然主持开决黑岗口，以利军事。”

决定以水代兵决堤放水的时间，是在日军占领睢县，逼近兰封、杞县的6月1日。当时，第一战区判断日军必然西进，如果我军此后不能确保自黄河南岸起经郑州至许昌之线，不仅平汉铁路郑州至汉口段的运输和联络线将被日军切断，而且此后日军南下可以威胁武汉，西进亦可直逼洛阳和西安，最后由西安略

取汉中，进而窥伺西南大后方。似此，对我此后整个抗战局势是极端不利的。

据当时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的晏勋甫后来回忆，关于决堤设想，包括地点选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都通过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及时向蒋介石报告过。待得到林蔚转达的蒋介石同意的电话后他们才“一面做准备工作，一面以电报作建议方式向蒋介石请示”。

决堤放水

第一战区决堤放水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后，程潜立即召见黄河水利委员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务处处长³，并由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及工兵科长王果夫与陈、朱一起研究掘堤具体方案，⁴定在中牟县赵口决堤，预计河水经中牟、⁵氏、扶沟、西华等县，约十天左右可到达周家口，会合沙河东流入海。

拟定方案由晏勋甫向程潜汇报，程潜即令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负责，限6月4日夜12时放水。商震令第三十九军指挥之第一〇九师担任掘堤任务，并从3日晨6时开始动工。蒋介石得到程潜的决堤方案报告后，又分别电令商震和第三十九军军长刘和鼎，命他们严督所部按时完工放水。

6月3日清晨开始，第一〇九师的一个团在赵口夜以继日地轮番挖掘。4日，西进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向开封进逼，当日下午已进至开封城下。赵口距开封仅数十华里。程潜和商震数次电话询问工程进展情况。蒋介石由武汉也直接电问刘和鼎，并要刘必须督令所部于4日完工放水。但是，尽管掘堤官兵不分昼夜冒雨苦干，仍未能按时完成放水任务。

6月5日上午，开封守军与攻击的日军展开激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向洛阳转移。中午时分，蒋介石又一次电询商震，并要求商“严厉督促施行”。商震遂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魏汝霖亲赴赵口视察，并令工兵营长携带大量黄色炸药与地雷，准备作爆破河堤之用。商等到达赵口后，又加派第三十九军一个团协助，并悬赏千元，希望于当日夜完工放水。至下午8时许，工兵用炸药炸开河堤内斜面基石，开始放水，因缺口倾颓，水道阻塞，又未成功。

已挖出的缺口放水无望，又决定在缺口以东30米处再挖第二道缺口。同时，工兵营在附近一公里处挖掘直径两米的坑道，取另一方法放水。从6日上午开始，掘堤部队在各级将领的层层督促下，争分夺秒加紧施工。这天，开封被日军攻陷，商震指挥所部固守中牟南北一线。7日，日军第十四师团自开封西进向中

牟攻击。赵口施工处已听到前方作战的炮声，在武汉的蒋介石，洛阳的程潜和商震均十分焦灼，不断电询刘和鼎掘堤情况。然而至6月7日下午8时止，第二道缺口的挖掘和工兵营的坑道工程均告失败。

国民党军事当局“异常焦灼”。商震又令刚刚爆破黄河大桥的新编第八师派一个团前往赵口协助。该师师长蒋在珍在现场观察后，建议改在花园口决堤，经蒋、程等批准。

蒋在珍以所属第二、三团及师直属工兵连执行掘堤任务。



1938年6月，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进攻，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

8日这天，花园口掘堤工地官兵，在商震悬赏下，施工进入高潮。近午时，魏汝霖从郑州赶到工地，代表商震慰问掘堤部队，并再次当众悬赏。

6月9日8时许，花园口掘堤完工。黄水终于由缺口处缓缓流出，但流量太小。蒋在珍又请求上级派来一排炮兵轰击，缺口被炮弹炸宽，水势骤然猛增，决堤的黄水滚滚涌出。从10日起，天降大雨，缺口越冲越大，水势漫延而下，12日与赵口被冲开的水流汇合，使贾鲁河与涡河流域的乡村城镇一片汪洋。接着黄水如万马奔腾向东南方冲去……

制造假象

利用水、火制敌，是兵家常事。根据军事上的需要，以水代兵，争取战争的胜利，在中外战争史上屡有发生。这次花园口决堤，也正是为了阻挡日军的进攻。但是，这是迫于日军进攻压力，又在未顾及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措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惟恐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国民党当局在决堤之时便准备了制造假象掩人耳目的措施。

6月8日，蒋在珍按照魏汝霖转达商震的指示，拟定了准备在放水时发向武汉的电报，内容是：“武昌委员长蒋（密）本（佳）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件预先拟好的电报于9日上午放水时发出。当日晚，程潜电报蒋介石，其内容除花园口决堤放水情况外，特别提出，“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如泛滥确已成功，当即披露，并呈鉴核。”11日，蒋密电程：“（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情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三）第一线各部须与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当

日，商震命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将事先拟好的称日军炸毁河堤的电报发向中央社。

6月13日，积极建议决堤阻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介绍当时战况和黄河大堤决口情况时亦称日军炸堤云云，以掩人耳目。

当局还命令第一战区迅速在决口处制造假现场，以供外国记者察看。

日军被困

日军华北方面军担任追击的第二军各师团至6月6日已前进到中牟、尉氏地区。同日，方面军下达了停止追击，将“在陇海沿线作战的兵团逐次集结在开封、杞县、亳县、宿县一带，准备下期作战”的命令。

日军第二军下达停止追击命令之时，其第十四师团正在攻击中牟，并于9日晨占领。该师团的骑兵联队主力正在向平汉铁路挺进，到10日炸毁了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旅团长筱原次郎率挺进队（步兵三个大队为主编成）执行“切断平汉线”的命令，于6月12日炸毁了新郑以南约6公里处平汉路上的铁路桥。

攻占中牟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一部，首先受到由花园口倾泄下来的黄水围困。由于天降大雨，赵口的黄水也注入贾鲁河，使黄水以数华里的幅宽包围了中牟县城。中牟日军被困在城内，只好以土堵塞城门，等待救援。第二军于13日从军属其他师团抽调工兵中队及架桥材料中队配属给第十四师团；随后第一军也调来独立工兵及渡河材料中队，前来救援。

6月15日以后，泛滥的黄水奔向尉氏，经县城东侧向东南泛滥。集结在尉氏城西地区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被泛区阻隔。第二军遂调用工兵、架桥材料中队、折叠船联队主力来救援。17日，华北方面军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全力以赴，在16日至24日之间空投粮秣、卫生材料合计约61.5吨。

日军第二军于17日重新调整部署，令第十四师团在开封、兰封集结；第十六师团在杞

县、睢县、宁陵间集结；第十师团主力在夏邑、会亭集、永城附近集结，并决定“只要水害涉及不到，即应以一部兵力尽可能长期保持柘城、鹿邑、亳州、涡阳地区。”为便于指挥部队集结，第二军将战斗司令部指挥所推进到商邱。

中国第一战区部队，乘日军一部被黄水围困在中牟与尉氏地区之际，发动了对日军的攻击。

6月18日，第三十九军命第三十四师派一部兵力攻击中牟之敌。该师第二〇一团一部于19日晚由中牟县城以西，徒涉一华里左右泛滥地带进至中牟城下，并有一个排登上城墙与日军展开战斗。但在日军反击下，该排大部阵亡。因天气将明，部队撤出战斗。22日凌晨，该团再袭中牟日军，并攻入城内。日军利用已得到的救援材料渡水撤退，遗弃了大量重兵器与辎重。日军逃跑时，在混乱中有的被击毙，有的落水被淹死。中牟县城遂于22日克复。由中牟逃出的日军部队，大部于23日夜在开封附近集结。

6月14日，第十二军第二十师奉命协同第二十四师攻击尉氏以西地区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两师各派一个旅于16日向日军发起攻

击。经数日激战，日军大部退入城内。这时，在城东已形成深广的黄泛区，城内日军陷入绝境。27日拂晓，中国军队第二十、二十四师在得到炮兵和骑兵部队的增援后，展开对尉氏县城日军的攻击。经数小时激战，日军弃城东逃。日军溃逃时，破坏了坦克、汽车、大炮和辎重，并遗弃了部分军马、枪支、弹药。当日12时左右，尉氏被中国军队克复。向东撤退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主力，渡过了幅宽约600米，流速2.5米的大面积泛滥区，接着又渡过了数条泛滥的河流及潮湿地带，到7月7日才到达通许集结。

黄水无情

泛滥的黄水，给西进的日军造成很大困难，并在中牟、尉氏地区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受到损失。但受到更大损失，遭到沉重苦难与灾害的是豫皖苏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

黄河决堤后，沿贾鲁河向东南方奔腾而下，先后经中牟、尉氏、鄢陵、扶沟、西华、商城等县，形成了深数十厘米至数米，宽数公里至数十公里的泛滥地带，并使涡河、颍河、茨河、肥河等流域泛滥。急流注入淮河时，淹



黄河决堤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数百万灾民扶老携幼，远走他乡

没了淮河堤岸，并在7月13日冲断了蚌埠淮河大铁桥，蚌埠至宿县亦成泽国。滔滔黄水冲入洪泽湖后注入黄海。

黄水泛滥面积布及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达54000平方公里，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财产损失难以计算。

有一篇题为《河南省黄泛区灾况纪实》的文章，是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社会处撰写的。该文描述了河南省黄泛区人民遭灾的部分情况：

“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魄荡魂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饿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凡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黄水泛滥以后，国民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救助措施。全国赈济委员会在郑州、洛阳两地设立了“特派办理黄灾扶赈事宜办事处”。确定豫西及陕南各数县为移殖灾民区，陕西黄龙山作为移民重点地区。此外，还发起黄灾捐款一日运动，进行募捐救灾。

但由于泛区太大，灾民众多，政府的赈济款和募集的捐款太少，用来解决泛区人民的灾难实为杯水车薪。

从此黄泛区人民遭受着无尽的苦难，形成了饿殍遍地，十室九空的惨状。

功过评说

60年前的花园口决堤事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劫难。造成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日寇的侵略，国民党军政当局决策上的失当。但深究起来，还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国家太贫弱了。如果那时我国的军事力量强大，何

苦“以水代兵”；如果我们的国力强威，日本怎敢对我国发动如此野蛮的侵略战争！

对于花园口决堤事件，当前学术界一般地认为，一方面在军事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另一方面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太严重了。

它在军事上的价值是，给占领中牟、尉氏的日军造成一定的困难和损失；在武汉会战中，由于淮河泛滥，日军将原以主力由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的部署，改变为将主力置于长江方面。然而，花园口决堤给豫皖苏地区人民造成的灾难太深重了。利弊相较，花园口决堤是不值得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决策是错误的。由于这一错误决策，是在日本军队进逼下发生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是难逃罪责的。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2月设立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3月15日堵口工程合龙。从此，滔滔黄水复归故道。

重建家园，改造土地，逐渐恢复原来面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原来的黄泛区已是村舍毗连，绿野阡陌，很难看到当年的战争迹象，也难觅泛区人民苦难的痕迹。但是中国人民应当牢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牢记日军在占领区对中国人民的蹂躏和花园口决堤所造成的灾难，历史的教训，会更加激励我们的祖国向着富强的道路迈进。

（责任编辑 洛松）

更正

本刊第五期《回顾总政创作室的反右派运动》一文，由于编者对原稿字迹辨认不清，将鲁勒的名字误为鲁勤；另第16页秘书柳琪祥应为柳琪辉，谨向鲁勒、柳琪辉同志和广大读者致歉。

编者

何忍“南昌”舰 永沉海底？

●王彦

由于我曾长期担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参谋，与旗舰“南昌”号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多年，或陶勇司令员率领编队出航，或中央军委首长莅临视察，我随这艘旗舰从吴淞口启航的情景，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然而自我得知“南昌”舰作为发射试验导弹的靶舰而“殉难”于渤海湾之后，怅惘、愤懑，不时袭上我的心头。它的“殉难”，就像“文革”中陶勇司令员死在水井里那样不能让我接受。

忆起1950年10月，我首次在吴淞口看到修复后试航的“南昌”舰，首任舰长郭成森是一位资深“老将军”，他曾于1944年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实习，在英国海军巡洋舰、战列舰上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作战。该舰首任、二任政委陈绍海、夏峰都是老红军；航海长陈仁珊则是“南昌”号前身“长治”号起义的领导人。

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2月24日，于南京下关码头首

次视察华东军区海军时，接受检阅的就有“南昌”舰。

“南昌”舰于1951年改装了苏造130毫米前后主炮后，由于它的射程远、威力大，曾使台湾海军之驱逐舰、护卫舰，在浙东海域望风披靡。1954年5月16日在东矾列岛海战中，“南昌”、“广州”等舰，一举击伤了敌舰“太和”号。1955年1月18日在一江山岛登陆作战中，“南昌”舰对北江岛“乐清礁”火力点实施抵近射击，摧毁了敌水陆阵地工事，有力地支援了陆军登陆突破和背水攻坚，夺取了二〇三高地（制高点）。后来，“南昌”舰又奉命参加了辽东半岛和穿山半岛三军实弹演习，它都担任指挥舰，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赞扬。

先后不仅有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南昌”舰视察，它还数十批次接待抵达上海吴淞口参观的外国国家元首、军队首脑和军事友好代表团。1956年6月20日拂晓，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海

军少将率领“南昌”舰于花乌山以北海域，迎接前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首次访华，与巡洋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和驱逐舰“智谋”、“启蒙”号在公海上相遇，“南昌”舰主桅升起了“欢迎光临，恭贺顺利到达”的旗号，在双方各鸣放海军礼炮17响后，在“南昌”舰的引导下，苏联海军友好访华舰队驶进了吴淞口，双方又鸣放了国家礼炮21响（我方是陆军野炮）。“南昌”舰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南昌”舰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啻为一座流动的海军“学堂”。它在近三十年中，培养了上千名水兵和专业人员，许多海军优秀人才、舰长、高级指挥员，出自“南昌”舰这个“摇篮”——诸如军职以上干部陈绍海、夏峰、曾泉生、宋炳南、李辛、马骏、陈健和海军少将陈访友、牛玉山、马福才、王守仁、王金桥等佼佼者。

“南昌”舰不仅有着上述光荣的历史，它还有着更为

值得纪念的意义，那就是：它原本是日本的一艘降舰——名为“宇治”号。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原国民党海军上海基地司令方莹将军（后担任我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副司令员、海军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逝世于福州），于9月在上海接收了首批日本海军降舰“宇治”号。后来根据中、美、英、苏四盟国协议，日本降舰131艘，作为盟国战利品，以抽签方法分配给中国海军23艘，计第一批降舰“雪风”号等8艘，总排水量是10460吨、第二批8艘总排水量是8450吨……。这是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或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首次不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获全胜的一次反侵略战争。收复台湾、接收日本降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令人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如果我国能把这艘“宇治”号降舰保存下来，作为抗日战争的战利品供后人参观多好呢？然而急于打内战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将“宇治”号更名为“长治”号后，加入国民党海军序列，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曾以此舰封锁吴淞口。但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国民党众叛亲离，一败涂地，国民党海军继“黄安”、“重庆”、“灵甫”号起义之后（“灵甫”号因事先被香港英军当局侦悉发现，强迫该舰官兵离舰），“长治”号也于1949年9月19日在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的策动下，由陈仁珊等爱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它从长江口驶进了上海黄浦江，回到了人民的



1959年一次登陆演习后，叶剑英、许世友与“南昌”舰官兵合影

怀抱。这一壮举受到了党中央的欢迎和赞扬，毛主席、朱总司令在接到该舰起义水兵的致敬电后，特致电祝贺，陈毅市长和张爱萍司令员非常高兴，即兴为其命名为“八一”舰。1950年4月23日由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南昌”舰。

由此可见，“南昌”舰在人民海军史上，其贡献，其价值，都是其他任何一艘军舰难以相比的。但是，到了70年代，由于护卫舰的改装换代，“南昌”舰退出了战斗序列。遗憾的是它没有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而是默默无闻地被“遗弃”了。1981年秋，我为海军副司令员周仁

杰将军撰写回忆录考察锦西、塔山战场之后，来到旅顺海军基地，才知道“南昌”舰早已沉于海底“长眠”了……

重视历史文物的意识在逐步增强，“中山”打捞出来了，令人兴奋；打捞“甲午海战”时的沉舰，怕也无人反对。但是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舰呢？有关领导，有关部门，社会公众，是否知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老海军、老水兵，在紧急发出强烈的呼吁：把“南昌”舰打捞出来吧，让它重现世上，作历史的见证！

（责任编辑 洛松）

湖南“闯王陵”是昂贵的赝品

● 王戎笙

80年代初，湖南石门县挖开了奉天玉和尚“墓”，有些学者撰文以出土文物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兵败后遁入空门的李自成。于是，奉天玉和尚是不是李自成，一时成为海内外文化界关注的热点。其所以受到关注，不仅是因为早有结论的历史疑案忽又沸沸扬扬，也不仅仅是英雄遁迹空门具有吸引人的传奇色彩，文化界关注的焦点是：（一）要不要根据李自成遁入空门后秘密指挥余部“联明抗清”的观点改写清初20年的历史；（二）国务院1988年1月13日核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自成墓”在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三）要不要根据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观点修订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李自成之死，三百年来研究结论本趋一致

在清代初年，记载李自成之死的原始材料，包括档案、实录、文

集、杂史、笔记、方志、谱牒，以及外国人的记载共几十件，都明确记载李自成死于兵败之后。只有个别材料说“李自成下落不明”，没有一件材料说李自成还活着，更没有李自成去当和尚一说。

李自成遁迹空门的说法，出现于李自成死后一百年。最早提出的是曾任澧州知州的何璘。他在编修地方志时，撰文说李自成可能“禅隐”石门夹山寺。这是李自成遁入空门的各种说法中，最早提出也是最有影响的一种。此外，还有说在湘黔交界处某禅院为僧的、在湖南益阳白鹿寺为僧的、兵败后逃至山西五台山为僧的等等。

何璘提出夹山“禅隐说”之后，很快受到一批学者的怀疑和批评，如袁枚、昭槠、徐鼐等，指出李自成兵败后逃至夹山为僧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

清代学者对李自成之死进行考证的，继戴笠、赵翼、蒋良骥、徐鼐之后，有夏燮和傅燮鼎。李自成之死的细节，各书记载虽有歧异，但经过清代众多学者的考证，不断地淘汰传闻失实之词，到清末已基

本上考证清楚。所得结论是：李自成顺治二年五月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乡勇之手。

应该公正地说，何璘虽然是夹山“禅隐说”的创始人，但他把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故事，只是作为传闻之词留给后人。他明确说是供后人“有所参考”的。至于后人把传闻之词当作真实的历史，应由后人负责。在清代，把李自成禅隐空门当作真实历史的人，并不多见。夹山“禅隐说”在清代；只是在湘西、陕北部分地区稍有影响。其所以长期受到冷落，根本原因是创始人何璘并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何璘之后一百多年，章太炎写了两篇短文，支持夹山“禅隐说”，依然停留在何璘初创时的水平上，在学术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在本世纪50年代，发生了一场关于李自成是死在通城九宫山还是死在通山九宫山的争论，而李自成是否“禅隐”夹山寺的问题早已被学术界淡忘。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讨论，所得的共同结论是：李自成死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他们

的结论是自清初的戴笠，中经赵翼、蒋良骐、徐鼐、夏燮，直到清末的傅燮鼎，再加上本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童书业、王崇武、李文治等人不断深入考证，不断淘汰误说的结果。

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的李自成墓，作为李自成死难的纪念地，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自成“禅隐”夹山寺这个传说，之所以东山再起，是因为80年代初石门县挖开了奉天玉和尚“墓”，并说出土文物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于是一个沉寂已久的历史悬案，又重新引起文化界的关注。

“禅隐说” 者取证，错误发 掘奉天玉和尚 “墓”

李自成“禅隐”夹山寺这个说法，是李自成死后一百年才在文字上以传闻的形式出现的，几百年间没有人能够拿出证实这个传闻的证据。当代“禅隐说”者所作的新的努力，就是发掘了奉天玉“墓”。在清史研究领域，依靠田野发掘的文物解释重大历史问题的例子并不多见。按常理说，以文物为自己最有力的论证武器，就应该格外珍惜它，严格按照国家公布实施的文物法规，科学地发掘、清理和鉴定，去伪存真，使自己的主要靠文物论证的“奉天玉和尚即李自成”的结论，以及李自成用奉天玉和尚的名义秘密指挥余部联明抗清的结论，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第一，发掘之前未遵守国家有关文物法规履行报批手续。

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古文化遗址及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就明文规

定，一切考古发掘必须事先履行报批手续，在未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指示前，不得擅自发掘。1960年11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1961年3月4日国务院通知执行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各文物管理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等，不是配合建设工程而进行的考古发掘的时候，应当提出发掘计划，报经文化部会同中国科学院审核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第十七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机构、考古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等，为了科学研究进行考古发掘，必须提出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部门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查，经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

石门县是在没有按法律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发掘奉天玉“墓”的。正是因为没有获得合法的发掘许可，所以也没有获得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这是石门县奉天玉文物工作中出现一系列失误中最大的失误。

第二，李自成归宿问题调查组不是具有田野发掘资格的团体。

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的《古文化遗址及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明文规定：“凡拟进行发掘工作之团体应具备下列各项条件：（一）必须由学识经验丰富之田野考古专家担任实际领导。（二）必须具有若干谙练发掘工作之技术人员。（三）必须具有进行发掘工作之详细计划，必需之工具设备，以及足够之经费。”以上各项条件，中共石门县委领导下的李自成归宿问题调查组都不具备，因此它不是一个具有田

野发掘资格的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实施之后，国家文物局还颁布了《考古发掘资格审定办法》、《考古发掘团体资格审定公告》。考古发掘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科学技术活动，因此考古发掘的团体和领队的资格，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审定。但是，奉天玉“墓”发掘工作的实际领导者，是石门县文化馆的一名根本不具备领导田野发掘资格的普通干部。

第三，奉天玉和尚“墓”未按原状保存下来。

奉天玉和尚“墓”发掘清理之后，没有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这个研究李自成结局的关键性文物——奉天玉和尚“墓”按原状保存下来。竟在干部和群众中集资千余万元，按十三陵模样，把奉天玉和尚“墓”（其实是骨灰塔塔基遗址），改建成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并取名为“闯王陵”。

所有的文物均无客观的、科学的文物鉴定书。

牵强附会， 奉天玉“墓”论 证成了“闯王 陵”

湖南石门夹山寺的《圻符碑》（按文物定名原则应是“阳圻灵符砖”），是论证奉天玉和尚是不是李自成的关键文物（见图一：湖南石门出土的《圻符碑》）。

穆长青教授在他写的一篇长文中，说他解读了湖南石门出土的《圻符碑》，其中暗含了“闯王陵”三个字。这一解读，可比喻为“破译了十七世纪的甲骨文”，宣称“关于‘闯王陵’三字的科学破译是任何人也驳不倒的”。

穆长青教授的长文，有一节专门论证奉天玉“墓”就是“闯王陵”。原文如下：

“珣”是由“门”字和“吞”组成；而“𠂔”是个“马”字。第一，由于“珣”居中，“马”字的两横“二”一竖“丨”便用“丨”来代表。第二，“与”用草字体书写可以写作“与”，亦即图像中的“𠂔”。因此，“𠂔”的图像是一个“马”字。“门吞马”即“门”字里面包含一个“马”字，这不就是“闾”字吗？

再看两侧文字。右面“身披北斗”，一种解释为“与日月同高”或“与日月同辉”，另一种解释为“向北方面立”。“头戴三台”是个关键，三台喻王冠形，“头戴三台”正是一个王冠的“王”字（“王”字的结构正好是三台）。

右侧“寿山永远”之“寿山”非指地名，而是指坟墓。“寿山”即“寿冢”，即生前造好坟墓。“冢”与“山”意相通，如毛传：“山顶曰冢。”故“寿山”即“寿冢”，就是坟，尊称则谓“陵”。这样从中到右，再到左，隐喻着三个字，正好是“闾王陵”。

穆长青教授的这种解读，一时成为湖南石门最有权威的解释，成为耗资一千多万元巨资兴建仿古建筑群并取名“闾王陵”的主要依据。

其实，穆长青因缺乏对道符的研究，一出手便出现了许多知识性

错误，例如圜灵符分为男用和女用，男人用的为“阳”，女人用的为“阴”，不能混淆。穆长青教授把石门出土的这一阳圜灵符，竟称之为“阴符”、“阴符例语”、“阴符例图”等。

长期研究道符的李远国、王家佑认为，石门县夹山寺出土的《圜符碑》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南北朝时期，直接脱胎于明初的道书《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法海遗珠》所载的九宫安镇符、脱厄符。因此，把夹山寺出土的《圜符碑》解释成所谓“闾王陵”，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特别是对道符作过深入研究的王育成先生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证据，即1980年贵州省考古工作者在该省思南县河东公社万胜山顶，发掘清理了一座明代墓葬。出土物中有一件是男用阳圜灵符砖，砖上的朱书道符，与石门出土的所谓《圜符碑》几乎一样（见图二：贵州思南出土的阳圜灵符）。被穆长青解释为“闾王陵”的那一部分也基本相同。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墓有一块残墓碑，上有“万历三十二年”字样，这时李自成还没有出生。这就有力地证明，石门夹山寺《圜符碑》上的“圜符”，不仅湖南石门有，不仅陕西米脂有，各地都有，而且在李自成出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奉天玉和尚“墓”，与李自

成无关。奉天玉“墓”中出土的这件文物，是道教的阳圜符，它怎么混进奉天玉和尚的“墓”里了，这本身就是文物发掘工作中的一大疑点，更不用说以此证明奉天玉是李自成了。

穆长青教授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这是李自成本在世的时候，同李过共同设计并筑好了墓穴部分。这种说法，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李自成在北京曾下令“禁民间用自成字、闯字”，李自成和李过怎么自己倒用起“闯”字来了，而且还是用在李自成死后的陵墓上，并把陵墓取名为“闯王陵”。“闯王陵”这个名称，不符合李自成生前的意愿，因为他在登极称大顺皇帝以前，早已废除了崇祯九年承袭的原是高迎祥的“闯王”称号。“闯”字带有浓厚的草莽气，与“陵”字所具有的帝王气实不相称。李自成、李过不可能为李自成死后共同设计一座陵墓，并命名为“闯王陵”。

细考当地文物，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

石门一带出土的和征集的文物，不但不能证明奉天玉和尚是李



图一：湖南石门出土的《圜符碑》



图二：贵州思南出土的阳圜灵符碑

自成，恰恰相反，正好证明奉天玉和尚不是李自成。

据康熙四十四年所立的《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简称《康熙碑》）载，奉天玉和尚当年到石门夹山寺以后，看到这座古刹已成废墟，乃“思复旧观”。石门知县和“阖邑绅耆”均乐于捐助。顺治九年六月，石门县知县魏绍芳给奉天玉发了“请书”，让他“领徒开山”。继任知县邵元玺于“公余之暇，游心净界，广种福田”。到康熙年间任知县的张霖等地方官都“相继捐俸，置田亩，蠲免其租徭”。《康熙碑》也说立碑的主旨是“一以表众侯（按即各知县）垂久之德，一以继师资重兴之功”。这说明奉天玉和尚在重建夹山寺时，得到了清朝官绅的多方支持。这样一位结交清朝官府的奉天玉和尚，恰恰证明他不可能是“匿迹方恐不深”的李自成，更不可能是在幕后指挥余部联明抗清20年的统帅。

据道光三十年所立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简称《道光碑》）载：“我朝顺治壬辰岁，有和尚字明玉者，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启。”

这个“和尚字明玉者”，即奉天玉和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不会是李自成。众所周知，李自成在定鼎长安之后，即“颁讳法于天下”。进北京以后，又颁先世祖讳，“明”字即在其中。因大明门的“明”字，犯了李自成先世祖讳，改名为大顺门（清代改为大清门，民国以后改称中华门）。为什么李自成在“禅隐”之后，竟然要犯先世祖讳，在自己的“法名”上用了一个“明”字？不用这个“明”字而用其他的字，是极容易做到的。也许有人辩解说，佛门弟子超凡脱俗不避祖讳，此说查无实据。就算能找出几个出家人不避祖讳的例子，也不能证明李自成就不避祖讳。因为李自成并不是佛门弟子，他没有虔

诚皈依佛门。按夹山“禅隐说”的观点，李自成之所以脱下战袍换袈裟，是为了便于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据说还曾用一种所谓的“奉天玉诏”铜牌调兵遣将，甚至连葬俗都不违祖制，怎么可以设想在取名时竟然不避祖讳？

《康熙碑》中说：“迨明末兵火，几至丘墟。独赖奉天老人从西蜀南游，恐祖庭之芜没，于焉驻锡，思复旧观。”意思十分明白，奉天玉和尚来自四川。而李自成没有从四川进入湖广的经历，可见这个奉天玉不是李自成。

《康熙碑》、《道光碑》都记载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壬辰年（顺治九年）到夹山灵泉寺的，而李自成是顺治二年五月在历史上消失的。可见这个奉天玉和尚也难说是李自成。

从奉天玉和尚的人际关系看，他决不可能是遁迹空门的李自成。石门一带的文物证明，奉天玉和尚与清初几任知县关系都很密切。奉天玉和尚果真是遁迹空门的李自成，而且还要秘密指挥几十万军队抗清，和官绅保持这样密切的关系，难道就不怕这些人识破真面目拿自己的脑袋去邀功请赏吗？这些地方官经常面对一个从外地来此的、带着陕北口音的、年龄又在四十开外的、面貌特征又是眇一目的和尚，竟看不出一点可疑的形迹来？

现存野拂撰《支那撰述》木刻残版，中缝有“野拂禅”字样，鉴定为清初遗物。从残存的全部文字看，为佛门的法堂例语。其中有“炉中供养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一句，为“禅隐说”者特别注意。说野拂和尚即李过；把“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解释为李过对大顺皇帝李自成的怀念。其实这又错了，这些同志忽视了木刻残版中的另一句：“辛未夏月师诞期”。“辛未”是康熙三十年，这个时候的

“今上皇帝”是谁呢？大顺皇帝李自成已经死了，奉天玉和尚也已圆寂入塔了，中华大地上没有第二个“今上皇帝”，惟一的皇帝就是康熙帝。这个如此歌颂康熙皇帝的野拂和尚，可能是李过吗？如果是李过，他怀念大顺皇帝也绝不能称“今上皇帝”，只能称“先帝”或“大行皇帝”。李过懂得这一点，以前他曾称李自成为“先帝”，怎么“禅隐”后倒称起“今上皇帝”了呢？这件文物恰好成了野拂绝非李过的证明。

在《康熙碑》中还有一段记载奉天玉和尚与野拂的关系的话，原文是：“是年冬，则野拂和尚由鼎州（引者按：今常德市）而来，投老人披剃。更不惮勤劬，跣足超化者三年，稍为修葺。乃以依德山受戒，闭关于龙阳蟠龙崖，三年苦行，奋燃中指。奉老人知为法器，接归本山。又于祖塔闭关三年，买舟东下抵杭州，参西湖鸟巢石莲和尚，师资相契，始受衣拂，还居洛卜，开堂放戒者三年，复为阖邑绅衿延入本山方丈。”如果奉天玉是李自成，野拂是李过的话，绝不会出现这种关系。第一，李自成与李过，相互信赖的关系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何需“跣足超化者三年”、“奋燃中指”（用烈火烧中指）、随后又是两个“闭关三年”这样严酷的考验？第二，抗清前线迫切需要李过这样的将才，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的李自成为什么要李过在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接受这种考验？第三，这种考验，不属于政治信任方面的考验，而是属于宗教虔诚方面的考验，因为野拂是武夫，奉天玉和尚才对他进行这种考验。李自成对李过又何必要进行这种宗教虔诚方面的考验？仅从奉天玉和尚与野拂的关系看，绝不是李自成与李过的关系。奉天玉不是李自成，野拂不是李过。

乾隆年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

曾亲赴夹山寺作实地考察，事后记载一位老僧的介绍说：“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号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这位“事和尚甚谨”的野拂，是江南人；而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是陕北人。可见野拂不是李过。

作历史考察，还奉天玉“墓”以本来面目

应该做到和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把奉天玉“墓”按原状保存下来，不应该增加什么，也不应该减

少什么，哪怕发掘前已有部分被扰乱，也应该按原状保存下来。可是石门县的文物主管部门却相反，增加了不该增加的东西，减少了不该减少的东西。

由于当时田野发掘不合操作规程，有关奉天玉和尚“墓”发掘前的地表情况没有留下足够的资料。据调查材料得知，在发掘之前，奉天玉和尚“墓”的地表上，原有耕地、林圃、灌木和几十座野坟，周围是山。灵泉寺也只剩下残破的大雄宝殿。

根据80年代的报告，奉天玉“墓”的“中穴，清除耕土层后，就是经过夯筑过的黄土层”。既有耕土层，当然是露天的。乾隆年间

何璘所见，奉天玉“墓”也是在露天里，到20世纪90年代修建的奉天玉“墓”，却转移到“地宫”里了，下去参观要走十几级台阶！

关于奉天玉和尚“墓”，从80年代初发表的文字来看，“左穴”和“右穴”都比“中穴”大几倍；三个墓穴的距离，分别为1.8米、1.6米。可是，90年代修建的奉天玉“墓”，三个墓穴大小一样，“中穴”比左右两穴还要略大一点；三个墓穴是紧连在一起的，相互之间没有距离。

特别是所谓“中穴”，随葬品有《中兴夹山祖诞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既称“塔铭”，又有骨灰坛，显然是奉天玉和尚的骨灰塔的塔基遗址。且从“左穴”和“中穴”的随葬品看，宗教信仰不同，不可能是同一墓主，更不可能是连在一起的。可是，90年代修建的奉天玉“墓”，三个墓穴建成一墓，而且是紧连在一起的，并名之曰“一墓三穴”。

90年代初，把奉天玉和尚“墓”改建成所谓的“一墓三穴”是按照“奉天玉即李自成”这个先验的结论建造的，没有历史的根据。

搞成“一墓三穴”的动机是：（一）为了证明奉天玉和尚是陕北人，因陕北的葬俗是所谓的“一墓三穴”，但此说查无实据；（二）与李自成的祖坟葬俗保持一致，但李自成的祖坟并非所谓的“一墓三穴”。保存至今的关于李自成祖坟的文字记载，是崇祯年间任陕西省米脂县知县边大绶的塘报。他于崇祯十五年曾带领90人去挖过李自成祖坟，他对李自成的祖坟曾有文字记载，见《虎口余生记》第27—28页。其中有“开土得三空穴……”一语，被解释成“一墓三穴”。我曾发函请教过陕西考古界的朋友，也当面请教过在京的几位考古界的老前辈，他们都异口同声



耗资千万元营造的湖南石门“阎王陵”全景

地说：我搞了一辈子田野考古，没听说过什么“一墓三穴”。

为了证明自己论断的正确，不惜作假作到毛泽东头上。《永昌演义》是李建侯先生写的一部小说。毛泽东看过这部小说后，曾于1944年4月29日写信给李鼎铭先生，盛赞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指出《永昌演义》“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永昌演义》是小说，不是历史著作，对李自成的结局，作者从“禅隐说”。但毛泽东信中根本没有提到奉天玉就是李自成。有的报刊却“变无为有”，说“毛泽东看到这本书后，曾提到奉天玉和尚就是李成一事”（见《羊城晚报》熊育群文）。更有甚者，是石门博物馆的人从毛泽东致李鼎铭原信中，在“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段文字内，摘出“大顺帝李自成将军”八个字，拼在一起刻成毛泽东的题字碑，立在石门夹山寺的所谓“闯王陵”内，造成毛泽东早已肯定奉天玉即李自成的假象。

教训沉痛， 无知又无法造成 昂贵的赝品

1981年1月10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列举的破坏文物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有的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或附近，任意增盖建筑，弄得面目全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包括建筑物的附属物），在进行修缮和保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

文物原状的原则。”

石门县的夹山寺，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10月10日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1992年9月18日常德市人民政府建立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但是在建牌的第二年，石门县既未报告湖南省人民政府，更没有获得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便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所划定的保护范围内，大兴土木，大拆大改，拆除奉天玉“墓”，改建成现代仿古建筑群“闯王陵”。

石门是个贫困县，竟在干群中集资千余万，大兴土木，把一个和尚庙改建成帝王陵——一个地地道道的赝品。

这一造价昂 贵的文物赝品， 是一个地道的法 盲的产物

《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物事业的根本大法。正如1987年国务院在《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中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武器，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任何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作出与这个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其中许多条文，和每一个公民都有关系。特别是文物工作者、史学工作者以及各级党政干部都要认真学习，严格遵守。那种在文物古迹上乱刻乱画，刻些什么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无聊文字，多半是文化层次不高的法盲干的，看到后实在令人痛心。但更令人痛心的是，像建造石门“闯王陵”之类的事竟在我们多少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文物工作者的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石门“闯王陵”建成之后，1996年3月

21日和22日，中国明史学会与湖南省李自成归宿问题研究会在湖南省石门县联合召开了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研究成果评议鉴定会议综要》。参加这次会议的，具有高级职称的22人，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干部（包括离退休的）6人，新闻工作者35人，在文物管理部门工作的5人。会后每人送了一本非常精致的石门“闯王陵”的纪念册，在这本纪念册中，有大量照片就是本文所指在文物保护范围内违反《文物保护法》集资修建的仿古建筑。可是整个会议的众多发言，以及会后的众多新闻报道，竟无一人提到这些既不像和尚庙又不像帝王陵的仿古建筑群，是不符合国家的文物保护法规的。这不能不使人痛切地感到，在高层次的文化人中，也有普及《文物保护法》的必要。

把真的和假的作一番对比，也能发人深思。通山县九宫山的李自成墓，从195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陆续由省、地拨款总计只有30万元左右。1988年国务院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曾拨款10万元。而同样贫困的石门县，修建“闯王陵”时真是“出手不凡”，耗资竟达一千余万元。我愿通山县九宫山的李自成墓，和李自成生前一样的简朴；即使将来通山县富了，李自成墓应该永远保持简朴，还李自成以历史本来的面目。我也希望全国各地以石门县“闯王陵”为教训，无论基于任何动机，也不要再去劳民伤财搞文物赝品。至于已建成的“闯王陵”怎么办？我觉得不妨勇敢一点，据实说明来龙去脉，摆在那里，还是可以供人参观游览，得到某种教益的。

（责任编辑 洛松）

阎宝航与他的『阎家老店』

● 嵇钧生

今年5月是阎宝航同志被迫害致死30周年。在他光辉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

1967年，阎宝航被“四人帮”以莫须有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成了67100号反革命罪犯。在狱中，他以年逾七十之身，饱受折磨。1968年5月22日深夜，他在提审时被严刑折磨得昏死过去，凌晨被送往复兴医院（当时的监狱医院），放在候诊室的长椅上，久久无人救治，终于死去。“四人帮”未通知家属便批示火化场：“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保留骨灰”。就这样，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被党内外人士誉为“忠厚长者”的阎宝航同志，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抗日斗士 坚定无畏

阎宝航是辽宁省海城县人，1895年4月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时无力读书，曾为富家放猪。终因勤奋好学感动塾师而

得以免费入学，后进入奉天师范学校就读。1918年毕业后和同学兴办奉天贫儿学校，得到社会公众和张学良、郭松龄的关注和支持，并成为张学良的至交。1927年，阎宝航公费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1929年春回国后，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当时青年会是关外最大的民众组织，提倡博爱互助，宣传科学、体育和新文化，团结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

1923年，国共合作期间，他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逐渐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阎宝航曾组织数万沈阳民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1928年春，日寇制造了“五三惨案”，大肆屠杀济南人民，激起全国人民抗日高潮。1929年7月，沈阳人民组织了“东北国民外交协会”，阎宝航被推为常务主席，发表宣言尖锐指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挟其残暴之威焰，来临吾华，铁蹄到处，山河变色，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强迫订立，一切特权之掠取，使我国沦于次殖民地之悲



阎宝航与他的忠实伴侣、贤内助高素媛于大禹村一号

惨地位而莫能自拔。在帝国主义集团之中，对我国压迫蹂躏尤为特甚者，则为东邻日本……”。此后，他还任“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会长，领导民众焚烧查禁鸦片，与车向忱一道被民众誉为“今天的林则徐”。他创导了“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创办《常识》半月刊，通过演讲和刊物，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提倡国货，抵制日货。1929年，他被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主任，在赴日本西京出席会议时，受张学良委托，在会上宣读获得的日本侵华秘密文件“田中奏折”，揭露了日寇“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华方针，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大白于天下，使日寇恼怒万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阎宝航等撤退到北平。他和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东北各界抗日人士挺身而出，在东北同胞的支持下，于9月27日在北平西单奉天会馆宣告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培训抗日人才，动员民众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反对伪满傀儡集团。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并宣布取缔华北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亦于8月被查封。阎宝航便和高崇民、杜重远及东北军爱国将领王以哲等于当年冬成立了秘密抗日团体“复东会”，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报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1933年春，他经张学良同意，接受宋美龄邀他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干事的职务，借此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为沟通东北军与各方面的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1935年10月，他又和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等多次向张学

良进言，要求张学良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停止对红军作战，与红军合作打回东北老家去，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作出贡献，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以至“西安事变”的爆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联合东北党内外人士，于1937年4月在上海由高崇民、栗又文、阎宝航共同主持公开成立“东北救亡团体联合筹备会”。6月，“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在北平成立，阎宝航是五常委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失守，“东总”迁往南京。阎宝航积极筹集经费，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1937年9月，由周恩来和刘澜波介绍，阎宝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上海、南京陷落后，“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阎宝航也随之到武汉，负责关外抗日工作。同时主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和战地服务团工作，并被聘为国民党军政委员会设计委员，参与关于动员民众抗日计划的拟定工作。他又到西安建立“东总陕西分会”，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成批组织进步青年去延安。此后他先后把自己的四个子女明诗、明英（高玲）、明新（大新）、明智送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后来明光、明复也都投入了革命行列。

“阎家老店” 温暖无私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很快落入敌手，大批东北人流落到关内，饱受颠沛流离、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痛苦。阎宝航在积极领导抗日活动的同时，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掩护和救助抗日人士。对于那些生活无着、抗日无门的东北人，特别是东

北青年给了许多无私的援助。许多人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抗日工作，数以百计的青年由他介绍奔赴延安，投入革命队伍。他的家经常接待许多抗日人士。他在南京时，凡是有事去找他的东北同乡都留吃、留住，阎家的客厅都住满了人。

1938年底，阎宝航率总会迁往重庆，他的一家也到了重庆。他们在两路口重庆村租了17号整栋楼房。这是一座三层楼，除正门外，还有两个便门，一个可以通向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另一个通向荒僻山冈，有很好的隐蔽性。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这里成了中共地下党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重要活动据点，周恩来经常在二楼小客厅或顶楼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董必武和叶剑英也都曾多次在这里主持重要会议。阎宝航和住在附近的宋庆龄、冯玉祥也常有交往。至于一些东北军和东北抗日民主人士更是这里常客，他们在一起研讨抗日大政，和中共领导人讨论国是，倾听意见。同时根据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嘱托，阎宝航还在北碚设置了秘密的无线电台。

在此期间，他的家接待了更多的抗日人士。正因如此，他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家，实际上成了所有抗日青年的家，被人们誉为“阎家老店”。

谈到“阎家老店”，不能不谈到阎夫人高素（原名高素桐），这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妻子和母亲。她原是一位没有学历的农村妇女，和阎宝航结婚后，努力学习，支持配合阎宝航的工作，使自己成了一名有文化、有觉悟的党的妇女干部。她常常配合阎宝航的交往，活跃于高层人物之间，成了阎宝航的好助手。在外，她对别人是有求必应；在家，她细心安排家事，勤俭度日，是“阎家老店”的大总管。周总理曾多次称赞她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当时的阎家可谓是“宾客盈门”。姚艮全家、杜重远的夫人和子女、李公朴的夫人和孩子，以及高崇民、于毅夫及家属都在这里住过很长时间。陶行知也在这里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由于客人特别多，一楼、三楼都经常住满人。有时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吃饭常常要开两三桌。阎宝航作为高级官员，还兼任了大同银行大明股份有限公司经理等职，收入很高，但要招待那么多人，有时钱不够用，生活也很拮据。高素就带领孩子到街头摆摊变卖字画衣物家什，还自己动手做大酱、渍酸菜，并买了一盘石磨自己磨豆腐以改善生活。只要是投奔“阎家老店”的人，她都热情相待，从无怨言。许多人在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仍是激动不已。

阎宝航的一位故旧的子女关长庚等在纪念文章中说：抗战期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在阎大爷家吃住”，“像我们这一家老小，祖孙三代，只是阎大爷阎大娘在流亡生活中，在抗日战争期间无私援助、无私帮助过的千百个家庭中的一个，是成

千上万个同乡、朋友、下级、学生、晚辈中的一个。”

姚艮一家的经历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姚艮是东北双城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不久，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和同志们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民族义勇军，准备到绥滨、合江去打游击。1932年9月25日，姚艮受组织委派由黑河渡江到达对岸的苏联远东布拉戈维申斯克城，请求苏联当局能够对他们游击队进行必要的训练，并给以军火援助。

然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他不但没有受到苏联地方当局的信任和接待，反而被怀疑为是“要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建立据点”的间谍，投进了伯力的监狱，从而自1932年起，在苏联的远东、中亚、北极三个地区的四个劳动营中度过了长达五年多艰苦的劳改生涯，直到1938年才被释放。

回国后，姚艮到了新疆，先后在新疆督办公署编译处和新疆军校工作，但他一直未能和党正式接上关系。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姚艮接到挚友李正文的来信，

建议他去“阎家老店”，阎宝航会帮助他和周恩来取得联系。

接到这封信，姚艮很高兴，但也产生了一些顾虑。虽然阎宝航这个名字在他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此时他们四口之家一起到素昧平生的“阎家老店”去，将会给阎家造成很大的麻烦，怎么好意思呢？同时又怕接上党的关系后，带了老婆孩子，可能会影响党对自己的工作安排。这样，姚艮在反复思考后决定，自己独带儿子先去重庆。

当姚艮带着儿子忐忑不安地敲开“阎家老店”的大门时，他受到了阎宝航和夫人高素桐的热情接待。阎夫人得知姚艮为了革命事业，把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都留在了新疆时，严厉地批评说：“从东北老家出来抗日救国和干革命的，都是我们‘阎家老店’的亲友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千万不该这样想啊！”阎宝航也说：“你一家子都来，妻子照顾孩子，可以掩护你的工作，你就可无后顾之忧地工作。相反，你一个人带个淘气的男孩，倒更引起别人的注意。”尽管一见面，姚艮就受到了



抗战时期，阎宝航（后右3）同邓颖超（前左3）、刘清扬（前左2）、老舍（前左1）、梁实秋（后右2）、王礼锡（前右2）在重庆合影

阎宝航夫妇的批评，但他的内心却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深深感受到了同志之间真正友爱和骨肉亲情般的关怀。

当晚，阎宝航和姚良进行了长谈。姚良向阎宝航谈到他到重庆来是要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取得联系，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向党汇报新疆一些自发的地下革命组织情况，并请求得到党的领导；二是请党组织设法救助身陷新疆监狱里的革命同志；三是请求党考虑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姚良激动地向阎宝航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磨难。阎宝航对历经坎坷的姚良十分同情和理解。他鼓励姚良：“你这是受到了千锤百炼的冶炼。一个从饥饿、苦役、屈辱、死亡的漫长的路上走过来的人，一定会成为最坚强的人，一个最忠诚的革命者，最可信赖的好同志！我相信你今后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你回忆这些已往的灾难，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前去！”宝航同志的一番话使姚良十分激动，离开组织那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听到自己同志的肺腑之言，初来乍到的一些不安心情绪顿时消退许多。

阎宝航建议姚良尽快给周恩来同志写出书面汇报。姚良不顾旅途的疲劳，连夜写了50多页的报告，第二天一早交给阎宝航。阎宝航非常理解姚良的急迫心情，他劝慰姚良说：“我非常理解你这种急迫的心情，不过，你要注意身体，要准备承担工作重担呢……。”

中午时分，阎宝航回来高兴地姚良说：“恩来同志虽然很忙，但立即看了你写的材料。他说他要派人和你详细谈谈，让我先转告你，关于你在苏联的遭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我们有好多同志在苏联学习，遭到这种不幸的误解。他们外部受到帝国主义的夹攻，内部又有灾荒饥饿和叛乱，再加上敌人的挑拨离间，自己心中无

数，结果就发生这种亲痛仇快的事情……”这番话使姚良如释重负，心头感到一阵温暖。

下午，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宋岱（宋黎）同志来了，他对姚良说：“恩来同志叫我来看望你，并让我转告你，从全国形势看，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东的成败是关键，新疆现在是鞭长莫及。组织希望你和这些流落在新疆的爱国青年能回到东北去工作。希望你借助东北的关系回到那里去做地下工作，要有长期干地下工作的思想，准备干上十年、二十年，直到革命胜利。党决定承认和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你努力干吧！”

姚良对于这么快就和党联系上，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得到周恩来同志关于工作安排的指示十分高兴，表示一定要按党的指示尽快去东北。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阎宝航催促姚良往新疆发电报，让妻子带着女儿尽早去兰州。阎宝航又给兰州的朋友发电报，请他们帮助母女俩买机票飞到重庆。这样，在阎宝航夫妇的直接关怀下，不久，姚妻张春燕就带着女儿也来到了重庆。张春燕到来使阎夫人非常高兴，她不停地和张春燕亲切交谈，安慰他们，要他们不要见外，还认张春燕做了她的干女儿。从此，姚良的四口之家和阎家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

当时，阎家已有八九口人，再加上姚良一家，要维持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担子。为此阎妈妈想了很多办法，每到星期五、六就检出一些衣服、字画、家具交给大女儿明诗（她已从延安归来，协助父亲工作）去卖，而明诗不但要帮助妈妈料理家务，照顾弟妹，还要照看自己新生的儿子，伺候生病的丈夫；此外，还要常为东北救亡总会的事，协助父亲到处奔走。为了能多少帮点忙，在



老店家风

这段时期姚良便主动承担卖东西的任务，他常常带着明诗在附近街道摆摊卖书画和衣服等。

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姚良积极参加阎宝航组织的一些进步活动，并且担任了阎宝航的临时秘书。在一次会议中，姚良偶然遇到任国民政府检察院委员的姑父王冠吾。王冠吾在国民党内有很好的关系，是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的亲戚和至交。姚良便请姑夫把自己介绍给曾任中东铁路督办的莫德惠，请莫介绍自己去中东铁路工作。当莫德惠见到姚良，知道他是好友姚介忱的侄儿时，慨然应允，便把姚良介绍给他的朋友、东北行辕经委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张

家鳌。这样姚良一家才离开了“阎家老店”，乘飞机赴东北上任，在新的地下工作战线上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姚良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现在我问我自己，谁走的路是最好的路？我会不假思索地答道：阎宝航同志走过的路。我问我自己：你喜欢的亲友是谁？我回答自己说：是阎老伯和阎妈妈！我问自己：要向谁学习呢？我回答自己：向宝航同志、阎妈妈学习。我问自己：你一生认为在哪里在哪个家最幸福、最温馨了？我回答自己：重庆新村17号‘阎家老店’。”

英名辉煌 永垂青史

在抗日战争期间，阎宝航还有几件重大贡献的事是值得记的。1941年6月，阎宝航在一次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往的场合中，得知德国法西斯将于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内进攻苏联的准确消息。他立即向周恩来同志报告。周恩来于6月16日急电延安，党中央立即向苏联作了通报，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得时间，提早进入战备。后来斯大林为此曾致电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表示感谢。1944年夏季，阎宝航通过一个“朋友”借到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部署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重要内容。阎宝航立即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看到后，深感此情报的重要性，立刻拍照发送延安。党中央在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给苏联，使苏联对关东军了如指掌。8月8日苏军对日开战后，正是因为他们已掌握了关东军的完整布署情况，才得以在几天内就将关东军苦

心经营了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全面击溃。由此，也避免了东北受到激烈的战争破坏，比较完好地保存了工业和交通设施，为新中国以后的工业发展及作为抗美援朝的直接基地留下一个较好的基础。这是功不可没的。

抗战胜利后，阎宝航又全力地投入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1946年1月，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民主声中，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了促使会议的成功，中共在此期间多次发动民主人士举行演讲会，阎宝航常常不顾特务的捣乱，主持演讲会。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群众大会，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批特务捣乱会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多人，酿成了较场口惨案。阎宝航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奋不顾身地保护了许多民主人士。当日下午，他又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李公朴控诉国民党的暴行。随后又联络一批在重庆的东北名流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反对国民党派军队去东北打内战，呼吁和平民主建设新东北。

1946年6月初，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上海各界人民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推举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阎宝航等九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呼吁和平。代表一行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特务殴打，阎宝航挺身而出保护马叙伦，被打成重伤，住院治疗，表现了革命者的无畏精神。

1946年8月，他被东北人民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随即化装返回东北。1948年2月，辽北省政府在白城子成立，阎宝航担任了辽北省主席。他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恢复生产，并动员10万民工支援前线，为解放东北

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春平津解放后，阎宝航调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召开政协会议有关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调任外交部工作，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在外交部工作时，他起草了外交礼节报告提要，对于当时许多新加入外交战线的外交干部极有帮助。

1959年，阎宝航辞去了外交部职务，专任全国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撰写了《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复土斗争》、《沈阳建党前马列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及学生活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宴会的点滴》等文章。

综观阎宝航的一生，他一辈子都在为使东北人民从日寇铁蹄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他全身心地热爱自己的同胞，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并带领全家都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阎家老店”的风格正是他的典型表现。

“四人帮”被粉碎后，阎宝航同志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中共中央为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或送了花圈。尽管此时阎宝老的骨灰早已融入了祖国大地，但是安葬仪式的举行意味着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回来了。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了悼词，对阎宝航光辉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1995年，在阎宝航诞生100周年之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出版了《阎宝航纪念文集》，远在大洋彼岸的张学良先生以九十四岁高龄，亲笔题写了书名。阎宝航同志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

（责任编辑 元 璋）

有云水襟怀的 续范亭

● 屯 棵



1936年，续范亭（左四立者）与李公朴（左三立者）等离开延安去晋绥前线

续范亭将军有追求真理永不自满的精神，他奋斗数十载，遍猎中外经典，集各种学说精华于一生，垂范后人。

续范亭曾经系统地阅读和研究了《中山先生传》，他十分赏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乃孙先生一生奔波所得，究古今研中外，演绎复归纳，归纳又演绎，逻辑无讹始得成立。此学吾人当真实体认，勿满勿馁勿欺，用毕生之力以赴之，方可云教国，方可云救世。”他崇尚孙中山的品格和气质，认为革命者“非有鞠躬尽瘁之决心，不为功。若自己有虚荣欲享高名，亦可致败”。

他研读佛经，赞成“心物不二”之教义，汲取其精髓部分，做到“不妄作”、“不固执”，从“佛之度人有千百亿化身，能对千百亿人表同情，而相之则千百亿化身也！”从而悟出“自救莫要于悔过，纷解莫要于认错，服人之心莫要于公正”的道理来，以此来观察对待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

他拜读《甘地传》，十分推崇甘地精神，把甘地先生的一段话作为至理名言而永志不忘：“我并不把我看作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不过把我看作一个印度及人类卑微的仆人而已。我不过遵循我所知道的真理去做”，“对个人无恶感，对压迫印人制度不妥协，是我道德上之责任。”续范亭还以甘地精神为镜子，认为“革命者无此立场不配革命”，从而有选择地吸收甘地精神的闪光部分。

他研读《列宁传略》，始知“共产党革命之目的为解放人民穷乏困苦，其意诚善”。他集中外著作研究所得，认为：“印度文化大部解除心之烦恼也，中国文化大部解除事之纠纷也，西洋文化大部解除物之贫乏与不均也……三大文化合而为一，则人类之和平始可达到。”其中不乏深刻之哲理。

续范亭所以如此崇尚“中山主义”、“甘地精神”和“共产”学说，并多次提及以求贯彻，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山主义”强调了“民族、民权、

民生”为最高利益，“甘地精神”和佛学包含了“甘为人民公仆”的无私奉献精神，而共产学说又体现了“解除全人类疾苦”的至善目的。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都是基于“为民、爱民”的同一宗旨。这些原则反映到毛泽东思想里，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为人民服务”，续范亭和党内的一些其他精英们（如周恩来），就是不折不扣地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办事的。

续范亭的一个十分可贵的长处，就是他不仅熟读经典，判明是非，建立宽厚忠恕的为民意识，确立坚定正确的人生原则，而且还在于他有一种永不自满、严于律己、不断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使他最终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类拔萃的真正的仁人志士的重要前提。

“西安事变”前，他在一篇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

今早五时醒来，公私在胸中交战，幸而将敌战败。此后当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上与群魔作战，决心奋斗三十年，成败利钝非可计较，

所谓牛马精神死不休也！

他在研读佛学后也认为：佛所以为佛，是因为佛“无私”，“佛若有私也居众人之列”。推而及之，“众人无私则是佛”。他把“无私”作为座右铭而贯穿于整个人生实践中。

续范亭在晋绥边区担任领导工作时，特别推荐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出资印制该书，以供晋绥干部阅读。

在他传世的诗作里边，自省自责的句意比比皆是：“山河破碎家安在，我问将军羞不羞”、“未遂区区志，苍苍鬓已花”、“将军应在沙场死，碧血胡为染绿苔”、“拈来一句弥陀咒，拾却十年破碎心”、“愧我空留一点血，依然国难又秋深”、“四年成绩一身病，惭愧中途掉队人”……

续范亭研读经典，又不拘囿于对原文词句的一般理解，而往往对这些理论能给以新的含意，做到透彻解析，这实际上也是严格向学的一种表现。他有一首著名的《善恶》诗，原文是：

无善无恶是本体，
有善有恶阶级性。
知善知恶看立场，
为善去恶要革命。

诗是他晚期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后的一种深层次的理解和表述。另一首《读马列辩证法有感》云：

守株待兔大艰辛，
缘木求鱼不可能。
削足适履其傻汉，
刻舟求剑是愚人。

该诗对辩证法做了相当深刻形象的解析。“恩怨分明不为谁，力争只是在是非”、“学得覆地翻天手，医国医人医地球”，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也可视作他严谨求学的可贵精神。

续范亭品格的另一个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一经判明是非，认定

真理，就要以身作则，全力实践。

1939年，晋绥边区遇到一场大旱，军民严重缺粮，行署上下均以定量黑豆充饥。范亭因有胃病，且身体虚弱，组织曾建议给他以生活上适当照顾，想买点白面给他吃，但他坚决不允，直到这年的五月间下了一场透雨，旱情缓解，这才同意吃了一顿白面。他对大家说：“我们是新政权，群众生活不好，对不起晋西北人民。”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寇再次进行大规模冬季“扫荡”，粮食问题更为严重，每人每日只配给四两黑豆一顿糠，范亭亦不例外。时续老病重在身，本应调养，而他有时还要把给自己分下的一份黑豆节省下来，送给伤病员。有一次通讯员郭兴见状不忍，含泪说：“续主任，您已经三天没有吃一顿饱饭了，您又吐血，这点黑豆就留着自己吃吧。”续老严肃地说：“小鬼，我现在很好，老毛病了，吃什么都不管用。伤员吃饱了，能很快恢复健康，上前线多杀几个小日本。”范亭经常犯胃病，一发作就疼得满头大汗，浑身发抖，贺龙曾千方百计给他找来一盒止痛针，但他坚持不用，而是让郭兴随时给他准备一块砖头烤热熨敷，执意把止痛针留给伤病员用。

范亭去世后，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唯独一生不聚财产、不敛钱物，一生清贫，两袖清风，至死不渝。他在自己的诗作中常有一些如：“赤膊条条任去留”、“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黄金身外物，美女雾中花”的诗句，道出他追求的人生哲理。“诗堪入画方称妙，官至能贫乃是清”。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送给续范亭一张条幅：“土积而成阜，水积而成江海，行积而成君子”。其实，许多社会学中的理想化人格，均已在范亭身上完美地实践了。他就是“行积而成君子”的典范。

“爱”与“恨”，是在是非基础上的感情释放。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说过：“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他的憎爱所在。续范亭也曾借古文抒发：“古人说过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我今天是宁为牛后，不做狗头。共产党是牛，因为牛吃的是野草，又给老百姓流着奶汁，因此我乐于追随共产党。国民党的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憎恶他。”

“无情未必真豪杰”。他对一切卖国贼汉奸，如袁世凯、汪精卫、阎锡山等恨之入骨，而对当时领导穷人打日本、闹革命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推崇备至，心悦诚服，喻毛主席是“万古云霄一羽毛”，说朱总司令“朴素浑如田家翁”，赞周恩来“站正立场理不穷”；他与贺龙、关向应、王震及延安诸老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有一次毛主席专门设宴招待续范亭和另外几位同志，饭后在丁香树下谈心。范亭记述当时情景：“在座诸君，皆为颇牧，吾人咏歌，愿宗高鲁”，“阵阵清风拂面过，纷纷花瓣入茶来”！其悠然欢乐之情，跃然纸上。

对于范亭的品格情操，与他一起生活过的人们的评价是最有说服力的。毛主席题词“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即是对其品格情操的极好评赞。“有云水襟怀”者不乏其人，“有松柏气节”者亦或有闻，两者兼而有之，却犹如凤毛麟角，实在难能可贵的了。

与范亭一起生活共事多年的延安诸老，还留下一些情真意切的对范亭人品的赞喻诗句。如董必武诗：“代郡多豪杰，先生更出群。怀才能拨乱，许国已忘身”。林伯渠的“豪气当年仍未挫，丹心许国昔犹今”，徐特立的“真正中山徒，落落数星辰”，谢觉哉的“艰难百历皈真理，爱智双修具睿思”。

（责任编辑 杜先）

在鄂西受到错误处置时的

陶铸

● 聂菊荪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们这批青年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对日寇的疯狂侵华战争极为愤慨，大家都无心再在学校读书了，只有一个愿望：投身到抗日战争，为抵抗和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战斗！平津沦陷后，到8月13日，北平西城区委老高到公寓通知我，说区委要我赶紧转移到武汉去，并约好了联络地点。我于8月15日离开北平，经天津、烟台、济南、南京，9月20日前后到达武昌。不日，李声璜（我们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的儿子，原燕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当时在武汉担任省青委副书记）按预约地址找我，约定次日到他的住所谈工作。

我到李书城先生寓所找李声璜时，正遇他陪李书城先生送陶铸出门。陶铸那种清瘦的身材，文雅的气质，锐利的目光，朴素的衣着和敏捷的举止，使人一见就留下难忘的印象。李声璜说陶铸是省工委领导人，前不久在南京由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保释出来的。还特别说到陶铸在福建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身患肺结核症，仍然不顾生死为党工作。他观察问题锐敏深刻，很有才华，是位敢作敢为的党的领导人。李声璜这样赞不绝口，更使我这样的青年党员对陶铸肃然起敬。

后来得知，陶铸在主持湖北省工委工作期间，还特别受董必武委托，先后拜访过李书城、石瑛、孔庚等湖北的国民党元老，并结识了李范一、周苍柏、杨显东、孙耀华等爱国进

步人士，他广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活动。当时，日寇侵占上海后正疯狂向华东沿海、华中内地进犯。为准备日寇侵入后，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经杨显东、张心一等倡议、奔走，董老同石瑛当即表示可以用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委员会名义办合作社训练班，训练农村合作指导员派到农村，组织农民抗战。后决定在湖北应城汤池举办合作事业训练班，由湖北省建设厅原厅长李范一先生出面主持，并由董老同周恩来与湖北省委商酌，决定派陶铸与李范一先生合作，举办汤池训练班。陶铸同志受命后，选派曾志、潘怡如、刘顺元、刘季平、黄松龄、陈辛仁、李华、雍文涛、顾大椿、刘慈愷、蔡承祖、童世光、沈少华等先后到汤池训练班任教和从事党的工作，成为训练班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陶铸同志与李范一、杨显东先生共同策划，将汤池训练班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招生标准、作息时间以及生活管理等商定就绪，立即在武汉进行招生工作。第一期招收了当时由华北、华东流亡到武汉以及武汉本地大中学校六十余名男女学生，其中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多数是愿意跟党走的积极分子。第一期于1937年12月20日开学。训练班以延安抗大为榜样，除《农村合作事业》课程外，开设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战略与战术》、《农民运动》等课程。训练班除课堂讲授、分



1940年，陶铸（前排右一）在鄂中抗日根据地组讨论外，还进行军事训练。由陶铸同志带头，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学员不仅学到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军事知识，而且经受了实际锻炼和考验，提高了觉悟和能力，为深入农村基层工作打下了基础。在每期学员中都吸收了一批党员。这些学员绝大部分成为鄂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共办了4期，培养了三百多名青年干部，以湖北省建设厅的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派到应城、京山、安陆、天门、汉川、汉阳、钟祥、云梦、孝感等县以及鄂西北、鄂北、鄂东各地，与当地进步人士以及回乡青年学生相结合，通过读书读报、演讲演剧、教唱抗日歌曲、出墙报、成立合作社、办合作商店等活动，组织各界救国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训练班学员深入农户，访贫问苦，通过合作社贷款，救济贫苦农民，活跃农村经济；还举办保甲人员训练班，挑选其中热心抗战和农民群众认为比较好的人员进行培养等等，为动员和组织农民参

加抗日游击队，作了各种准备。

肺结核病当时属难治之症，陶铸不顾疾病缠身，为训练班日夜操劳。他团结党内同志，尊重党外民主人士，与大家共甘苦，深受党内同志和党外人士的敬重。李范一先生是一位留学美国的农业专家，为人耿直，早年也曾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怀有某些偏见。范一先生与陶铸结识后，佩服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曾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横幅赞颂陶铸的高尚品德。范一先生对国民党越来越不满，他曾写对联，上联“三民主义”，下联“四季发财”，痛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陶铸对同志，对朋友，都有这种“春风风人”的强烈的感染力。张谦光原也是对共产党怀有某些偏见的原国民党应城督学，他本是受国民党县政府之命到汤池训练班进行监视活动的，但他耳闻目睹了陶铸等共产党人在训练班中的一言一行，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毅然放弃了国民党县督学的职务，义无反顾地留在汤池训练班学习，当了一名“编外”学员，从此转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鄂豫边根据地，先后担任过应城县委书记、鄂中专员、地委书记，1946年五师突围中不幸在鄂西地区被俘，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陶铸同志主持汤池训练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为培养干部人才，为准备在湖北农村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当地进步青年和人民群众的广泛爱戴，受到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和当地开明士绅的敬重。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和反对，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非难和干扰。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调别动队进驻距汤池不远的皂市进行监视活动，中统特务徐恩曾等人先后到汤池收集情报，国民党应城、京山、天门等县党部的党棍特务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进行监视，蒋介石也亲自出马责问王明：“你们怎么在这里办起了红军大学、抗大来了？”王明屈从蒋的旨意，回来指责说：“陶铸太左”，“训练班不要讲马列主义、游击战争，只讲合作社就行了”，“妨碍统一战线，不要再

办了”等等,王明与蒋介石对陶铸同志形成内外夹击。

不久,1938年5月间,在汉口安仁里湖北省委党训班召开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批判陶铸。当时我担任汉口区委书记,出席这次会议。名为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但主持会议的不是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而是博古代表长江局(其实是代表王明)主持召开。会议第一天,博古宣布陶铸两条“错误”:一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二是“对长江局闹独立性”。但除了说“办汤池训练班左了”之外,没有讲任何具体内容。博古讲话之后董必武发言,董老只是说陶铸到汤池办训练班是他同周恩来和省委商定的,只说“陶铸同志个性强”,对于博古指责的两条没有表态,以后的会议也没再参加。会上发言直接批评陶铸的也并不多。到第三天下午,博古宣布长江局决定:撤销陶铸同志在湖北省委的职务。博古问陶铸“还有什么意见”,陶铸对所谓“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对长江局闹独立性”两条,没有正面反驳,只说“我对长江局不重视农村工



陶铸与夫人曾志在湖北汤池训练班

作,将大批党员干部留在城市而不派到农村,不积极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是有意见的,我还保留意见”;他表示“我组织上服从长江局的决定”(指撤销在省委的领导职务),最后提出“请求回到汤池去工作”。陶铸的请求,使在场的许多人动容,博古最后也只好表示同意。会议稍事休息后,由省委书记郭述申宣布省委决定:成立鄂中特委。之后,省委还专门致信鄂中特委:“现在,陶铸同志是一名普通党员,你们应该敢于领导他。”当然,陶铸在党内决不是一名特殊党员,确是一名普通党员,是对党忠诚、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的普通党员。在王明、博古的领导下,他们对陶铸可以作出诸如此类的组织处理,也会一度造成“陶铸犯错误”的种种影响,但毕竟不能限制陶铸坚决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顽强精神和党内多数同志明辨是非的能力。在以后的长时间里,陶铸在鄂中特委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但他在大家的心目中,仍然是为人们所敬重的党的干部,大家都称他“陶先生”、“陶胡子”,表示对他的尊敬与爱戴。

历史证明,当时王明、博古对陶铸的指责,其实,就是因为陶铸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不同意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就被指责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陶铸认为,在日寇向华中扩大侵略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必须把大批干部派到农村准备游击战争,不同意把大批干部留在城市,向博古提出过意见,就被认为是“对长江局闹独立性”。战争形势的发展,证明陶铸的意见是正确的。日寇在徐州会战后,疯狂向安徽、河南、湖北地区进犯时,号称十万大军的国民党徐源泉部不战而溃,武器到处丢弃,国民党军人逃散时用武器换便服,甚至四五元可换一挺机枪,如我们加强了党在农村的工作,就有可能收集到大批武器,组织起众多的抗日游击队。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我们党的农村工作薄弱,徐源泉十万大军的武器大多被地方豪绅地主或地方流氓势力所获取,组织成形形色色的地方民团。后来这些恶势力大都投靠日本侵略军,成为武汉

地区名目繁多的敌伪军,反而使我们失去迅速发展抗日游击力量的时机。

历史还证明,陶铸会后回到应城汤池,更坚决地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依靠鄂中共产党员,深入应城、京山、安陆等县农村,发动群众,动员当地开明士绅和应城矿区资本家,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他的工作继续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关怀,董老还按照陶铸的要求委托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从香港购进二十支驳壳枪供应应城游击队使用。他在应城组织起徐休祥、蔡松荣领导的应城国民抗敌自卫总队,在京山石板河组织起黄定陆领导的京抗大队,为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汤池加紧特务活动,对李范一先生也进行监视。范一先生担心陶铸的安全,劝他到鄂西地区避一避,他才暂时离开了鄂中。武汉沦陷前后,周恩来同志请省委转告陶铸赶紧返回鄂中。陶铸立即冒险赶回京山丁家冲鄂中特委机关,受到同志们热情欢迎。此后,他同鄂中特委一起,更加放手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立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当时曾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名义,成立了鄂豫边抗敌委员会、抗敌指挥部、政治指导部等军政机关,李范一先生为指导部主任,陶铸被聘请为顾问。进而委派孙耀华为应城县长,将国民党应城县政府改组为鄂中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为创建鄂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段期间,为发展鄂中应城、京山、安陆、云梦一带的抗日游击战争,陶铸又率领徐休祥、蔡松荣领导的应城抗敌部队,于1939年4月前后,突袭攻入日寇盘踞的云梦县城,日寇逃窜,伪军被歼灭,取得鄂中抗日游击战争的首战胜利。

尽管陶铸在鄂中根据地建立了不朽功绩,但是由于王明以长江局名义对陶铸的错误处理在鄂中党内长时间影响不散,陶铸仍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据曾在华中局担任刘少奇秘书的栗在山回忆,1938年冬少奇同志在河南竹沟主持华中局工作时,约当时鄂中特委书记到华中局汇报工作,曾提到准备由陶铸任新成立的鄂中省委书记。少奇同志提出这项任命,旨在纠

正王明对陶铸的错误处理,肯定陶铸在鄂中所作的贡献;但少奇的意见没有为这位同志所理解,他以“鄂中有些同志对陶铸有意见”为由,表示不同意陶铸任鄂中省委书记。如果当时按少奇同志的意见办,鄂中的工作会发展得更好,对以后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贡献更大。

1940年春,鄂豫边区党委选派陶铸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决定由我护送陶铸到鄂西省委,再由鄂西省委护送到重庆南方局转赴延安。临行前,陶铸跟我这个曾参加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说,他这次去延安,要向中央把过去的问题讲清楚。我当然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两人化装成汉川田二河小学教员,除鄂西省委的一位交通同志外,由童世光找到田二河商会的陈会长为我们带路。这位陈会长经常来往于田二河到沙市一线,沿途非常熟悉。我们一行路经国民党一二八师控制的沔阳,国民党金亦吾部控制的潜江东乡地区,经沙市到宜昌,找到由鄂中转到宜昌担任盐业银行经理的孙耀华,通过他找到鄂西省委书记钱瑛,至此,我的护送任务安全完成。此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再见到陶铸。直到解放后,才知道陶铸到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经中央纠正了王明、博古的错误处理,并由中央委以重任,在延安先后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政治部秘书长。日寇投降后,由延安赴东北,先后担任辽宁、辽东、辽西省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协助罗荣桓主持四野政治部工作,在辽沈、平津战役以及解放华南等战役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陶铸同志所著《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所集《松树的风格》一文,赞颂松树那种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不畏风霜的风彩,鼓励人们“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重读陶铸这段情意深挚的肺腑之言,倍感亲切,读之如见其人。历史证明:他就是我们党的一位具有他本人称道的松树那样崇高气质的人,一位真正具有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共产主义气质的伟大战士!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不拘一格的项南

● 钟沛璋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一个半世纪前，诗人龚自珍面对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仰天长叹，呼吁“不拘一格”的人才出现。所谓不拘一格，就是破除因循守旧的积习，高扬创造精神。项南同志正是这样一位不拘一格的富有创造精神的难得的人才。

我认识项南是在1952年。他从安徽调到上海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东团委第二副书记，主管宣传。我当时任华东团委主办的《青年报》总编辑。项南同志是我的领导，他给我许多帮助，印象最深的是修改社论。有一篇社论，我自认为立意明确、文字流畅。项南看过却删掉了许多，在一段话的结尾加了一句：“难道不是这样吗？”他说何必写这么多不必要的话呢？我一看，文章果然改得更加简洁有力了。毛泽东过去尖锐批评过“党八股”。但是几十年来，套话、空话还是积习成风，没有新意、使人望而生厌的文章，充塞于许多报刊。项南同志很早就敏锐地看到了这点，抵制这种歪风。他后来到福建主持工作，还曾亲自执笔，为《福建日报》写了一篇只有三百字的社论，使许多人一新耳目。

文如其人，项南平时话语不多，但一开口却常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他生活朴素，作风严谨。在华东工作时，一次我随他到苏南出差。出差嘛，总要带上些行李，我提了一个旅行包，项南却挟着一件衣服就走了。他谢绝接待单位的宴请，他说：“我们是出来工作的，不是来吃请的。”轮到他接待客人，他也常不拘一格。他在福建时，一次接待一些海外著名华人，没有很多

大鱼大肉，却拿出红薯、小米等土特产来招待客人，看到大家吃得很高兴，他也十分开心。他说：“这些土特产，平时他们很少吃，或吃不到。这样招待，既亲切，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

项南严格要求自己。他说这是他年幼时接受他父亲熏陶的结果。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当时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的父亲一次带他见一位朋友，辞别出来，走了一段路后，他父亲突然说：“我的帽子忘在朋友家，你回去帮我取回来。”项南回头一看，上海弄堂的闾窟门房子，全是一式模样，他几乎辨不清哪家是父亲朋友的家。原来这是他父亲有意这样做的，看看项南是否事事留意。

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中国青年报》工作。第二年，华东大区撤销，项南也调北京到团中央工作，先任宣传部长，后任书记处书记。当时他没有直接管报纸工作，但是开会，或为团中央起草文件，常在一起。他在团中央工作十分活跃。他鼓励青年在生产建设上发挥突击作用，向官僚主义和歪风邪气作斗争，同时又全面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他引导青年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和远大理想，反对贪图享乐的思想。他组织农村青年开展扫盲活动，并且还亲自编写文化课本。他鼓励学生和知识青年向科学进军，掌握先进技术，勇攀高峰。他针对当时男女老少都一律穿蓝色服装，被外国人讽刺为“蓝色的蚂蚁”的现象，专门成立服装改进委员会，提倡青年大胆穿“花衣服”。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是胡耀邦，这位十八岁就任少共中央秘书长的老革命战士，一生就是永不知疲倦地开拓创造。在胡耀邦领导下的团中央，是一个生气勃

勃的集体。项南是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助手。

1956年,中国的形势很好。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精神的方针和设想。全党都在考虑怎样进行社会改革,以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团中央也在酝酿改革,研究如何开好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以调动全国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当时毛泽东对青年团的状况也有一些批评,说:“青年团不能躺在党的怀抱里”,“青年团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活动”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团中央领导层曾多次召开会议进行探索。项南在会上有一个重要发言,中心是提倡青年团应该群众化和民主化,反对把青年团变成一个为青年包办代替的官僚机构。梁步庭和其他一些同志对青年团的改革,都提出了一些建议。1956年11月5日的会上,我也作了一个发言,我说:“我非常拥护项南同志发言的精神,要使青年团群众化和民主化。但是要补充一点:要从全体青年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青年团进行种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怎样使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怎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坚强能干的接班人。”

本来,在团中央领导层和会议上,探讨团的改革,以开好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完全是合乎情理的。项南等同志有胆识的发言,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也证明是正确的。说有胆识,因为过去青年团的历史上,曾批判过所谓青年先锋主义,使一些团干部如毛泽东批评的“躺在党的怀抱里”,不敢离开半步。项南等的发言是在1956年的内部会议上,跟1957年的所谓“大鸣大放”没有关系,但是到了1958年,有人却挟“反右派斗争”的余威,在团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对项南等人在1956年的发言开展猛烈的批判,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项南、梁步庭都被撤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项南还被贬到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我也被撤销中国青年报的领导职务,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再次见到项南,已是二十多年之后,经过



项南同志

那些岁月的风风雨雨,我看到他谈笑风生,精神依旧。当时他在农机部工作,曾多次出国到资本主义国家考察。我问他这些国家情况怎样,他回答说:那样的“资本主义”好得很。明快干脆,非常使我吃惊。在“文革”中听惯了天天唱的“社会主义就是好”,你怎么能说资本主义好呢?不是说资本主义早就腐朽、正在一天天烂下去吗?项南告诉我说,他去英国考察时,在马克思墓前的草地坐了半天,静静地思考过,感到我们从观念到体制都必须进行改革,要学习和引进别人先进的东西,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

我当时还没有从“恐资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对项南直言不讳的说法感到吃惊。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公平地评价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宣言》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列宁也多次强调,只有把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东西学过来才能建设共产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也曾多次进行改革。特别是新的技术革命,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进入了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此时如果我们再不认真地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怎么能赶、超别人,建设比资本主义先进的

社会主义呢？原来，项南是在批判假马克思主义，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项南在农机部工作期间，积极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农机现代化做出过突出贡献。而放开手脚，为我国改革开放施展自己才能，是在1980年以后他主持福建工作期间。

1982年，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新闻局的工作。在福建召开省报总编辑会议期间，我去看望项南。他兴致勃勃地陪我参观正在兴建的厦门经济开发区，谈如何引资，引进先进技术。福建面对台湾，过去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国家没有什么建设的投资，在全国属于经济落后的省。项南到福建后，走遍山山水水，深入调查研究。他满怀信心地跟我大谈福建的特点和优势：山多，可以发展果木和经济作物；海岸线长，可以利用海水和滩涂，发展捕捞和养殖业。他说福建就是要大唱“山海经”。为了搞活国有企业，他最早提出了“松绑放权”的口号。

广告

他针对全省底子薄、基础差的状态，大胆提出“乡镇企业打头阵”，继江苏之后，使福建乡镇企业在短时间内得到蓬勃发展。项南的很多说法，在本本里是很难找到的。所有这一切富有开拓精神的创举，使许多“唯书”、“唯上”的人目瞪口呆，也遭到一些人的嫉恨。项南后来离开了福建。但是福建人民至今念念不忘项南同志在福建的重大贡献。项南主持福建工作期间，是建国以来福建发展最好的时期，特别是他为福建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项南同志是79岁时心脏病突发逝世的，这样的年龄也算是高龄了，但是大家还是深深地痛惜他去世得太早了。原因就是，在迈向21世纪之际，我们中华民族多么需要像项南那样“不拘一格”的富有开拓创造精神的人才，而一个半世纪前龚自珍所忧虑的阻挠“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乌云，还时时笼罩在人们头上。

(责任编辑 杜晋)

治癫名医——王文生

在太原火车站背后，有一家规模不大的、名声却不小的医院——太原癫痫病医院。这所医院的创建者，就是名闻三晋的癫痫病名医——王文生。1993年6月22日，山西省卫生局邀请天津中医学院及省内著名专家，对王文生研制的科研成果“愈痫再春丹”Ⅰ号和Ⅱ号进行了鉴定。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本研究提出癫痫病的初发期以豁痰开窍、化痰熄风、养血止痉、清肝泄火为主；后期以醒脑平肝、镇静安神、补益心脾为主要治则，达到同类病科研先进水平。”几年来，王文生用中药配制的“愈痫再春丹”先后治愈了数万名病人。

癫痫病俗称抽风病，被称为世界四大顽症之一。中医提供的治疗方法很多，但效果都不太理想，所以患者只好服用西药，不仅副作用大，且疗效甚微。为了攻克癫痫病，王文生决心研制出一种疗效既佳，又无副作用的中成药来。他开始翻阅《内经》、《金匱药略》等古籍，着重研读其中论述癫痫症的部分。他认为：虽然癫痫症的临床表现甚为复杂，但其病因不外乎风、火、痰、虚四方面。病势初期往往以痰邪、肝风为主，病情发作后期才表现出正气亏损、肝肾阴虚，所以癫痫症的实质仍为心血亏损、脾肾虚弱导致正气不足而致。

在炮制药的过程中，王文生用新法炮药，甚至冒着中毒的危险，亲自品药，确认药性。寒来暑往，王文生经过一次次试验之后，终于研制成了癫痫良药——愈痫再春丹。据几年来临床观察，此药疗效十分显著，为此《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都报道过他的医疗事迹。目前，“愈痫再春丹”已在省内、国内、国际上荣获多次药品评比大奖、金奖，并已喜获国家专利。该药将投入大批量生产，造福更多的癫痫病患者。（为方便外地患者就医，该院可邮购科研成果“愈痫再春

解放军郑州高炮学院医院 治疗肿瘤效果好

解放军郑州高炮学院医院肿瘤专科在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传统中医学理论，成功地研制出以口中含化中药丸、膏药外贴穴位，内外相结合的独特疗法，主治食道癌、贲门癌、胃癌、喉癌、肺癌、肠癌等。该疗法尤其使用于不宜手术、化疗、放疗或愈后又复发的患者，对改善痛、咳、肿、呕吐一至三天可见明显效果。一般用药一至三个疗程，饮食可逐渐恢复正常。经数千例患者临床验证，该疗法效率高、见效快。经多方治疗无效和对此失去信心的患者，请与本院联系，有专家负责咨询，可汇款购药。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建设东路24号

来院路线：从郑州火车站乘101、103路电车或9路汽车到高炮学院站下车东行50米即到（门诊楼三楼）

联系人：宋国厂 电话：(0371)7937081

丹，星期天、节假日照常应诊，欢迎各地联办分院。）

太原癫痫病医院地址：太原市双塔北路63号（太原火车站背后），邮编：030013 电话：(0351)4372527、9003088（手机）

北京分院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外永定路东街3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科专病治疗中心 电话：010—68224642 联系人：李培英

陈毅赋诗悼念亡妻

肖菊英

● 陈干群

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
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

检点遗篇几首诗，几回读罢几回痴。
人间总比天堂好，宿愿能偿连理枝。

依稀门角见冰姿，影去芳踪我不知。
送葬归来凉月夜，泉山渺渺汝何之。

革命生涯都说好，军前效力死还高。
艰难困苦平常事，丧偶中年泪更滔。

这是陈毅写的《忆亡》一诗。诗前有这样的话：“余妻肖菊英，不幸牺牲，草草送葬，夜来为诗，哀哉。”

肖菊英烈士牺牲于67年前，年仅20岁，知者不多。在大型电视专题片《共和国之魂》的“十里杜鹃红”中曾谈到她。

肖菊英，1911年出生于江西信丰县城，念高小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她担任了信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席。1927年10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一部分部队进入信丰作短期整顿时，她主要从事宣传和支援红军的工作。1928年2月，信丰农民暴动攻打县城失败后，她与郭一清（1930年攻打长沙时英勇牺牲）、钱逸民等一批革命青年撤到油山、龙回一带打游击。1930年6月，陈毅率部再次进入信丰，组建了红二十二军，肖菊英从此转入红军部队，分配到军部参谋处担任秘书，同年9月在泰和县与陈毅结婚。后转战赣西南各县，她除继续担负秘书机要工

作外，还兼任了赣西南特区区委妇女部长。1931年夏，在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肖菊英牺牲于兴国县，时年20岁。

肖菊英的父亲肖恩炳在县城开设一家土布商店，为人忠厚，好行善事，有五男一女。聪慧秀丽的肖菊英童年读过私塾，后来，在她的姑父即我的父亲陈辉琳（家父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后从事教育和律师工作）的引导和支持下，冲破封建礼教，就读于信丰采芹学校。她品学兼优，爱读进步书籍，积极寻求革命真理，擅长写诗文、吹笛箫，还有天赋的好歌喉。她积极活跃，勇于反抗封建礼教和反动势力。她带头剪短发，抵制妇女缠足，积极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动员女青年跨出闺房闹革命。她乐作公益事情和帮助同学，经常从家中拿出钱来购买宣传用品和资助贫困同学，深得学校师生信任和爱戴。在反对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减租减息和抵制日货等活动中，她身穿蓝衣黑裙的学生装，朝气蓬勃地常常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她在街头的讲演宣传，时时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

肖菊英在“支红”工作中，她的才干和人品很快被朱德和陈毅同志发现。她参加陈毅亲任校长的红二十二军干部学校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是成绩优秀的学员，又是文娱活动骨干。当时大家对这位身高一米六几、皮肤白净、举止大方的女学员，称誉为美丽而又能干的女红军战士。

陈毅与肖菊英认识不久，相互爱慕，朱德和毛泽覃又热心从中撮合。陈、肖二人商定后又去争取菊英父母的支持。

这天,菊英回家兴奋地告诉母亲,陈毅军长明天要到家里来拜访,并要吃一顿家人做的饭菜,他最喜欢吃的菜是夹肉馅的酿豆腐和辣子炒小鱼。第二天,陈毅带着警卫员到了。菊英帮助母亲做了四菜一汤,除了酿豆腐和炒小鱼外,有红烧肉、蒸水蛋和萝卜汤,还煮了一壶滚开的甜米酒。陈毅吃得很香甜。席间,他爽朗开口:“我今天来府上,一是看望二老,二是登门求婚。菊英政治觉悟高,工作热情能干,我很喜欢她,只是我俩年龄相差大了一些。她有文化,我也是法国留学生,能配得上吧?”菊英的父母对此事已有思想准备,母亲胡金兰是县妇女解放协会常务委员,思想进步,由她代表老人表态说:“陈军长能看得上菊英,是她的福气,只要她本人同意,我们完全赞成。”就这样,肖菊英与陈毅订下了婚事。

订婚不久,肖菊英要随同陈毅率领的红军部队撤离信丰。临行前,菊英和陈毅又一同来向父母告别。陈毅和菊英身着戎装走上家门,警卫人员牵着一匹白马和一匹黄马跟在后面,到家坐定后,菊英对父母说:“我们部队马上要出发开往远处,这次走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会。”她最后咬住嘴唇低沉而坚定地说:“我已作好准备,如果革命不成功,不会再回来。”父母抚摸着即将离别又前程莫测的爱女,难分难舍潸然泪下。陈毅见此情景,安慰岳父母莫要悲伤,并提议能否送一件菊英心爱的东西作纪念。母亲犹豫了一下,看到拴在门外供菊英骑的那匹黄马背上没有鞍子,便到内屋找出了她自己陪嫁的一条红毛毯,搭在马背上。这条红毛毯,寄托了父母一片真诚的心愿,祝福即将离别的菊英、陈毅以及红军部队,旗开得胜,革命早日成功!

肖菊英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爱国捐躯精神一直受着严峻考验。1930年,肖菊英由从事苏区地方工作的岗位调到红军部队之后,正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盛行,“肃反”不断扩大化的时期,赣西南是“肃反”抓“AB团”(所谓富农反革命组织)的重点地区,陈毅被打成了“AB团团长”,知识分子出身的肖菊英自然被打成“AB团的骨干分子”。当时,这些革命同志一方面要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深入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发展红军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左”倾路线的残酷审查,随时有不明不白被“整肃”掉的危险。面对着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肖菊英



肖菊英烈士画像

始终坚定地与陈毅战斗在一起。

不幸的是,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有一次恰在陈毅外出开会的情况下,肖菊英的驻地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肖菊英和她的战友们奋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她身上多处负伤,毅然跳井殉节。待陈毅率部队赶回打退敌人,已经迟了。这位女红军战士的遗体草草埋葬在兴国平川中学后面山坡的红土地上。满山的青松,为这位宁死不屈的英烈肃穆默哀;遍野的杜鹃,向这位伟大的女性啜泣告别。

陈毅对菊英的牺牲,悲痛万分,送葬归来,在油灯下整理亡妻诗文遗稿,哀思切切,写下了本文开头引用的《忆亡》诗。

陈毅还曾化妆到信丰,向菊英的父母报告这一噩耗。1949年8月,信丰刚刚解放,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从上海致电给赣南军管会主任杨尚奎,再次提到肖菊英烈士的牺牲和她的忠骨已被“围剿”的敌军挖掉之事,托附杨尚奎代向菊英的亲属表示抚慰。1950年,陈毅又特邀请菊英的母亲和兄弟等人去上海见面,倾诉亲情之谊。1952年,陈毅同志又给菊英的母亲寄去近照,以示对亡妻肖菊英的怀念和对老人的抚慰。

(责任编辑 文贤)

我所拍摄的 “文革”纪实照片 主人公任仲夷

● 李振盛



中共十五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任仲夷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80年，任仲夷出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他和省委一起率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以惊人的速度，奇迹般地把这个“圈”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深圳经济特区。

32年前，我为当时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拍摄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惨遭批斗的照片，被他的家人视为“最宝贵的财富”。任仲夷历尽“文革”磨难，痛定思痛，立志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中，我作为一名青年摄影记者，拍摄了近十万张疯狂岁月的历史见证照片。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幅照片背后的故事，足以让没有经历过那场苦难的人们看了既毛骨悚然又难以置信——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被造反派们揪到几十万人的集会上当众侮辱人格，戴高帽、抹“鬼脸”，惨遭迫害。

1997年9月，我在采访中共十

五大时见到了广东代表团代表、十五大主席团成员任仲夷，将三十多年前拍摄的这幅照片赠送给83岁高龄的任老。1998年1月，我又专程南下广州，看望并采访了这位德高望众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我们在一起抚今昔、忆往事，共话沧桑向未来。

史无前例大疯狂 革命干部成“黑帮”

“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毛泽东曾在他的诗词中豪情奔放地写下如此浪漫之绝句。今天，当人们回首三十二年前发生的那场恶梦般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时，却怎么也浪漫不起来了。

1966年，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革命风暴席卷祖国大地”，哈尔滨市有名的八区体育场，被造反派们更换了一个时髦的名称——“红卫兵广场”。自那以后的十年间，各种名目的“革命造反集会”便在这个新生的“红卫兵广场”上轮

番举行，各色人等竞相登台表演，虔诚与愚昧，暴虐与罪恶，都被冠上“以革命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着一幕幕人间悲剧。

1966年9月26日我作为《黑龙江日报》的一名青年记者参加了黑龙江省委机关和哈尔滨市几十万人的遵照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最高指示”，在红卫兵广场召开的“火烧省委炮打司令部大会”。参与组织这次大会的一名省委机关红卫兵悄悄告诉我：“今天要当场揪斗黑帮分子任仲夷！”当时，任仲夷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他既是黑龙江省的“走资派”，又是哈尔滨市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就被拉下马、靠边站了。他虽多次在省市机关和许多单位被戴高帽挂黑牌批斗过，但是，还没有在这种几十万人的规模浩大的集会上被当场揪斗、示众。

我听到这个信息，赶紧背起相机走下主席台在体育场去寻找任仲夷。广阔的体育场地里以及一排排

水泥看台上人山人海，红旗猎猎。在杂乱无序的会场中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只见任仲夷坐在哈尔滨市委机关干部与群众的队伍里，他平静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表情。他身穿一件白衬衫，褪了色的蓝制服上衣搭在左胳膊上，泰然地坐在水泥看台上，认真地听着造反派们在揭发批判省委“忠实执行刘少奇、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任仲夷作为一位历经沧桑、经过风雨的革命领导干部，怎么也想不到今天将要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如痴似狂的“暴风骤雨”。

让被赶下台的领导干部与革命群众一起参加批斗会，美其名曰“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对于已经靠边站，“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走资派”们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政治待遇”。而今天这次批斗会，纯粹是造反派预谋的一场闹剧而已。会前早就策划好了要揪斗任仲夷，只有他本人被蒙在鼓里，一会儿只等一声吼叫，就要把他揪上台去挨批斗了，他却全然不知。当时这种作法叫“当众揪斗”，据说这种举措能够“充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由于这种“当场揪出”的突如其来的现场效应极强，往往使那些利令智昏的造反派们的神经备受刺激，常常伴随着一些平时难以发挥的歌斯底里般的疯狂。

当时，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只承认党中央是“红色司令部”，其余的各级党委都被称之为“黑党委”。当在台上发言的一个造反派一桩桩一件件揭发“黑省委”的“修正主义罪行”突然有意提高了嗓门点到任仲夷的名字时，事先安排好的一伙人立即高呼口号：“把黑帮分子任仲夷揪出来！”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迫不及待地抢过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道：“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大会主席团决定：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仲夷揪出来！”随即台上台下响起一片排山倒海般的“打倒

黑帮分子任仲夷”的喊叫声。

三尺高帽头上戴 一盆墨汁泼满身

我端着照相机一边拍摄，一边观察任仲夷的神色变化。当吼声响起之时，他仿佛早有思想准备地站了起来，沉稳地等着挨揪了。手中拿着的那件蓝上衣似乎想要交给旁边的人代管，却没有人敢去接，他稍犹豫片刻，便把衣服放在原先坐着的水泥看台上。

说时迟，那时快。事先安排坐在任仲夷左右的两个大汉也随着大喇叭里的喊叫声腾地蹦了起来，大喝一声：“走！”抓住他的胳膊架起来连拖带拽地直奔台上。四周响起一阵又一阵“打倒任仲夷”的声浪。那时在大会上批斗领导干部基本程序是：挂黑牌、戴高帽、抹鬼脸、站椅子。特别要说一下，这天专门为任仲夷准备了一把折叠椅，这种椅子让人很难站稳，稍往前站就会一头栽倒，稍往后站则会使椅子折叠起

来，连人带椅一起摔倒在地。

事先做好的高帽子和黑牌子上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红卫兵们给他挂上黑牌子，又拿来高帽子要给他戴上，这个帽子倒是够高的，足有三尺多长。红卫兵并不知道这位省委书记戴多大号的帽子，高帽做小了，戴不上就使劲往头上扣，硬是给撑破了，直往下掉，怎么也戴不住。这时，有一名红卫兵想了一个鬼点子，在撑破了的高帽子上拴一根绳子，逼着任仲夷把双手反背到背后，紧紧抓住绳子的另一头，才使这顶破了的高帽子不至于掉下来。

接下来轮到抹鬼脸了。一个红卫兵端过来一脸盆墨汁掣到任仲夷面前，先是逼着他把两只手伸进墨汁盆里蘸满墨汁往脸上抹，然后将脸盆高高举起，对着90度弯腰站在折叠椅上的任仲夷的脸使劲一抖，激起的墨汁弄得他满脸漆黑，眼睛和鼻孔里都灌进了臭烘烘的墨汁，墨水顺着他的鼻尖和下巴往下滴，滴到水泥地上斑斑点点，拍摄成黑白照片也分不清是血是泪还是



“文革”中，黑龙江省省委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情景

墨。

又上来一个红卫兵拿起饱蘸墨汁的毛笔往任仲夷的白衬衫上歪歪扭扭地写上“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造反派们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过瘾或不够刺激，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墨汁，扯起他的衣领顺着脖颈子灌到后背……

这幅照片中的红卫兵们一个个在煞有介事地挥着手高呼口号，黑龙江电视台的一位女摄像师在操纵着一台硕大的摄像机作现场直播；背景中的“四个伟大”巨型标语牌两侧红旗猎猎，好一派“红色恐怖”气氛。

一向崇尚人道主义精神的我，见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情景，被震惊得目瞪口呆，心里暗想：虽然《毛主席语录》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难道“革命”就应当是这么个革法？这位我曾多次采访过、十分熟悉的省委书记，他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作风在记者群中是有口皆碑的。今天，这位受人尊敬的省委书记竟如此这般惨遭人格侮辱，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之情油然而生，一时竟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随即又清醒地意识到：“应当记录下来，留下历史见证！”我轮番使用背着的两台135和120相机，拍了一张又一张。

历史见证载史册 任老视为家中宝

1988年3月，《任仲夷惨遭批斗》这张历史见证照片与我的19幅“文革”纪实摄影作品作为系列组照，以《让历史告诉未来——疯狂年代实录》为题，在“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荣获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当这个影展首次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出时，当时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亲切地接见了，并鼓励说：“你为国家、为人民记录

了历史，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的！”随后，国内外诸多媒体广泛刊载了这组文革系列纪实照片。

《任仲夷惨遭批斗》等文革纪实作品，先后被载入中外多种重要历史画册之中，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五个一工程”奖的《图片中国百年史》大型画册，美国蓝登书屋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大画册，以及《中国摄影40年》画册和《中国新闻摄影50年》大型出国展等均收入了这幅照片；同时，还被国际间多家博物馆收藏。

1996年5月，“文化大革命”30周年之际，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香港《亚洲周刊》等世界主流刊物纷纷以超常篇幅刊载了《任仲夷惨遭批斗》等文革系列纪实照片，并配发评介文章。由于任仲夷在广东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开放的事迹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他有关的这幅照片也备受瞩目，纷纷评价说这幅照片“纪录了一个著名人物的令人痛苦又难忘的经历，是一个时代的写照”；还称赞“这些照片既具有艺术价值又具有历史意义”。

1997年初，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期间，哈佛燕京图书馆和费正清东西研究中心商谈永久收藏我拍摄的《任仲夷惨遭批斗》等若干幅文革纪实作品。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表示将设专柜陈列与收藏。我在燕京图书馆还查阅到有关任仲夷的相关档案资料，称他为中国的改革派重要人物之一。

我拍的这张照片在十年前还引出一段悲喜剧一般的故事……

1988年3月，“艰巨历程”影展在北京开幕之时，任仲夷当时作为广东省领导正在中央开会，他听说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斗的照片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便抽空专程前往参观，看了一次又一次，先后去了三次……我得知这个情况后，不免有

些不安，暗想，我将任书记当年惨遭批斗的“丑象”照片公开展出，可能惹他不高兴了，若就此提出异议，我可就麻烦了。

不久，《大众摄影》编辑部主任欧阳杰女士告诉我：“任仲夷同志的儿子任克雷从广州到北京来找你，想要你拍摄的他父亲在文革中戴高帽子被批斗的那幅照片。”我听后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心中暗暗叫苦：果然找上门来了！

后来听任克雷介绍才知道，任老在京开会期间曾前往中国美术馆观看展览，他站在自己这幅惨遭迫害的照片前面，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回到广州后，嘱咐他儿子到北京一定设法找到这幅照片的作者，要一幅这张令他永生难忘的历史照片作为永久纪念。任克雷诚挚地说：“这幅照片将是我们任家最宝贵的‘财富’，一定要永久珍藏！”

我听后方释重负，欣然赠送照片，并对劫后余生的任老面对被迫害被侮辱的往事所持的豁达襟怀，深表敬佩之情。我在想：等有机会时一定去拜访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十五大上喜相逢 当面赠送老照片

1997年，在世界的东方，发生了两件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事件——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我以美国中文杂志《天下华人》总编辑的身份，先后获准采访了这两大新闻事件。

当从十五大新闻中心获悉，83岁高龄的任仲夷是十五大正式代表，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我兴奋不已。多年来想再次见到任老的机会终于等到了！

十五大是一次空前开放的大会，中外媒体一千五百多名记者云集北京，有一些省市代表团的小组讨论第一次允许外国记者自由采

访,并为中外记者举办多次新闻发布会。

9月4日,广东省代表团的小组讨论对中外记者开放,我一早便赶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这次采访。目的很明确:要见任仲夷。讨论正在进行中,我先通过广东省委书记逸了一张字条给任老,写明我就是31年前为他拍摄“文革”中挨批斗的照片的记者,现正在采访十五大,希望能安排时间见见面,我特地准备了一幅大照片要当面赠送。没过多久,从会议大厅里走出一位青年人,他是任老的秘书小黄。黄秘书说等散会时安排我与任老见面。

那天,采访大会的港澳台和外国记者全都云集广东代表团的讨论会场,专门来听任仲夷的发言,或等着采访他。当他开始作“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的精彩发言时,数不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他聚焦,文字记者们都是一边录音一边作笔记,好一派新闻大战的热闹景象。

我焦急地等待着散会时刻的到来。接近中午时分,只见一群中外记者扛着摄影机、照相机从会议厅里拥出来,又都回过头去把镜头对准会议厅的大门,我猜想这准是在抢拍散会后即将走出来的任仲夷。当任老走出会议厅时,黄秘书把我拉到任老面前作了介绍,任老十分热情地说:“你就是那个给我拍了‘文革’挨批斗照片的记者李振盛啊,我早就想见你了。”我把那张大照片当面赠送,他看到我在照片背面写的话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不能重演!”连声说:“好,好,这句话写得好!”随后,任老高兴地与我共同拿着这幅三十多年前的历史照片面对着诸多摄影机镜头合影。我的女儿李笑冰是香港《文汇报》记者,也在现场采访,她见此情景便拚命挤进记者群的前排,用傻瓜相机为我们拍下了



任仲夷与
本文作者
(摄影:姚
文举)

这张历史性的珍贵纪念照。

当天晚间,黄秘书挂电话到我家,代表任老再次向我致谢,并询问是否还有“文革”中任老的其他照片,若有的话任老希望每样要一张,以作纪念。最后,任老告诉我,这次十五大议程安排十分紧张,实在没有空闲时间再深谈,约有时间到广州去。

第二天,香港的《东方日报》在“中共十五大专版”上,刊发了任老与我拿着《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文革”照片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的现场新闻照片。不久,《南方周末》在“百姓留影”栏目中,将我女儿拍摄的十五大上的合影片和三十一年前我拍摄的任仲夷惨遭迫害的历史照片放在一起发表。见报后,我先后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都说这种历史追踪式的报道很有意义,看后令人深思,希望我多搞一些这种类型的报道。朋友们的肯定与鼓励,令我十分欣慰。

南下广州再聚首 天南地北纵横谈

1998年元旦刚过,我南下深圳

讲学,同时应约前去广州采访任仲夷。

1月6日晚抵达广州,住在交通方便的新华社广东分社招待所。当晚即与黄秘书联络,得知任仲夷正在深圳,下榻银河宾馆。我决定于8日赶往深圳去拜会任老。

第二天清晨,黄秘书急电找我,说任老当天要赶回广州,明天要参加广东省人大会议的开幕式。黄秘书说:“任老知道您来广州,他很高兴。任老说今天由深圳返回广州之后,下午四点半到您住处见面。”我一再告诉他我住的招待所没有电梯,惟恐任老年迈上下楼不便。黄秘书说:“任老已知道您住在四楼,没有电梯没关系,任老说他爬四层楼没有问题。”

想来想去,还是不忍心让一位84岁的老人爬这高高的四层楼,一层又没有大厅或接待室可以会客。与广东分社的朋友谈及此事,他们说可借用一墙之隔的新华社二楼会议室会客。下午四时过后,我与在广州工作的老同学姚文举一起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大门前恭候。不久,一辆黑色轿车开来,黄秘书与任老先后下车,我欲搀扶任老上楼,他说

从来不用人搀扶。任老连楼梯扶手都不扶就健步走上二楼，进了会议室从容稳健地坐下来，谈笑风生。

我首先问候任老的身体康泰，他风趣地说：“我的身体很好啊。去年动手术把胆切除了，这样我就浑身是‘胆’了；后来又把胃切除了，这样我就无所（胃）畏惧了。”我笑道：“任老还像三十多年前那样健谈，讲起话来幽默风趣，幽默得有质量，风趣得够品位。”任老摆摆手说：“不行了，现在老了，头脑思维和嘴巴讲话，都不像当年那么好使了……”

随后，我们共同回忆起在“文革”中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每天都被揪出去作“喷气式”，弯腰低头挨批斗，有时一天要连续批斗两次，上一个单位还没批斗完，下一个单位的造反派早就等在会场外面了。在批斗“走资派”最频繁最紧张的头三四年当中，累计大约被批斗两千多次。有一次，他被造反派逼迫连续弯腰批斗长达六小时之久。任老回忆着那些恶梦般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岁月，还自言自语地说：“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支撑过来的……”

任老一面看着我送给他的一些“文革”中的纪实照片，一面沉思着说道：“‘文革’中那种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哪里是革命哟！革命，是要讲政策的，是要讲纪律的，是要讲法制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党中央也一再强调，要以依法治国，就是这个道理。”他稍作停顿之后说：“看来，真正能实行法治，还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呀！”

我诚挚地对任老说：“你老人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丰厚的社会教科书；您率领群众搞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社会财富，这一切都应当写出来，留给后人，留给社会。”任老笑着说：“我有一个自己的‘三

不原则’，第一，不出文集；第二，不写回忆录；第三，不写自传。如果别人要去作，我无权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但是，我只希望一定要实事求是，朴实无华。”

改革开放先行者 有口皆碑受尊敬

在采访十五大时，有一位海外华人记者曾对我说：“任仲夷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为国际所公认的，世人敬佩并赞赏他在广东大胆领导改革开放的勇气和魄力。”另一位外国记者则说：“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任仲夷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建筑师。是他把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的那个‘圈’变成了举世瞩目的深圳经济特区这个美好的现实。”我同意并赞赏他们的这些观点，这说明凡是为人民作了功德无量的事，总会得到世人崇高而公正的肯定与评价。

今天，神州大地遍开改革之花，广结开放之果。人们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据广东新闻界的一位朋友对我讲，当年上面曾有人说“要警惕有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顶大帽子曾使身处改革开放前哨的干部群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一把手的任仲夷在全省干部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要警惕有人打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来反对改革开放！”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直接问起这件事，任老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有这么回事。”在我与任老的接触过程中，没有听到他讲述自己任何一件“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令人肃然起敬。

他当年冒着极大风险讲的这番话，为深圳特区和广东省的干部群众撑了腰，壮了胆，使改革的步伐迈

得更坚实，开放的进度更快了。在当时，敢于针锋相对地如此这般讲话，是需要具有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的。这位新闻同行说，当今天的人们充分享受着并品味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与甜头时，广东的广大群众不会忘记任仲夷这位可敬的老人！

我们的谈话在不知不觉之中过去了近一个小时，实在不好意思再多占任老的时间。我向任老介绍在一旁为我们照相的姚文举是我大学时的老同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他现在担任哈慈集团广东省分公司的总经理，并且与任老住在同一条街上，是仅相距数十米的近邻。我们当年都是任老在哈尔滨当领导时的市民。他听后十分高兴，风趣又亲切地说：“这样说来，那咱们都是哈尔滨老乡喽！能在广州见面，这也是一种缘份，那咱们一起照个相吧。”任老热情地与我们两位老同学在一起合影留念，让他的秘书小黄为我们三人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纪念照片。

我拿出几幅三十多年前拍摄的“文革”纪实照片请任老在上面题字，他看着这些疯狂岁月中的照片陷于沉思之中。随后，便挥笔在一幅当年与他一起当省委书记的李范五、王一伦、陈雷等被剃了“鬼头”游街示众的照片上边写了“历史悲剧不能重演！”几个大字。又在当年他的老同事、陈雷省长被挂黑牌遭批斗的一幅照片背面郑重地写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重演！”还在他自己当年被戴高帽挨批斗的照片边上签上名字，并注明日期：1998年1月7日。

任仲夷，这位历尽“文革”苦难的老人，痛定思痛，立志改革，成为一位受人爱戴的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责任编辑 余广人）

蹲过敌我四次监狱的 贾植芳

● 孙觉民

老友自京门来信，鼓励我写写我们的乡亲贾植芳先生。苦于对贾植芳知之较少，学习研究不够，所以几次动笔又搁下来。但是，贾植芳在人生和事业上的追求，以及他个人的坎坷遭遇，传奇经历，使我不能默然处之，无动于衷。于是不揣浅陋，叙此梗概，向这位远方的老乡致意。

我们家乡的年轻人，对贾植芳的名字是比较陌生的，在新编《襄汾县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贾植芳被收入“高级知识分子”一节，只有短短一行简介：

“南侯村人，1916年生，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

《山西通志·文化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介绍建国前山西作家与作品时，两次提到贾植芳，虽只寥寥数语，但要言不烦，基本上反映了贾植芳创作上的成就。志书惜字如金，限于体例、篇幅，仍着意于对这位远离家乡亲人的充分肯定，这是难能可贵的。何况，贾植芳除童年在家乡上过小学，以后颠沛流离，浪迹江湖，很少回家；即使返乡，停留

时间也是暂短的。

1928年，13岁的贾植芳，告别了家乡的黄土高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年他考入太原成成中学。1931年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北平崇实中学高中部。其间，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入狱，保释后负笈远行，亡命东瀛，入日本大学社会学专修科学习。“七七”事变爆发，他毅然回国，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而今八十高龄，乡音未改，乡习仍存，喜吃家乡饭，爱穿土布衣，对生长、哺育他的黄土地和家乡淳朴的民俗风情，有着深厚的感情。

襄汾县位于山西省汾河下游，侯村是该县西部姑射山脚下的丘陵地区。村民以务农为主，因交通闭塞，至今仍沿袭古老的传统耕作方法。靠夏天山洪浇灌，洪水夹杂着牛羊马粪、残枝败叶，可肥土壤，所以一般年景产量不低。但因争水（和下游）、争地（水毁地重划），村和村、户和户之间打架斗殴，刀刃相见，时有发生。居民勤劳勇敢，性野、强悍，富有斗争精神。贾植芳自称自小生性顽劣，倜傥不

羁，经常闯祸。后来在事业上顽强拼搏、坚持真理、扶正斗恶，恐怕和养育他的黄土地有很大关系。

贾植芳从中学时代就接触新文化思潮，发表文艺作品。《一个兵的日记》揭露了旧军队的黑暗与腐败，在太原报纸连载后，引起读者的关注。此后，在平津沪报刊发表了一些小说、杂文，崭露头角。在日本，他和左翼文化运动发生联系，成为新文艺队伍的一员。回国后，以笔作枪，投入战斗，发表了大量作品。报告文学《嘉奇尘先生和他周围》，介绍了老共产党人嘉康杰团结群众，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光辉事迹；《我乡》通过返乡见闻，揭露日伪暴行、反映敌占区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品发表后在大后方引起强烈反响。以后陆续结集出版了《人生赋》（小说集）、《热力》（散文集）、《人的证据》（小说集）、《契诃夫的戏剧艺术》（翻译）等。除了文学作品，又出版了专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翻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这是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力作。

贾植芳年轻时自号“洪宪生人”，即生于袁世凯称帝那一年。历经共和再造、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与“五四”精神影响下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以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自己的路。他爱憎分明，信心坚定。通过创作、翻译、编辑、教书，倾注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伟大时代和劳苦大众的关注和系念之情。由于他的文章坦诚泼辣，因此招致某些人的误解和不满，他吃官司正是由此而引起的。1935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进了北平军阀的监狱；1945年，因策动伪军反正，进入徐州日伪警察局特高科的监狱；1947年，在上海，因撰文声援“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进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的监狱。新中国建立后，正当他庆幸有个舒心安定的环境，积极投入教学和写作的时候，不料1955年5月竟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被捕入狱。直到1966年3月，才正式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时他已被关押了10年零10个月）。出狱后又戴着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押回复旦大学“监督劳动”。正如他所说，“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使我迷惑不解：怎么我在人民政权眼里，竟和在国民党和日伪内外反动派的眼里是一个‘东西’呢？是悲剧、闹剧、还是荒诞派戏剧？”他一生蹲过四次监狱，高墙内外交错更替，构成他漫长的、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并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历史已经证明，所谓“胡

风反革命集团”，是一起大错案、大冤案，其株连人员之广，拖延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的确是少见的。胡风是一位进步的、战斗的作家。正如贾植芳在《人的悲哀》中所说：“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先生之后又一位正直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同时又是青年人赤诚的朋友。”贾植芳崇敬胡风，他给胡风编的刊物写稿，经胡风介绍出书；他被国民党扣押后，胡风又为之奔走营救。仅仅因为是胡风的朋友，或者是文学事业上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就被株连入狱。他苦苦追求，勇于战斗，当他梦寐以求的新社会到来之际，得到的却是冰冷的镣铐，这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1966年那场不要文化的大革命中，贾植芳虽是一条“死老虎”，但身为钦定要犯，几类分子之一，挨批挨斗，非人待遇，自然在劫难逃。连他并不参加社会职业的妻子任敏也被无辜关押，陷身囹圄，继而发配青海，后被下放贾植芳的原籍“监督劳动”一十八载。贾植芳一生坑坑洼洼、颠颠簸簸、曲折坎坷，正折射出这一代知识分子苦难经历的一个侧面。

贾植芳虽身处逆境，但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真理，相信历史必定会还他以清白。他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我的思想，文化性格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形成的。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自觉献身于祖国的进步事业——救亡运动；又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这两条可以说是我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

……关于这一点即使我蹲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我也不曾动摇过、怀疑过。”1980年，党中央发布文件，为胡风集团错案平反，所涉人员恢复政治名誉与原工作职称。贾植芳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但这一天来得太晚了，这时他已年逾花甲，垂垂老矣！当他年富力强，应当有所作为的时候，在他创作上、教学上留下一片不应该留下的空白。

贾植芳复出后，继续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带这个专业的硕士生，还为博士生、外国访问学者开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和上海通俗文学研究会会长。他冬尽逢春，重振旗鼓，继续战斗。近年来编辑出版了《贾植芳小说选》、《劫后文存——贾植芳序跋集》、《悲哀的玩具》（作品选）、《暮年杂笔》（散文集）、《雕虫杂技》（散文集）、《在历史的背面》（自选集）等十多部文集、专著。国内外多家报刊登载了关于贾植芳的访问记、印象记和对他的作品研究文章。贾植芳80寿辰时，他的学生、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孙乃修所著30万字的《超越苦难——贾植芳传》作为“中国文化名人丛书”之一，在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贾植芳研究热”像旋风一样正风风火火震撼文坛。

祝愿这位远方的老乡余热生辉，桑榆为霞，晚年幸福！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田家英临终袒露心境 的见证人

● 曾 自

田家英喜爱的一枚古章，
上刻：“活泼泼地”



《炎黄春秋》去年约我写一点回忆父亲的文字，因公务繁忙我未敢答应，后又将刊载其他同志写我父亲文章的杂志送我，使我和家人很受感动。

我的父亲田家英生性活泼、开朗，长期在中央机关严谨有余的氛围里工作，竟一点没有改变他那洒脱不羁的性情。他有一方从地摊上买来的古印章，上刻“活泼泼地”，他特别喜欢，我以为那正是他的本性。

父亲喜与人交往，好友来了，或清茶一杯，或茅台一盞，品酌之间，纵论天下。他曾对人说，他视人生两件乐事，一是读好书，一是和志趣相投的人聊天。的确，父亲有许多可以交谈的朋友、书友、挚友。

何均伯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父亲去世前见到的最后一位友人，也是父亲临终前袒露心境的见证人。我在这里写出来，以回答希望了解我父亲临终前情况的读者。

何均与父亲早在延安就同在中宣部共事，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岸

英学文化，熟悉中国国情。在父亲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老总的秘书。建国初在香山的那段日子，工作之余，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聊天，他们默契地称毛泽东和朱老总“你的那个老汉，我的那个老汉”，以后又都在中南海工作，两人一直保持着交往密切的关系。

1966年5月23日是父亲含恨去世的日子。那天上午，何均去看了他。何伯伯后来给我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他回忆说：

“1966年5月23日是星期一，上午8点钟，我到西楼上班，路经家英所住的永福堂门口，我的心不禁紧缩了。昨天晚上汪东兴给秘书室紧急开会，传达了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停职反省的决定，他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戚本禹原是田家英领导下的一名普通干部，他个人表现欲极强，不安心本职，屡受家英批评，曾调到我负责的后楼研究室工作，后他的一篇带有明显政治批判色彩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使他展露头角，不久，被陈伯达调到《红旗》杂志，在以后思想理论战线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戚本禹投江青所好，步步青云，让他接替家英的工作，用心何其毒也。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几个月来，形势越来越紧我们早有预感，但这么快就对家英下了手，连我也觉得太突然了。那把杀人的刀一下就架到家英的头上，这么大的压力他能承受吗？虽然上班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我仍禁不住想去看看家英，安慰他？宽解他？我也说不清……”

“永福堂的门没有锁，院子里静极了，平静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走进房内，只见家英呆坐在办公桌前，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想象得出

这一夜他没有睡，见到我，他微微点头，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了平常常坐的那把椅子上，就在他办公桌的对面，我们面面相视了。家英抬眼望着我，他那平日一向坦诚的眼里，这天却让人望不到底，我想告诉他昨天晚上传达中给他扣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然而他那忧郁悲愤的目光，使我话到嘴边却再也说不出来。家英就这样望着我，他什么也没有说，嘴闭得紧紧的。是啊，他无需再解释什么，在我们之中，谁不知道，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毛选四卷的编辑工作，主持撰写了毛选的全部注释。1962年北戴河会议，因他主张包产到户，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就在以后的几年，家英又编辑了《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毛著（选读）甲乙种本。直到1966年初，也是在他力主下，说服毛泽东上马了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还是由他作前期编辑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家英可以说对领袖掏尽一颗赤子之心。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用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加害于他，手段何其毒也！我想告诉他‘五·



60年代初田家英摄于杭州

一六’通知后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成为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我知道家英把陈伯达、江青视为恶人不是近期的事，他历来对江青不敬不畏，避而远之，江青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至于陈伯达，此人贪人之功，透过于人，心地偏狭，家英一贯称他为‘伪君子’，与之长期斗争。就在前不久，我和家英出中南海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书店，一路还谈到陈、江，家英说他们日趋走红，戚本禹又被重用，他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十分压抑。此话不幸竟被家英言中，再与他议论陈、江又有何意义？”

说到此何伯伯哽咽地讲不下去了。

何伯伯哪里知道看似平静的永福堂头一天发生了怎样惊人心魄的事情。5月22日是星期天，下午3点，王力、戚本禹等突然来到永福堂，事先未打招呼，行动带有几分神秘。一进门，就向父亲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作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的思想一贯右倾，决定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在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没有稍微的解释，也没容父亲说什么。至于何伯伯所说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是晚上传达时又加上的。

整个下午都在清点文件，包括毛选五卷的文稿，毛泽东的重要讲话稿等，一份份地清点着。6点左右，戚本禹带着主要文件走了。望着满地满桌的纸片，一片纷乱中，父亲的眼睛扫向茶几上的那个精制的蓝布盒子，这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页页装裱得非常精致，这是他跟随毛泽东十八年来，利用一切便利条件，一点点收集的。父亲酷爱毛泽东的书法，这些被他视为“国宝”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和自作诗，饱含着他对领袖的崇敬和爱戴。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这些墨宝交不交呢？父亲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了。

余下的文件一直清点到午夜，12点电话铃响了，是戚本禹打来的，在旁的妈妈没有听清说了什么，只听到父亲摔掉电话筒的声音。父亲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

重读 1940 年延安一次大会的 名誉主席团名单

● 于光远

六十年来，我们党召开过两次规模盛大、意义深远的全面讨论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的会议。近的一次是 1956 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远的一次是 1940 年初，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未用党中央名义，实际上是党中央召

开的。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在这个大会上发表的。近的那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远的那一次在延安有 123 个各行各业文化人的个人代表和 107 个与文化工作单位有关的 274 人参加。那次大会上没有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而是用“文化人”三个字，它的含义与知识分子相当，它包括文学和艺术家，也包括社会科

西，我就是不去签字！”戚本禹的电话是故意打来的，他要父亲半夜到西楼去在收文件的目录上签字，纯粹仰仗江青之势施威风，落井下石，父亲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侮辱。

从三人小组来过后，整个下午到晚上，父亲一言未发。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愤怒的心绪，对妈妈说：“我的问题是陈伯达、江青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

我的讲述使何伯伯百感交集，他接下去说：“那天我在家英处，坐在他的对面，整整半个小时，我们竟然没有说一句话。多年的交往，我太了解家英了，他性情耿直，看问题尖锐敏捷，认准的道理他敢于坚持，敢讲真话。尤其对陈伯达，家英就是不买他的帐，两人争论起来，陈伯达操着福建话，口吃得很，根本辩不过家英，常常被家英顶得哑口无言。我们虽然佩服家英，但也为他捏一把汗。但家英还有另一面，就是非常重感情，他为毛泽东服务了十八年，忠心耿耿，把才华和心血都奉献给毛泽东，他对我说过，毛主席不仅是人民的领袖，也是他的恩师。他对毛主席充满感情。毛泽东晚年重用陈、江之流，听信他们的谗言，家英对此十分痛心和不可

忍，多次向我们几个知己好友表露过他的心情。我思前想后，再也找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话，这时家英像是自言自语，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士可杀，不可辱！’我知道家英这句话的所指，是他绝不愿受陈伯达、江青等人所辱，这是他的性格，但我没有想到他已抱定了以死抗争的决心。

“星期一班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我起身告辞，家英坚持要我再坐一会儿，我坐下，但仍然相对无言，如是者三四次。后来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好一会儿，我必须离开了，家英遂起身送我，一直送到永福堂的院门口，我几次要他回去，他执意送我，仍默默无言。

“就在我离开之后的那天上午，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何伯伯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饱经人世沧桑。他告诉我，“文革”后从干校回北京，不少人劝他写一点关于家英的文字，他答应一定写，但一拿起笔来，便不禁茫然，那如烟的往事使他心绪难平，难以落笔啊！

我想，父亲留在人们心中的永远是一颗鲜活鲜活的生命，他那充实而光明的内心世界，又岂能用文字表达得清。

（责任编辑 洛松）

学、自然科学与技术专家。

今天我只想写这个会的一个情况，介绍这个大会的名誉主席团的名单。

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提出一张名誉主席团的名单，在大会上通过，是那时延安通常的作法，目的是使与会者知道有关的值得尊敬的名人，并向这些人致意。做这样的事情是有一定意义的。1940年的那个大会在其开会的第二天，便有这样一个议事日程。那一天提出和通过的大会名誉主席团的名单有36人，他们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米丁、肖伯纳、绥拉菲莫维奇、法捷耶夫、伐尔加、亨利曼、多罗利斯、辛克莱、蔡元培、宋庆龄、邵力子、于右任、冯玉祥、何香凝、孙科、沈钧儒、张一麟、茅盾、郭沫若、杨秀林、毛泽东、王明、洛甫、周恩来、吴玉章、凯丰、徐特立、董必武、博古、张鼎丞、成仿吾、潘汉年。

时代不同了，活动在世界和中国舞台上的人物变化了，我们党开会时的指导思想、工作习惯也改变了。从这样的名单中可以看到两个时期名单学的原理虽然有相通之处，但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想归纳成下面若干条：

(一)名单中第一名是斯大林。其理自明，毋须陈述。

(二)名单中第二名是季米特洛夫。当时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大会名誉主席名单中有他，并列为第二名，是为了对共产国际表示尊重。名单中外国的政治领袖只有这两个人。

(三)名单中外国文学家比较多：罗曼·罗兰、肖伯纳名声很大；绥拉菲莫维奇是《铁流》作者，法捷耶夫是《毁灭》的作者，他们两个是苏联当代小说家；辛克莱是《屠场》、《石炭王》的作者，美国作家；亨利曼恐怕就是德国作家亨利希·曼，他的作品我未看过；多罗利斯不知何人，也许是美国黑人作家杜波依斯，但字音差得太远了。

(四)名单中还有三个外国人：一个是“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一个是苏联的反对德波林起家的哲学家米丁；还有一个是苏联籍匈牙利

利人经济学家瓦尔加(这儿写的是伐尔加)。这个会讨论的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这些方面，因此在名誉主席中，这三个方面也各有一个外国人。

(五)在12个外国名人名单外还有24个中国人，在这里有几种情况：(1)蔡元培、宋庆龄两位德高望重，不必说了；(2)邵力子、于右任和孙科是国民党元老中我们可以接受的，列入他们带有讲统一战线之意，冯玉祥更亲苏亲共；(3)沈钧儒是上海救国会带头人，“七君子”中的主要人物。张一麟，据曾彦修记忆，其经历与沈相似，是前清翰林，当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与沈过往甚密；(4)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都是左翼文化人，潘汉年也是。把潘列入名誉主席团评价甚高，不知最近上演的电视剧《潘汉年》的剧作者是否知道潘曾列入过这样一张名单？(5)杨秀林即杨秀峰，党的教育学家，建国后曾任教育部长。

(六)国内24人中也列入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毛泽东在这个名单中放在民主人士、国民党元老、左翼文化人茅盾、郭沫若、杨秀林等之后，这表示那时党的谦逊，和对党外人士的尊重。在这张名单中列入了洛甫和周恩来，但没有列入主要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工作的我党的领袖人物。名单中列入王明、凯丰、博古等人是反映当时党内的一种状况。

(七)董老、吴老、徐老三人列入名单，表示敬老。吴玉章在这次会议中不仅列入名誉主席团名单，而且是主席团(实际主持会议的主席团)的成员，他是大会主席团和大会名誉主席两张名单中都列入的一个人。这个会议的开幕词和闭幕词都是吴玉章作的。会场上除了挂出“文化人团结起来”、“建立抗战建国文化理论”等横幅标语和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几个人的题词外，还有吴玉章的题词：“文化是时代物质的反映，文化人又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因此文化人必须站在时代思潮的最前线。”

我的这些介绍和看法恐怕未必都恰当，算是我读陈年旧报的一个笔记吧！

(责任编辑 洛松)



王超北在香港

购军需巧遇许厚钰

● 王超北

1924年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做地下工作。大革命时期搞兵运，先是在西北国民军驻陕独立二师任党代表，后任杨虎城十七路军张汉民团的军需主任。离开张汉民部后，仍在西安一带搞地下工作，以西安雍懋商行经理的身份作掩护。

抗战初期，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任命我为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运输科长，主要工作是负责为八路军采购及运输物资。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西安事变”爆发，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八路军在平型关的巨大胜利，共产党、八路军成为民族民主运动的希望和救星，受到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关注和爱戴。青年们纷纷涌到西北来，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八路军。各界人民竞相解囊向共产党、八路军捐款和赠送各种物资。当时有一位受德国法西斯迫害而流亡到中国来的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他是牙科医生，在西安开了一所牙科诊所，成为各界捐赠给八路军的医疗卫生器材及其他物资的联络站，我就负责这些物资的转运工作。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拥护，这是一股强劲的东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军第八路军后，在西安成立了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为党代表，负责办事处的工作。

1938年7月，林伯渠同志根据总部指示，要我去香港一趟。任务

是：把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国际友人及华侨捐赠给八路军的一批物资设法运回来。这批物资主要有医疗卫生器材、救护车、各种通讯器材及被服等。同时，叫我采购一批器材，特别是无线电台和无线电台配件等。

当时，虽然国内外各界友人捐赠了许多物资，但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围剿，八路军仍然缺医少药，电台等军事通讯器材更是奇缺。

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十分高兴。但从西安到香港，路隔千山万水，困难不少。我向组织表示，坚决克服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我略作准备，携带由朱老总签署的证件，就出发了。领导上考虑到此次工作的需要，给我加了个少校军衔：八路军总部少校运输科长。

到了香港，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的交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要购买的物资、医疗卫生器材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在购买电台通讯器材时，遇到了麻烦。急需的电台等军用通讯器材，香港的市场不仅短缺，还受控制。

我在香港转了几圈，都找不到我们所需的军事器材。有的，不但质量不高，而且价格昂贵。有一天，我在一家英商怡和洋行发现了一批军用通讯器材，价格也还可以。我很高兴，就向怡和洋行的老板提出要购买一批。老板打量了我一下，

冷冷地说：“现在没货。”我指着摆着的货说：“这不是有吗？”他说：“已订出去了！”

既然他说无货，我也只好到处去找。可转了好几天，仍找不到货。于是，我又去怡和洋行，老板还是说无货。我问：“什么时候能来货？”老板慢吞吞地说：“不知道！”我觉得这里边有文章，不象真无货。于是我就和他聊起来，想探个究竟。

“老板贵姓？”

“敝姓许。”

“听口音，许老板是内地来的。”

“不错。”他仍缺乏热情。

“许老板有点上海口音。”

他说：“我不是上海人。不过在上海住过多年。”

我盯着他看了一下，忽然想起来，有点似曾相识。于是，我便进一步问：“你认识徐璋吗？”

经我这一问，他楞了一下，下意识地看着我，似乎也想起了什么。连忙说：“认识，认识。你就是王先生吧！我们确实见过面。”说罢，他连忙站起来伸出手和我紧紧握起来，并说：“快请里屋坐！”

这位许老板，名叫许厚钰。30年代初，彼此在上海经徐璋的儿子徐璋的介绍而认识。已快十年了，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相见，一时都不认识了。竟演了一出“三岔口”。他原是安徽人，进过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又去美国麻萨诸塞理工

大学学电机工程。

入座后,我便问:

“别后,许老板可好!”

“说不上好。为生活,忙于奔波。”

“你是什么时候来香港的?”我问。

“1935年入英商怡和电机公司任工程师,不久,任怡和洋行董事。”

接着,他问我:

“王先生别来一切都如意吧?”

“说来话长。抗日开始后,我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这不,我奉命来这里接受国际红十字会赠送的货物,同时想采购些军队需用的医疗卫生器材和军用电讯器材。其他东西都已办妥,就缺少一批军用电讯器材,香港这方面的货,似乎也紧缺,只有你这里还有,所以就奔贵洋行来了!”

“王先生,你怎么不早说,这事好办。你们需要多少,我供应多少。如果我们真的无货,我也可以帮助设法解决。价格一定从优,款没有,可以先提货!”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我喜出望外,忙插上一句:“如此,我代表八路军总部谢谢你!”

许老板说:“不,不要谢我。我应该谢谢你们才是。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话怎讲?”我有些疑惑不解。

许老板给我续了茶,又递过一支烟。然后说:

“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一次我从香港回上海,在海上被海盗船劫走。那伙海盗很凶残,他们要我立刻拿出两根金条。我苦苦哀求,我说:‘在这茫茫大海,我到哪弄这两根金条?你们得让我先回家呀!’他们根本不听,说拿不出金条,就送我见阎王。我想,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我闭上眼睛等他们开枪。果然,砰地一声枪响,火药味很浓。我想这下子,我可真的完了。可我

没有死,身上也没有伤。原来,这时海盗遇上了几只船,以为是商船,就开枪行抢。那几只船立即开枪还击,并迅速向海盗船靠拢。那伙人很勇敢,跳上船命令海盗交枪。海盗也只得乖乖放下武器。我想,两伙海盗火并,不会有我的好。哪想到那伙人走到我跟前,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就如实相告。他们立即给我松了绑,对我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海陆丰游击队,是除恶霸、打土豪、打日本,为人民办事的。’他们还给了我路费,送我上岸。他们真不啻是我的救命恩人。否则,我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我一直铭记着共产党的恩情。今天,你的这点事,包在我许某身上了。”

听了许老板的一席话,我立刻明白了他原说没货的意思。他也似乎明白了我的疑问,说:“先前我说无货是假。我对军用通讯器材有三不卖:一,海盗、土匪不卖;二,日本人不卖;三,价格低了不卖。”

你刚来时,我不知你的身份。再说,目前这种货很紧俏,正在看涨,所以拒绝了,真抱歉呀!”

我听到这里,立刻取出了朱总司令签署给我的身份证,许老板看后,情绪更是兴奋。他立刻拿出一架军用望远镜,托我转送给朱德将军,并说:“朱德将军乃当代名将,我十分敬仰。无以为赠,仅以此略表寸心。祝朱德将军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由于得到了许老板的帮助,我很顺利地购齐了所需的各种器材。

我以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身份,取道越南,经海防、镇南关(今友谊关),入广西,过贵阳、成都、宝鸡,顺利地到达西安,乘全国人民热情抗日的东风,胜利地完成了运送这批军需物资的任务。

到了西安,我向林伯渠同志汇报了工作,林老表示很满意。当我

说到怡和洋行老板赠送朱老总望远镜时,林老高兴地说:“我们是得道多助啊!”我把望远镜交给林老,由他转给朱老总。朱老总收到后,十分高兴,亲笔写了一封信,对许厚钰先生帮助八路军抗日表示感谢,让我转交许厚钰。原信如下:

厚钰先生:

蒙馈赠8×20双筒望远镜一个,已由超北同志交到。帮助抗战,良深感谢,专函奉复。随赠小照一张,敬祈惠存。并致

敬礼!

朱德

民国29年5月20日

这位许厚钰先生,1950年仍任香港怡和洋行公司经理兼洋行的中国董事,来过内地,并继续给我们以帮助,李克农同志接见招待了他。这是我们党的一位老朋友。

关于此次香港之行,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也讲到了。

这里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徐氏父子。徐谦,国民党左派,1927年宁、汉分裂时,同宋庆龄等一起主张迁都武汉,坚决反对蒋介石迁都南京的反革命阴谋,被选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徐谦之子徐璋,也是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在上海同我认识后,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而赴美,旋定居美国,于1983年去世。其妻周淑娴也是一位爱国进步人士。1946年西安情报处情报员杨济安同志在香港生活困难,我叫他去向周淑娴请求帮助,周即借给200元港币。1984年国庆节,周回国参加35周年大庆时,得知我的冤案已获平反,即来看望我,老友相见,恍如隔世,悲喜交集。

对许厚钰和周淑娴两位帮助过革命的老友,我仍深深地怀念着他们。(师宁 整理)

(责任编辑 舒元璋)

近作六首

● 王福民

王福民先生已逾八十华诞，旅美华侨。早年在内地从事文字工作，后在东南亚曾任华文报纸总编，现定居纽约。不久前，他的《灵犀诗编（古典诗词编稿）》和《雅歌》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王福民先生有感于江泽民主席偕夫人访美，与克林顿总统会谈，又拨冗拜谒其师顾毓琇老教授等，遂有近作若干。承蒙友人推荐本刊，特选其中六首发表于兹。

贺顾毓琇老教授九六双寿 美 人 九 七

(一)

百五六年劫，今朝泪始干。
毓才催四化，经世阅多艰。
高足荣垂拱，大师耀杏坛。
兼程来拜谒，增益黉黉欢。

(二)

天意怜华夏，殷忧启至仁。
冠年攻数理，壮岁焕经纶。
上国拥皋比，名庠出凡尘。
期颐情弥笃，亘古鲜其伦。

江泽民主席“万里提师”^{注一}

吹扇尊师重道风，遵途庶政必朝东。
黉黉伉俪恩悠远，琴瑟关雎韵不穷。
既使群伦知有耻，还教官吏敬奉公。
忠贞孝友敦风节，区宇清澄梦可通。

江克会谈^{注二}

氛侵原难一扫空，发言傀儡不由衷。
冒牌民主新鸦片，滥号自由旧毒虫。
远渡重洋希存异，慎图久晏为求同。
风云诡谲虽难测，修睦全凭讲信忠。

英国归还香港

希世明珠忍弃捐，多端奇计未回天。
芙蓉黑白原非分，帝国盈虚岂偶然。
觐觐孤臣无赖泣，辞宫妃子路人怜。
而今鹰犬伊谁豢，舐痔吮痂恐绝缘。

三峡工程

肯将三峡付啼猿，亘古潺湲不自安。
盛怒无栏吞屋舍，长才设闸控波澜。
电流输布熙中土，水库纷陈护灌坛。
盖世风流追大禹，十年葺事试临观。

注一：福建惠安的东园、洛阳大道上，有“万里提师”的牌坊，系一巡抚早岁参加乡试，学台骆台进因见其才高而浮躁，不予录取，在其卷末批以“激之成之，不激不成；位至三公，官居一品”，而收存之。此子果发愤蹈厉。登第后，官运亨通；自请出任闽巡抚。下车后不久，南巡至惠安埕边乡，探问骆氏。时骆氏已去世，其妾设香案迎抚台，案上置文卷。巡抚阅至批词，乃痛哭，曰：“非恩师如此苦心激励，我岂有今日？岂有将来！”因供应骆之如夫人一家生活费，并树牌坊，垂诸奕叶。惜我未查明此子来历。

注二：中国要采用民主制度，必须人民具有这四种精神：1. Scientific；2. Democracy；3. Lawabiding；4. Sportmanship。再者，西方之民主程度亦各不相同。东方采用美式之民主制度，如菲、印尼，均呈现纷乱、不公、不安之现象，即美国亦因放任，以致失控。

考古学家张光直的

中国情结

● 耿一民

1996年4月11日至14日，世界上最大的亚洲研究学术组织——亚洲研究协会，在美国夏威夷召开年度会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张光直教授荣获（该年度）惟一大奖——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AAS奖）。中国新闻媒体以欣喜的口吻介绍这项大奖“是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荣誉”时，称张光直为美籍华人，中

国文物考古学界的老朋友。

新闻媒体援引的资料虽然是正确的，但就张光直而言，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中国人”的“朋友”的地位。他在自己写的书中就斩钉截铁地这样说：“我自己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台湾人，是蕃薯人，但也是闽南人（福建省南靖县）、中国人。”

如今享誉中外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是台湾文学前辈张我军的次子。1931年4月15日，他生于北平西单察院胡同47号（后搬家到手帕胡同丙25号），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幼年和少年。至今他忘不了那“北国的刺人的风、美丽的雪”，忘不了跟着哥哥爬城墙、逛厂甸儿的情趣，甚至连那“硬面饽饽”、“萝卜赛梨辣了挨”的叫卖声，还有时回响在他的耳鼓。

1946年，张光直随父母迁回台湾。台北县板桥镇便是他父亲张我军1902年诞生的地方。在这里，掩埋着他们祖先的遗骨。张家没有家谱，然而祖墓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已清楚昭示其后裔：他们原籍福建省南靖县，移居台湾最少已经八世了。尽管张光直回台不久，便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后来又因“四·六”事件身陷囹圄，然而他还是像爱孕育了他的北京（曾被

他称为故乡）一样，爱着台湾岛这块“形状很像一个白薯”的地方，他以“蕃薯人”自称。刚刚出版的他的早年生活回忆录，便是以《蕃薯人的故事》命名的。

投身“冷而又冷的冷门”，在“旧垃圾堆”中建立学问

张光直教授称考古学是学问中“冷而又冷的冷门”。他曾以最通俗的话给“门外”人这样解释说：现在所谓文化遗址，多半其实就是古代的垃圾堆，或者房基、废墟。考古学就是在这些人类生活的“旧垃圾堆”上建立起来的学问。

张光直所以能投身这一“冷而又冷的冷门”，原因是多方面的。

张光直的父亲张我军，19岁离开台湾赴厦门、上海、北平，受“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影响，从事写作，向台湾“积极地引介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被台湾文学史家称之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张光直受家庭熏陶，很小识字，书籍成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张我军翻译过一本叫作《人类学泛



1946年，身着北师大附中制服的张光直

论》的书，著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西村真次教授，正是张光直出生的那一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印行。使我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二儿子竟成了这本书的最忠实的读者。张光直后来回忆说：他从小守着这本书，熟读过这本书，对书里的人类进化史、石器时代等很感兴趣，给他以深刻印象。还有一本书曾引起张光直对考古这门学问的向往。那是他回到台湾后的1948年，在台北坊间买到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是裴文中先生写的。这是他所知道的第一本用中文写的关于中国史前考古的书。书中把当时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资料与研究成果作了初步的综合。同时书中感叹：中国的考古可谓遍地是宝，但是有才华有志气的读书人却很少有学考古的。张光直看了也曾为之心动。

然而这些，不过是张光直博览群书时心中泛起的涟漪。他心底里真正倾慕的还是文学。他在1948年5月31日发表在台湾《新生报》的《文学是为多数不幸者存在》一文中说：“父亲母亲都希望我学医，我对文学却难以割爱。虽然我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但我愿意不懈地研究它，总希望能得到些什么。”事实确实如此，进入初中后的张光直，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试作一些散文之类”，“得到意外的称赞”，这更增加了他的勇气，以致参加了“对文艺有兴趣的一群”，决心实现文学的伟大意义：既要“暴露黑暗”，又要“昭示光明”。“小荷才露尖尖角”，建国中学时期的张光直，就时有小说和杂文在报刊发表，显露了他的文学天赋和才华，乃至有人说他受了“父亲文学家张我军的家传”。

很可能“子承父业”的张光直，因了1949年突发的“四·六”事件，系狱一年后，改变了自己的志向，放弃了文学，走了从事考古

学的路子。

“四·六”事件是国民党政权在台北对进步学生的政治迫害事件（编者注：本刊曾于今年第三期发表张光直的《我在台北“四·六”蒙难经过》）。涉世未深的张光直在那些“死个人不算什么”的地方呆了一年。他被保释出来时，被迫发誓不将被捕后的所见所闻对外透露；回到家其言行又要由担保人定期向台湾保安司令部报告。心灵的创伤，迫害的阴影，不时地困扰着他。从此，他把“四·六”事件尘封在心底，疏远了动辄触及“政治”的文学，唤起了始之幼年的对于考古学、人类学的兴趣。张光直没有再去读高中，而以自学获得的“同等学历”考上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这个系的学生“寥寥无几”，但教师的“阵容是相当坚强”的。1929年至1937年曾任发掘安阳殷墟总指挥的李济曾教过他“古人类学导论”、“史前史”、“人体测量”等课，指导过他的毕业论文。另一个参加过发掘殷墟、赴台后继续整理发掘报告的高去寻先生，则教他们的“中国考古学”。这使张光直不仅在课堂内学习到中国考古的学术内容，更在课堂外耳濡目染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陶冶，了解了中国考古界的许多人与事。

跌进知识海洋：一进“哈佛”求学；二进“哈佛”从业

张光直1954年台大毕业后，带着种种梦想，希望马上投入台湾的考古工作。突然接到李济先生从墨西哥寄来的一封信，说他途经美国去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商量要介绍一个学生到那里去读书。对方已答应予以考虑，要张光直赶快提出申请。

张光直很快接到考取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的通知，要他1955年9月入学，哈佛燕京学社除负责旅费、学费外，还有奖学金。

那时的“哈佛”校园不像现在，黄皮肤的中国人很少。刚到异国他乡的张光直，在他所谓“多数对少数，歧视是难免的”环境中生活，他要求自己很严。自己作饭，每天一美元就够了。每周在学校里干些杂活，赚一二十美元，就有了冬季买衣服买书的钱。他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学业上，图书馆成了他的活动中心。



1947年，张光直与父亲张我军摄于台北

皮保德博物馆图书馆，是公认的全美乃至全世界收藏最丰富的人类学图书馆。任何人只要凭“哈佛”的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进入那琳琅满目的书库中，寻找要看的书。然而这对于张光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自己就这样说过：“我这个学中国考古的，既不能去大陆发掘，也不能去看别人挖出来的资料，只好完全依靠大陆的考古报告和所谓‘三大杂志’，即《考古》（原名《考古通讯》）、《文物》（原名《文物参考资料》）及《考古学报》里面所报告的新材料来作研究了。”而这些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和期刊，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几乎是齐全的。张光直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史前时期的聚落形态》（1960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若是没有哈佛图书馆的这些藏书，是没有办法写的”。

勤奋的张光直，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受聘于耶鲁大学16年，任人类学教授和系主任。

当张光直1977年二进“哈佛”时，他不仅是考古学的名教授，而且有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头衔。张光直在“哈佛”任教期间，197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81年起担任“哈佛”人类学系主任；1985年至1988年兼任哈佛东亚研究委员会主任。

热恋事业， 热恋故土，在台湾发现大坵坑文化

长期在美国工作的张光直，始终热恋着他的事业——中国考古，热恋着他的故土——中国宝岛台湾。

亲情，乡情，故土情，是浓郁的，又是神密的。他的父亲张我军

19岁离开台湾，“在厦门、鼓浪屿辗转过了两年”后，曾说：“自从领略了海的感化和暗示之后，我就不想回到如在葫芦底的故乡了。”然而在他北上故都受到“五四”运动余波影响后，首先想到的还是生育他的故土，乃至作了“台湾传播新文化的急先锋”。斗转星移，到了20世纪60和70年代，远在美国工作的张光直，“基于血缘，也基于关心”，更是把台湾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台湾报纸语）。

早在张光直在台大就读期间，即连续参加台湾考古的田野作业，1969年在耶鲁大学出版了他的《凤鼻头大坵坑与台湾史前史》一书。1971年至1975年，他积极促成台湾“中研院”、台湾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合作，在台湾实施“浊大计划”（即浊水、大肚两河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这项由张光直领衔，联合考古、民族、地质、地理、动物和植物多学科专家，规模甚大的考古计划，实施四年便因经费筹措困难而停止，但是收获甚丰，所得资料包括自人类进入这个区域开始，直到汉人移入的全部历史时期，和这一历史过程中在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变化。

80年代开始，张光直又向台湾“中研院”建议成立台湾史研究所，以使分散在史语所、近史所、民族所、三民所中从事台湾史研究的专家集中起来，通过独立的编制和财政预算，进一步扩充收集保存台湾史的材料，不断开拓并披露台湾史研究的新成果。张光直的这一愿望，终于在吴大猷继任“中研院”院长后得以实现。1993年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成立，考古学这一冷门在台湾逐步热了起来，张光直被新闻媒体称之为“推动近年台湾史研究风气的先驱”。

学无涯，研究无涯，张光直的舞台梦远没有作完。1988年新年

伊始，他为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写下了《新年三梦》，文中说：“我梦想我和三十多年来一起在台湾考古的老同伴能进行一个以整个台湾海峡地区为工作范围的史前考古计划。”他认为，台湾同行“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工作”，“对台湾史前文化的来龙去脉，可说摸了一个大概”，但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时，就会感到不了解海峡的彼岸，包括浙江、福建、广东东部的史前史化，只等于了解了这一文化的一半。因为台湾与上述地区“在历史时代和史前时代都是曾经有过文化活动的整体单位”。

就在这篇文章中，张光直透露说：“两年以前我迫不及待，到福建去参观了许多史前文物，发现其中很多与台湾的相同或相似，更觉得两岸的考古工作应当一起进行。”这就是张光直1988年的新年梦——不，准确地说，是他多年已有的梦。

数十次访问 祖国大陆，他渴望找到全球瞩目的殷商都城

令张光直魂牵梦绕的当然是整个的中国。他在与记者、与学生谈到自己的事业时是离不开“中国”二字的：

“我在美国学考古学差不多有三十年了。但我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历史。”（1985年语）

“我有两个主要感兴趣的方面，中国的青铜时代和台湾沿海地区考古。”

“中国过去历史地理的研究传统非常深厚。”“我的考古学实践是在中国文化范围内进行的，当然受中国考古学传统的许多影响。”

正因为如此，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张光直自1975年开始，连

续访问中国。

1979年，张光直在《考古》杂志第三期上，以笔名“韩起”发表了《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他在这篇长文的结论部分中说：“我们已经初步知道台湾自数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以来，历有人居，而且它的原始社会史的每一个阶段，在文化的包涵内容上，都与华南大陆的原始文化息息相关。远在1958年我国考古工作人员便已指出，‘台湾自古是我国的领土，远在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台湾和福建就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最近一二十年来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不但继续提供上述事实的铁证，而且更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古代文化关系，在空间上从福建推到广西与山东；更在时间上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台湾同胞’这四个字，不但适用明末以来大批移入台湾的汉人同胞，而且适用于在本省历史远为悠久的高山族与平埔族的同胞。”

1984年8、9月间，根据中国教育部和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合作计划，张光直应邀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作了九次讲演，讲稿整理后，冠书名为《考古学专题六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6年、1987年张光直担任了厦门大学 and 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

1990年，张光直代表他任教的哈佛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约合作，共同从事“先秦考古研究”。这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大题目。自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寻得商代的晚期的遗址，继有50年代在郑州和70年代在偃师出土商代中期文物，人们寻找早商文明的兴趣越来越浓了。商早期活动集中地区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这四省交界处。商代之名由商城而来，传说商城就在河南商丘附近。张光

直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我们会在商丘附近濉河以北的古代河床上有重要发现。”

这项研究工作所需经费由中美双方共同负担。据台湾报纸报道，美方开始支持这一计划的有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纽约鲁斯基金会、纽约维纳基金会。中国台湾新光集团（1994年在台湾百家企业排行榜中名列第二）的德富文教基金会，基于对张光直学术成就的推崇及对此项考古计划的支持，直接捐款给美国哈佛大学，以助发掘商古城一臂之力。

张光直热爱这里的事业，也热爱这里的同行。早在他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的时候，就熟悉了这里不少未曾谋面的同行。张光直曾这样回忆说：“二三十年后，我初次见到夏鼐、刘曜、苏秉琦、胡厚宣等先生，就好像见到老朋友似的，倍感亲切，这就是由于早年自高（去寻）先生口中听到许多他们的故事的缘故。”正因为有了这种“一见如故”的情感，他们的合作是融洽的。当1993年任《中国文物报》特约编审的朱启新请他写“一个考古工作者的随笔”专栏文章时，他欣然接受了，第一篇文章于该年8月22日见报。这些文章，后来收到台湾出版的他的文集之

中。

张光直更关心着中国考古队伍的培养，他像李济老师当年举荐他那样，热心推荐青年人出国深造。他多次大声疾呼：研究中国的东西，要有一个世界的观念。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不但要了解中国的文化，还必须了解世界的文化。因为任何一种人类文化现象的变异范围往往都是世界性的。

曾说过“考古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史学”的张光直，就像天文学家胸中装着宇宙一样，装着人类早年的整个历史。他想做的事太多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罹患帕金森病后，病魔时时向他袭来，且一年重似一年。一向重事业重于生命的他，为了摆脱病痛之苦，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张光直总希望于有生之年，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中，多发现一些人类早年的信息。他曾在台湾“荣总”医院作过胚胎移植术，但收效甚微。近年他多住台北自己的寓所，由敬重他的学生们照顾起居。我们希望他早日得到救治，早日痊愈，同时有他的新的研究成果的消息传来。

（责任编辑 洛松）



1986年10月，张光直（蹲者）在商丘发掘东周时代宋城城墙

女科技实业家

雷菊芳在西藏

● 庄志霞

见到她是在那片神奇美丽的雪域高原上。

一头齐耳的短发，一身工作服似的深蓝色便装。她实在是简朴，与人们想象中腰缠万贯的企业家形象相去太远；她又似乎不善言辞，总是静静地独处一隅，很少介入人们的谈笑。

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一日赴藏民营科技实业家考察团抵达林芝错高湖的晚上。团员中来自新疆的李大姐在爬上依山而建的小木屋时，因下雨路滑，不慎崴了脚，当下脚脖子肿起老高。我们闻讯都跑去看她，见她那般痛苦，想到明天还要远行，都不禁忧心。随团医生的药箱里倒有镇痛膏之类的消炎药，但立时三刻也难见效。就在大家情急无奈时，雷菊芳悄悄地来了。她拿着一张“奇正炎痛贴”药膏，麻利地帮李大姐敷上，轻声说，“您贴着试试……”第二天一早，当李大姐竟行走自如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

伙全睁大了眼睛。

当团员们把感激和赞叹的目光投向雷菊芳时，雷菊芳却又默默地在心中构画她在雪域高原上新的蓝图了。她看上了西藏林芝米林县的那一万亩土地。站在眼前还是荒瘠的土地上，她似乎看到了芳草萋萋的明天。那天当车开往林芝途中时，我恰好与她同座。望着窗外不时掠过的一片片星星落落长在山野草丛间的野生蕨菜，她清癯的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她有些喜不自禁：“你看，这里全是宝呵！”稍顷，她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静，自语般地说：“可是不利用它，它也会成为灾害的……”

车行途中，活跃的“旅途广播员”指名每位团员得表演一个节目。这可难坏了不擅在大庭广众下登场的雷菊芳。在大家一再的掌声催促下，她微红着脸，掏出小本子，朗诵了她自己写的一首歌词“太阳颂”：

有了你慈母般深情的抚

慰，

雪域不再傍徨；

虽然我今生不能追随你神圣的轨迹，

无声的思念，虔诚的向往，

早已随晚风祈祷飞向远方。

呵，雪域的希望，

西藏人民心中的太阳！

听着这发自肺腑的深情，我透过这位女科技实业家朴实得与时髦无缘的外表，一步步走入了她深邃而多彩的内心世界……

记得老作家冰心曾写过一首诗：“成功的花儿，人们往往艳羨它现时的明艳。却不知它开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云雨。”雷菊芳，在她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曾洒下了多少奋斗的泪水？尤其是作为一位女性，她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这位来自丝绸古道的女实业家，曾是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近代物理所的科研人

员。在1978年中科院“7611”工程大会战中，我国要建造重离子加速器。当时，真空室表面超净处理技术尚属空白，国外拒绝提供资料。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鞭策着雷菊芳如开足马达的机器，废寝忘食地去攻克难关，使我国的这一技术终于能在国际舞台一争高下。当成功的花环簇拥着雷菊芳，她荣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先后被评为甘肃省三八红旗手和新长征突击手时，她没有沉醉于诱人的花香，而是独辟蹊径，作为第一批创业者，来到了位于兰州市区东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靠几个人集资数千元起家，历经几年呕心沥血地苦干，雷菊芳创办的甘肃奇正实业有限公司已为国内近60家大中型骨干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仅在金属表面处理及防腐技术方面就成功地开发了12个系列46个配套产品，先后六次获国内外奖项。90年代初，为治好公司一位员工的伤病，求知不怠的雷菊芳又对民间的黑膏药入了迷。为研制“奇正炎痛贴”，她虚心拜藏医专家为师，九赴甘南，三进西藏，走访大小凉山，踏险履艰，八方求教。她一天十余个小时投入工作中，不问晨昏；她愧疚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每天清早离家时，儿子还未醒来；深夜回家后，儿子已经熟睡……她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仿佛着了魔。她是那样地欣赏《孙



雷菊芳在日内瓦苏黎士博尔尼展览会上

子兵法》中的“凡战，以奇胜，以正合”，始终追求和铸造着“正业之道，奇药奇效”的境界和目标。如今，“奇正炎痛贴”已被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广岛时，13支中国运动队及韩国、中国台湾运动员都敷了此药。1994年4月新华社北京发出了电讯，一时好评如云。然而，永不满足的雷菊芳不愿稍懈，她决意再开始新的攀登。

当此次民营科技实业家考察团结束了在西藏各地的考察、洽谈，返回拉萨时，为此次活动划上了一个圆满句号的，又是雷菊芳。她一举投资10万元，在拉萨林廓北路建起了“西藏宇妥藏药研究所”。这天，西藏自治区的有关领导也来参加开业庆典，在喜庆的爆竹声中，雷菊芳以她惯有的沉静的口吻说：“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藏医学是高原广大劳

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的产物，我愿为丰富这个祖国医学宝库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涧松寒转直，山菊秋自香。”雷菊芳，正如她的名字一样，如傲霜秋菊，独立枝头，咀英含芳，在神奇而又被人视为“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孜孜以求“奇正之道”。

在此文发稿时，笔者又喜闻雷菊芳的奇正藏药事业，取得了飞速进展。今年四月的日内瓦，第一次迎来了中国西藏高原的礼物——奇正藏药在第2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博览会上荣获了金奖。当雷菊芳这位中国女科技工作者登上金牌奖台时，她还是一如既往沉静和谦虚，她说：“这是雪山的奉献，是藏民族文化的伟大，是中国人的骄傲。”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师复先生

师复与中国的 无政府主义

● 刘中刚

1 师复，原名刘师复（1884—1915），广东省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和躬身践行者。师复的主义被称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其主要观点是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认为国家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设想建立一个无权力、无服从、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早在师复之前，中国已有一批人宣传过无政府主义。比如，在日本的刘师培、何震夫，在法国的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他们分别创报，广泛宣传，成为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然而情随境迁，他们回国后，大都投身于自己曾反对过的“权威”政治当中，成为政客或幕僚；在师复之后，中国还有一批人承师复之衣钵，继续立社出报，宣扬无政府主义。但再无一人能超过他。

2 师复自幼聪颖，擅文辞，15岁就中了秀才。但此后，有感于严峻的时局，毅然放弃科举仕途。1901年，为对抗封建王权，在香山成立演说社。1904年，师复赴日本留学，不久加

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由于受日本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师复倾向于暗杀行刺，奢望革命之速成，于是在横滨学习制造炸弹。1905年底师复回国，积极撰稿鼓吹革命。不久，又创立香山女子学校。1907年同盟会准备在广东潮、惠发动起义，师复自告奋勇刺杀广东提督李准，不幸事败，断左手，被捕入狱。师复在狱中近三年，经受种种刺激和磨难，初是厌倦无聊，作起考据，写有《粤语解》一书。后感悟政治权威之迫害，彻底皈依无政府主义。

出狱后，师复来到香港，一面专心研究巴黎《新世纪》报（李石曾等创办的期刊）倡导之无政府主义，一面结识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支那暗杀团”，相机而动。1911年，师复欲到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途经上海时，闻清朝已亡，乃罢。

1912年5月，师复在广州发起成立晦鸣社，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该社大量翻印《新世纪》的小册子，不久，又创办机关刊物《民声》（初称《晦鸣录》），师复亲任主编。在发刊词中，师复标榜：“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此后，他又与郑彼岸等于广州东园组织了“心社”，定戒约十二条：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

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师复对于戒约，躬身实践，不肯放松丝毫。正是在此时，师复才去姓留名，并从此真的不食肉、不吸烟、不饮酒、不入教、不涉政坛，乃至一生未娶。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尽管师复在革命中持不介入的态度，但还是遭当局迫害。1914年，师复辗转奔波，落足上海，遂发起成立“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并发表宣言书，声称“无政府主义者何？主张废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始求经济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上海“无政府主义同志社”的成立，使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走出了狭隘的广州一地，开始广泛地传播于全国。在该社的带动下，广州的刘石心、南京的杨志道、常熟的蒋爱真……纷纷在各地创立无政府主义社团，无政府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思潮。

1914年8月，“无政府万国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师复代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向大会致函，报告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一，组织万国机关；二，

注意东亚之传播；三，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四，万国总罢工；五，采用世界语。从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与世界无政府主义取得了联系。当时国际上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格拉佛等都纷纷来信对师复表示支持。

正如师复向万国大会所建议的，“同志社”从一创立就注意在工人当中进行活动，刊行《工人宝鉴》，组织了广州的“机器总工会”、“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等。同时他们还组织了“世界语讲习所”，招收学员传授世界语。前者对唤醒广大工人的斗争意识起到了一定作用，后者对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不无推动和促进。

师复对无政府主义之宣传可谓不遗余力。早在编印《民声》之时，师复以独手工作，废寝忘食，终积劳成疾，当时便留有一联——“稚晖五体投地，师复只手回天”。于香港年假手后，师复更是不顾疾患，倾家荡产用之宣传。到1914年底，师复已是病体垂危，然却因贫不能就医。有朋友劝他出售印刷机换钱医病，师复感叹：“此党主义，东方命脉，断之以活一人，吾不为也。”1915年1月31日，师复最终因无法筹措医治费，不愈而终，时年三十有一。同年9月师复遗体葬于西湖烟霞洞旁。师复之死，大大削弱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正如《民钟》所说：“在我们的心目中，现在中国除师复外，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受我们的敬意。”的确，师复在世时为论述无政府主义写了许多著作，集为《师复文存》、《伏虎集》等。中国因有了师复而有了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3 无政府主义是对强权的否定。长期封建王权的压制，以及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人民的自由与民主谈不上，国家也每况愈下。失意、苦闷和愤慨逐渐在广大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蔓延。于

是，宣传从根本上进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便成为处于急躁中的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得以宣泄的感性工具。诚如刘少奇后来指出的：“在最初的一个时候，无政府主义受到的欢迎，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很多人相信无政府主义，以为痛快得很，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见《1947年7月4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师复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所谓自由，体现于：“人与人相交，你不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侵犯你的自由，便是真自由。个人与个人相交，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个人的自由。团体与团体相联合，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真自由”。因强权“为妨害完全自由之障碍物”，故“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一律排斥之扫除之”，此乃“无政府党之根本要义”。为此他提出“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的口号，借以反对宗教、迷信以及婚姻和家庭。

师复把他向往的无政府共产社会，描绘为“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为实现无政府共产社会，师复主张“平民革命”，而革命又依赖于“口舌笔墨之传播”，因此宣传、感化工作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为使“大多数人之迷梦惊醒，使一般之据强者寒心”，“激烈行动，亦为一种最良之传播方法，如罢工、罢市、暴动、暗杀等”。

“师复主义”产生在五四运动前，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广泛传播，因此，就师复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之传播而言，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毕竟，“师复主义”的矛头所向主要是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统治（诚然，师复也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持不支持态度，但这是次要的）。与此同时，它还向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描述了一个美好

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师复一方面以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中国社会的现状，一方面又以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画笔来设计未来社会的美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师复主义”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也是它之所以被称为一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原因。尽管它在对一种专制的极端进行批判后又走上了另一种绝对自由的极端，但是，对于当时背负着过于沉重的传统包袱的中华民族来说，“师复主义”所体现出来的“矫枉过正”方式，无疑是将更多的人从封建礼教和封建统治中唤醒的必要工具。许多国内青年正是通过无政府主义，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师复主义”从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进一步走向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领导人都曾经受过无政府主义的较大影响，他们在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大都经历了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过渡。

师复死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的舞台。此时的无政府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政府主义渐渐地蜕变、分化，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负作用在逐渐地加大。最终，由于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不能达到作为理性权威和实践性工具的统一，不能指出一条合理的道路以解决当时中国严峻的现实问题——“救亡”，师复的门生们便不可回避地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无政府主义在各种矛盾的夹击下必将走向破产。至本世纪初的2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师复去世后的十年左右，尽管在个别人的脑海中还隐约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但无政府主义开始逐渐退出中国近代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 吴 思）

徐庶之泼墨天山写风情

● 韩文辉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庆香港回归书画展览会上，有幸与久别的著名画家徐庶之相逢。三年前他从新疆国画院领导岗位退下来移居西安。这次他不顾古稀高龄和身患绝症，带着一百多幅画应邀前来参加迎香港回归展览。这种挚爱新疆的深情使我深受感动。他在新疆挥洒笔墨40年，开创了西域风情画派，奉献出大量赞美新疆风物民情的画卷，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徐庶之是靠自我奋斗一步步走入艺术深境的，他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和困苦，他的画坛生涯令人敬佩，发人深思。

第一次抉择

徐庶之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山区一个贫寒家庭。14岁那年父亲被一场流行病夺去生命，家庭生活重担从此落在他的肩上。本来他在私塾读书，从《三字经》已读到《孟子》，这时不得不辍学，和母亲靠种田抚养还很年幼的两个弟弟。为补贴家庭生活，母亲熬夜织土布。每当镇上逢集那天，他背上布去卖。

一天，徐庶之在集市卖完布路过一家店铺时，发现一位老人正在店铺里绘画，眼看着一只活脱脱昂首挺胸的大公鸡跃然纸上，神气极了。他立刻被老人的鸡、鸭、牛、羊和花草鱼虫所吸引。徐庶之在店铺里看老人画画，直到日落才匆匆回家。

此后，每到集日徐庶之卖完土布就看老人作画。看了多次，他也买了颜料和纸在家里学起画来。他的家乡宫家冲是个美丽的山村，层层梯田，潺潺流水，茂林修竹；一到春天，满山遍野开着杜鹃花。他学着画鸡、鸭、牛、羊，也画梯田和杜鹃花，邻居们称赞他画得很逼真，逢年过节都来请他画灯笼，不久，他成为名闻乡里的小画家。

徐庶之刚满18岁那年，宁静的生活突然被破坏了。伪保长要徐家出一名壮丁。就在伪保长带人来抓他的前一天夜里，徐庶之挥泪辞别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弟弟，从家里逃了出来。

他从豫南到豫西，又从豫西辗转到山西、陕西，到处求人谋糊口的职业。在五年多的漂泊中，他当过油印兵，干过收发和录事，他本想找个既能糊口又便于继续学画的工作，然而很难如愿。

抗战胜利后，一位中学老师帮他找到工作，他便专心攻起绘画艺术，半年多时间，创作作品二百多幅，经河南老乡帮助，在宝鸡举办了首次画展。这次画展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自信心，奠定了他的终生选择。

从师赵望云

画展中徐庶之结识了一位在西安经营书画用品的田亚明。田看了徐庶之的画连连称赞，并说他认识西安好多名画家，可引荐他拜访。徐庶之学画以来，既未进过专科学校，又未找到名师指津引路，只是自己苦苦探索，早就期盼有名师指教。

徐庶之在西安青年美术社找到田经理，美术社有赵望云、黎雄才、叶浅予、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作品，使他大开眼界。他在赵望云那幅田园风光画前久久伫立，目不转睛地欣赏那绿色的田野，柔软飘动的柳丝，呼之欲出的农妇。田经理告诉他，赵望云先生就住在附近，徐庶之急切地说：“最好咱们现在就去。”

赵望云先生正在一间宽敞的画室作画，经介绍后，徐庶之恳切地表明来意。赵先生没说别的，只带着慈祥和蔼的面容说了句：“那你就看我作画吧！”

赵先生是站着作画的，据说这

样便于挥洒笔墨，能把全身力量都汇聚于笔端。徐庶之站在桌旁注视着每一笔的起落和运转。赵先生用笔之灵巧、准确，线条之流畅，使他看得出神，当他看到赵先生淡墨画一块石头时，笔落下去连续运转，但画出来的石面线条却完全不一样，他不禁惊讶地叹服大师用笔的功力。

他一连站了四天看赵先生作画，然后恭敬地说：“赵老师，这四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准备回去画些画带来请你指教。”赵先生说：“好！看到的还不算真正学到，经过艰苦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

他回到宝鸡，把自己关在那间斗室，废寝忘食地画了四个月，然后挑出自己满意的卷了一大卷前往西安求教。这次他把行李也带上了，他打算厚着脸皮提出请赵先生收他为入室弟子，不答应就磨，磨不成再回来。

他把带来的一卷画递给赵先生，赵先生一幅一幅地翻阅，脸上也露出喜悦的神色，不时还提起笔点几下，勾几笔，这画龙点睛的几笔，使画顿时增色。赵先生看完画没说别的，就吩咐家人把徐庶之安排在东房住下。这就意味着赵先生已同意收他入室弟子，徐庶之紧张了好半天的心落下了。当时赵先生身旁已有两位弟子，一位是梁黄青，一位是方众济，徐庶之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

赵先生作画时，他就在一旁仔细观看；赵先生不作画时，自己便展纸挥笔，经常画到夜深人静。赵先生一点一滴地修改，他都认真领悟，在实践中求得提高。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徐庶之专心向赵先生攻习国画时，赵突然以“共党分子”的“罪名”被捕。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人们一听“政治犯”，如谈虎色变，赵先生关在什么地方，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赵先生子女



和田巴扎

都还年幼，谁来探寻下落和托人营救？徐庶之主动担当起这个重任。

一天下午，一个陌生人来到赵家，让把赵先生的绘画工具送去。这才得知赵先生被关在西安太阳庙门一个秘密监狱。狱方得知赵是一位大画家，他的画千金难买，便要赵在监狱里给他们画画。徐庶之带上绘画工具和纸跟随来人到了森严的牢房，才得以见了面容憔悴、须发很长的赵先生一面，只说了句“家里都好”就被赶了出来。

监狱管理人员要画这件事启发了徐庶之。他带上自己装裱好的一批画找监狱长说：“这些画任你挑，挑上的都送你。请你多关照赵先生。”贪婪的监狱长把全部画收了下来，果真给了些方便，他可以带赵先生的孩子去探视，有时还可送些衣服和吃食。

西安解放前夕，传言关在太阳庙门的“政治犯”将被全部处决。徐庶之到监狱要求探视，不但不准进去，反而成了怀疑对象，受到监视。徐庶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四处求人营救。后来经过张治中先生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营救，赵先生终于脱险。徐庶之重感情讲义气的高尚品德，受到赵家由衷的感激和敬佩。

情系新疆

1948年，张治中先生邀请赵望云赴新疆作画。赵先生率领黄青、徐庶之两位弟子西行到兰州时，赵夫人来电说家里有事，要徐庶之回去料理，他只好遗憾地返回西安。几个月后，赵先生和黄青带回在新疆完成的大批风情写生，徐

庶之看了之后，对新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西安解放后，赵望云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徐庶之在文化部美术科从事创作。随着西北全部解放，来自新疆的信息和新闻报道越来越多，特别是在他看了《帕米尔高原人民在欢笑》、《维吾尔族欢度库尔邦节》、《天山草原举行叼羊盛会》等介绍新疆风物民俗的新闻通讯后，使他更加迷恋新疆。1953年他乘西北大区机构调整之机，毅然写报告义无反顾地奔向心驰神往的新疆。

1953年7月，徐庶之来到乌鲁木齐。他到自治区文化厅创作室上班后，适逢自治区首届文代会开幕，他应邀参加了大会。会上结识了新疆各民族画家，了解了新疆美术创作状况。新疆国画创作力量的薄弱和题材的丰富，更增强了他的使命感。“文代会”一结束，他就奔赴新疆深入生活。

他下到南疆后，从喀什开始一路写生到和田；四个多月后，又折回喀什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时已是1954年元月，帕米尔高原冰封雪冻，寒气透骨，很少有人能在数九寒天下乡。徐庶之没有顾及冬天的困难，与同伴白汝强向乌恰县借了两匹马前往冬季牧场。

草原上的马总带点野性，有时还欺生。徐庶之和小白上马没走几步，小白的马突然猛跑起来，骑术不佳的小白身子一歪，从马上翻下来，一只脚却套在镫里，被马拖在地上奔跑，他的上半身在地上忽起忽落，刹时间衣服被撕烂，头被撞破，拖出一公里之外才被群众拦住。

帕米尔好似有意考验徐庶之，一上来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他的同伴被马拖成重伤不能同行，他不懂柯尔克孜族语言，又未到过牧区，面对这种情况，是退却还是前进？县里的同志劝他回去，到了夏

天再来。但帕米尔高原的冰雪世界和柯族牧民冬天怎样生活，怎样放牧，对他诱惑力太大，他没有听从县里同志的劝告，跟着区上开会的干部骑马下去了。

徐庶之常常只身骑马在草原上漫游，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白天跟上牧民放牧，傍晚画牧民收拢畜群、挤奶、烧茶做饭等生活素描。牧民转场时，他也骑马同行。受到好评的《迁徙图》表现的就是帕米尔高原柯族牧民艰苦而欢乐的转场情景。画中一家男女老幼骑马跟着畜群行进在草原上，驮帐篷的骆驼背上卧着可爱的羊羔，牧羊犬跟着主人跑前跑后，一派悠然自得、幸福欢乐的情景。

徐庶之这次在帕米尔高原写生长达六个月之久，他熬过了高原冬天的奇冷，习惯了吃以牛粪作燃料烤成的青稞面饽。如果没有执着追求艺术的力量来支撑，那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艰苦的劳动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半年之内他完成了大量表现帕米尔高原雄浑壮丽的景色和柯族人民生产活动的写生。在他的笔下，雪山、松林、戈壁、草地等地理景观优美壮观，人物、畜群生动活泼，画中透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柯族人民生活情调。被入选为全国第一届美展的《保畜》，就是他在帕米尔高原跟随牧民跋涉冰天雪地，目睹牧民战胜暴风雪灾害后创作的。画中人物神情奕奕，呼之欲出，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从画中能感受到作者对牧民的挚爱和赞美。这次写生后完成的《高原医生》荣获1956年全国青年美术奖，并被中央美术馆收藏。

同年秋天，他又马不停蹄地转辗在北疆。他怀着走遍新疆山水水的渴望，冒风雪，忍饥寒，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从高山到草原，从绿洲到戈壁，天山南北大部分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脚印。雄伟的高山松林，多姿多彩的绿洲草原，神态各

异的兄弟民族人物，都一一摄入他的画卷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情画风格，开创了西域风情画派。

意想不到的坎坷

正当徐庶之以充沛的精力和成熟的技巧向风情画的深境继续攀登时，一场政治风暴降临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对象。徐庶之是个心直口快、秉性耿直的人，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说，不管是一般同志还是顶头上司，有意见从不掖着藏着，说完也就过去了，从不记恨谁。然而正是这种耿直和坦率招来了灾难。机关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突然被点名批判，具体罪名是反对党，骂赫鲁晓夫。几场批判会之后，宣布他有严重右派言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工资一下降到底，只给生活费。怎么向领导提意见就成了反党？怎么说赫鲁晓夫是野心家就是反苏呢！徐庶之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说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斗争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从“鸣放”到“恶毒攻击”的突然转变是没有规则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这是一段思之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

1958年3月，徐庶之同文化系统戴帽右派被送到精河县红旗公社“改造”。公社派他们到磨菇滩开荒。磨菇滩并不长磨菇，只有稀稀拉拉的野生红柳，荒无人烟。他们每人选一株树冠较大的红柳，把蚊帐挂在树枝上，蚊帐下就是自己的家。他们的任务是开荒造田，然后修渠引水。

人生的沉浮，很多人以职位高低、奉禄薄厚为标准，很少有人以人心的活力为尺度。其实，人心活，虽沉也浮；人心死，虽浮也沉。徐庶之虽然当了右派，但他的心仍然充满活力。他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更没有泯灭对绘画艺术的

酷爱之心。他下放农村时，带了几十本速写本，不管到哪里干活，他都随身带着速写本和铅笔。每当在田间地头休息或收工之后，他便拿出本子画起来。男女社员的服饰和神态，年轻人的舞蹈，过路的马车、驴车，都是他速写的对象。在精河县一年多的下放劳动中，就画完二十多个速写本。二十多个速写本会有多少幅画啊！这不能不令人为之惊讶！

从农村回到机关，虽然仍是右派，但条件比农村就好多了，分配他的劳动或工作大都与美术有关。不论编辑画报或搞展览，他都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去做，工作之余就拿起笔作画。在展览馆搞展览期间，夜里他借着夹道里的灯光偷偷作画。夹道里冬天没有暖气，寒气逼人，时间一长手就冻僵了，握不住笔，他在毛巾上倒点开水，敷在手上暖一暖，又继续作画。他说：“只要没有把我的手绑起来，我就不会停止画画。”

1959年秋天，机关酝酿摘不摘他的右派帽子，有人认为他戴帽子后能老老实实改造，劳动和工作都很积极，应该摘掉。然而就在此时，“祸不单行”这句话又在他身上应验了。他给一个小刊物画了幅插图，有人突然提出问题说：“插图中的马张着嘴，张嘴的马跑不动，这是诬蔑大跃进！”于是，接二连三的批判又开始了。徐庶之哭笑不得，当时正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风暴遍及全国，他有口难辩。插图闯祸以后，摘右派帽子的事又遥遥无期了。

摘帽之后

徐庶之戴了五年的右派帽子，终于在1962年夏天摘掉。此刻他欣喜、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他庆幸自己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高兴自己又可以从事美术创作了。他

很快相约了四位画家，决定再去南疆深入生活。这时，分居六年妻子郭韶珍刚好办好调动手续，从西安来到乌鲁木齐团聚。妻子说：“我还未上班，家还未安置好，这里的炉子我也不会生，你晚一点再走吧！”徐庶之只对妻子劝慰了一番，同四位画家一同走了，他急切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酷爱艺术的画家，五年不能挥笔从事创作，现在如愿了，怎能不“只争朝夕”呢？

徐庶之来到阔别多年的和田，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工作。他这次写生不同过去，过去大都用铅笔或钢笔，这次是用毛笔颜料直接画在宣纸上。直接用彩墨在宣纸上写生，用笔必须准确无误，不容改动，这说明这时徐庶之的绘画技巧已相当娴熟。为了写生方便，他自己做了个小木箱，箱内放水、墨、颜料，每天背上木箱早出晚归。他的写生一直围绕着他所向往的塞外风光这个大题材，从实际生活出发，把南疆维吾尔族人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与当地特有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表现人物和自然面貌，形成不同于传统山水画的格局和款式。

《和田巴扎》这幅巨作是他为表现名闻中亚的和田“巴扎”（即赶集），爬上屋顶上写生以后，花了一年时间才最后画成的。画中不算远处影影绰绰的人群，仅形象清楚的人物就有三十多个，卖石榴的妇女、买花布的姑娘、吃哈密瓜的老人、头顶馕盘叫卖的巴郎、赶着毛驴车赶集的小伙子……他们的瞬间姿态，个个生气勃勃、栩栩如生，似乎就是活生生的维吾尔男男女女信步走进画中。当年街市上的建筑物也逼真地进入画卷。这是一幅人物复杂组合的历史画卷。

徐庶之在和田深入生活期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和田地区本来就贫穷困难，这时农村生

活更为艰苦。他住在维吾尔族社员家里，同他一起下来的一位画家因营养不良，体质衰弱，患传染病后未能抢救过来，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对徐庶之深入生活不能不是个打击，但他没有退缩，掩埋了同伴之后又远去于田。

在于田深入生活期间，一个历史故事引起了他极大兴趣。相传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应诏返长安途经于田时，于田人拦马恳求说：“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他抓住这一题材，一幅反映新疆与内地关系及民族团结的历史画卷的构思形成了。为准确表现画中历史人物形象，他研究了塔克拉玛干出土文物中的汉代服饰、木乃伊的颅骨，创作了《阻归图》巨幅画卷。铺展在画面上的是，汉使班超及随从骑马来到于田城，于田王率官员及平民阻拦前行，有的拦住马头，有的抱住马腿，哭泣着恳求班超留在西域。画中把于田人挥泪恳求的神情表现得逼真动人，观之令人动情。这幅画完成后作为新疆历史博物馆成立礼品挂在正厅。它反映了新疆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

徐庶之完成的每幅创作，都流露出他对新疆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的赞美。这从他许多画的命题就表现得很明显。如他创作的《天山南北皆春色》、《塞上无处不入画》、《最是塞上春好处》、《瀚海天山别有情》、《展图我欲从君问，江南无此好风光》等等，这些美好的命题连同他的画，表达了他对新疆的山川风光和民风民情的挚爱。《和田巴扎》这幅巨作后来参加全国展览时，他又补题了这样的文字：“和田位于叶尔羌水滨，民风朴实，物产丰饶，巴扎交易之盛，人物众多，笑语喧声，形象生动，冠于新疆各地，正所谓不去和田，非到新疆，不到和田巴扎，若未见维吾尔也。”短短数语，道出了他对和田的深情。



徐庶之（左）与本文作者

徐庶之摘掉右派帽子后，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脚不停，手不闲，几年内跑遍天山南北，画了数百幅新疆风情写生。许多参加展览和在报刊发表后博得国内外人士赞赏的名作，都出于这几年的写生。由于他艰苦深入生活，对他追求的塞外风情题材有深刻了解和表现手法的成熟，因而能随心所欲地表达创作目的。他的边疆风情画既无似曾相识的画谱气，也无学院派所崇尚的笔墨痕迹，他的画古朴清新，气势天然，充满生活情趣，笔墨淋漓，粗、狂、僻、涩浑然一体。美术评论家王宁宇在评徐庶之这段时间创作的《和田巴扎》、《阻归图》等巨幅作品时说：“这时在人物形神刻画上，在清丽活泼的线描笔调上都达到了十分出色的境地。就新疆风情题材的表现而言，他已形成了足以与其师弟黄胄分庭抗礼各显千秋的个性特色。”

又一次沉浮

徐庶之又一次满怀激情实现他的艺术抱负时，又一次政治风暴

——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临了。几天之内，大字报在机关院子里贴了一大片，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等一大堆吓人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他没有料到灾难会又一次降临，惶惑和不安充满心头。不久，他的办公室和家被抄，多年完成的大量写生和画稿被抄走，挂在机关院内批判。有天夜里狂风大作，好多画被吹落到地上，有的撕破，有的弄脏，没有贴出来批判的一大沓画稿仍在库房汽油桶上，被漏下来的雨水毁了好多。这情景使他心如刀割。他痛惜自己用汗水和生命铸成的作品，竟遭到如此下场。一天，一位朋友悄悄送来一幅在墙角捡到的画，他打开一看，是《库尔班·吐鲁木见毛主席》的写生，他哭笑不得，左思右想，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批判这张画。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多少次的交待和检讨，他进了“五·七”干校进行第二次改造。

徐庶之当右派后，一直没有对人生失去信心，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然而“文革”开始以后，他

综观文化人的下场，心灰意冷了。他把干校作为自己的归宿，打算后半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他在干校木工组干活，对学木工手艺很用心，很快就学会做门窗、桌凳。他为自己买了一套锯、刨、斧等木工用具，买了一套种地用的工具。在工余时间自己制作了小板凳、木椅，打算再做一些家具后就把家搬来永远当农民。

在那个动乱年代，生活中经常出现戏剧性变化，有时让人吃惊，有时令人惊喜，但他没有料到这种戏剧性变化会发生在他身上。一天，新疆贵宾馆前来邀请他作画，说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让全国涉外宾馆都要挂上名人的国画，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他接受了邀请，认为这不过是个临时任务，并不能改变什么，他冷却的心并未因此而热起来。

时隔不久，更大的惊喜出现了，中央文化部邀请他前往北京作画。他抱着迷惑不解的心态来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友谊宾馆，进来一看，全国美术界好多名家也来了。文化部在这里包了一层楼，分批邀请美术界名家作画。华君武是这个创作组组长，告诉他们这是中央领导意图。中央考虑到许多老画家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受到很大冲击，现在多已年迈体弱，来这里一边休养，一边作画，给国家留下一批作品。文化部给他们提供了窗明几净、丹墨俱备的创作环境，生活上安排得很舒适，天天有美味佳肴。这一切使徐庶之不禁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冰消雪融春满园”之感。一股暖流涌进心间，他被折腾得冷却了的心复苏了。

徐庶之怀着感激的心情投入创作。他长期在边疆的生活积累和构思，像开闸的渠水一泄而出，天天有新作，幅幅有新意，多年的艺术磨炼这时得到充分发挥，令四座大为惊讶，始知徐庶之系西域风情画

的妙手。此后，首都机场、各大宾馆、中国画研究院、驻外使馆相继邀请他作画，一时应接不暇，名噪各方。他的创作又进入一个旺盛时期。他除多次应文化部邀请赴京作画外，又再次到伊犁和阿勒泰地区深入生活，完成了大量风情写生，创作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他创作的《闹春》、《烹茶图》、《早晨》、《天山脚下》、《冰雪万里响驼铃》等作品，先后参加了自治区和全国展览，有的在自治区和全国获奖，有的出国展出，有的被中国美术馆和日本、澳大利亚收藏。这些画充满浓郁的西部色彩。《烹茶图》写尽了密林深处的幽静，几乎叫人在湿润清新的山林中闻得出茶的香味。《闹春》表现的是春到阿尔泰山，画面上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儿头野熊在寻食。人们知道，熊一到冬天就钻进石洞冬眠，直到闻到春天气息才出来觅食。作者这一奇妙的构思，使《闹春》既不同于江南红杏枝头的闹春，也不同于北方喜鹊、燕子的闹春，而是通过蛰伏了一冬的野熊点出春天的到来。艾里先生在评述徐庶之这些作品时说：“用中国画笔墨表现西域题材较为充分而艺术风格趋于完整者，当推徐庶之，当然也还会有许多后来者超越于他，但徐庶之毕竟是开创者

和这一画派的中流砥柱。多年来，是他众多的创作使画坛上呈现出一派西域风情面貌，使天山、阿尔泰山、帕米尔高原的身姿，戈壁、绿洲、牧场、园林的景象，一一摄入到高雅的中国画卷之中”。

徐庶之投身边疆美术事业整四十载，在这40个春秋中，他并非完全沉溺于自己艺术创作之中，他为办好画报，为开展群众美术活动，为培养人才，为筹备新疆美协，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他是新疆中国画组 and 新疆国画院的开创者之一，更是功不可没。对社会公益事业，他都是以极大热情予以支持。他为残疾人基金会、“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和多家报纸、纪念馆捐赠过作品；全国教育基金会举行义卖画展时，他献出七幅佳作表示自己心意；1990年举行亚运会时，他以4尺巨幅画卷相赠；毛主席纪念馆有他创作的《万年长青》巨幅画卷；蔡元培基金会由他创作的《塞外鸣驼走天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他总是竭尽全力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以示自己的诚心。

晚年的愿望

近年来徐庶之因年迈体弱，已

不能深入下去去写生作画了。但他初衷未改，开始整理多年在新疆的写生。他一搜寻，连自己也十分吃惊，除被毁坏和丢失的外，用彩墨完成的写生竟达几大卷。这些写生真实地描绘了50到60年代新疆农村、牧区人和自然的面貌，有的不需加工就是一幅艺术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人物为对象，有单人全身像、多人群像和头像集锦。这些人物的外貌、服饰特征和他们的神情气质都是原生象态，生动、逼真地记录了当年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人的面貌。西安美术界朋友看了大为惊讶，说这些写生不仅是珍贵的艺术品，还具有民族学的文献价值。当年的自然环境、一个个环境中的人，他们的生活习俗、气度与服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只能从艺术家的画卷中才能看到。

徐庶之想把这写生结集出版，留作供人们研究的资料。但他一联系，这些写生全部出版，得花几十万元。这么多的钱从哪儿来，谁能认可它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慷慨解囊呢？他茫然了。不过，他还未灰心，正在努力争取实现他的愿望，把这些写生作为他晚年对社会的奉献。但愿他的愿望能早日实现。

(责任编辑 方实)



在长期尖锐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总结了一条重要经验：“对敌狠，对己和。”

当代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革命战争。打起仗来，我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我们也“优待俘虏”，那是因为这些敌人已经放下武器，我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也是为了摧毁敌人的斗志，有利于消灭还拿着枪的敌人。

对自己，以至对同盟军，我们总是亲密团结，拧成一股绳，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以少胜多”，己和利于制敌，这种战例不胜枚举。

一旦违背了这个战略思想，必犯大错误，招致严重恶果。历史上，认敌为己的事不多，将己作敌的事却发生多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根据地（当时叫苏区）和红军中错误地“肃反”，有的地区、部队被错误伤害的党员干部远超过战场上牺牲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黑白颠倒，林彪、江青之类竟也被视为“己”，倚为股肱者有之；而把大量好干部误为“敌”，肆意摧残者有之。“文革”十年，被硬刀子和软刀子杀伤者数字惊人。

谢天谢地，从领导角度看，从战略思想看，这种敌我颠倒的悲剧是过去了。这是我们党更加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日趋改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广大群众对此极为满意，说“好是真好”；另一方面，各种腐败现象严重存在，又使群众痛心疾首，说“坏是真坏”。几个数字十分惊人，据报载：1994年，因腐败受司法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 3854 人，1995 年 5333 人，1996 年 6358 人，1997 年上半年即达 21000 人，其中厅、局级干部 1673 人，省、部级干部 78 人。这些数字说明了腐败现象逐年发展，但也说明了反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强。

现在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中的一个肿瘤。中央三令五申消除腐败，态度明确坚定，力度逐年加大，为什么腐败不仅没有扼止，反而有所发展呢？窃以为，现在对腐败问题不贴阶级

标签是很对的，但应根据事实，凡严重违法乱纪、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就是人民的敌人，就应该依法治罪，不管是官是民，不管大官小官，不管属何党派，不管其祖宗三代是何成分；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领导、组织不得干预，这必得到人民的拥护。

有些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观点，由于形势的变化，大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例如“难免论”、“学费论”。在革命事业初创时期，大家都缺乏经验，犯些认识性的错误是“难免”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交些“学费”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共产党执政已近五十年（从根据地算起时间更长），许多基本原则界限，例如：应该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不得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对各种违法行为不得姑息、包庇；对下属犯法应视情况负不同连带责任，等等，广大群众都熟悉，都关心，干部——“骨干的部分”就不好说不知道了。最近山西朔州发生的毒酒案，几个主犯由于利益驱动，胆敢以身试法，已经受到应得的惩罚——伏法，很对。他们如此胆大妄为，是否有人默许，甚至包庇？是否有人渎职放纵？我认为都应该认真查一查，根据查明的情况，给予必要的教育和必要的处理，为连带犯法者戒。

我们国家不大提领导责任和连带责任。不能说犯法者的上级和有关人员对任何案件都有责任，但也不能说对任何案件都没有责任。“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有些案件，群众是知道或感觉到与作案者的上级或其他“保护伞”有关系的。报载，有的人犯了错误或犯了法却易地作官甚至升官，不知确否？我觉得至少应该根据报上提供的线索去查一查。现在我们国家是“盛世”，我认为治“盛世”也要用重典，因为这是健全法制的必要手段。

（责任编辑 方实）

我看『对敌狠，对己和』及其他

● 李庄

戊戌变法的夭折

● 张建伟

光绪皇帝发了一句牢骚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3月的一天，当政的光绪皇帝发了一句牢骚。他说：“如果还不给我办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此亡国之君！”历史学家把这句牢骚郑重地载入史册，作为光绪皇帝“坚定勇锐，立志变法”的前奏。

但这是一句迟到了四年的牢骚。

四年前的1894年，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兵舰在海上相遇，惨淡经营二十多年、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居然一触即溃，全军覆灭，随后割地赔款，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日本几乎一直师宗中华帝国，而今竟是学生打败了老师！不能接受，不可思议。原因何在？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响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如此！

谢天谢地。仿佛心有灵犀，光绪皇帝翘首仰盼的颐和园中传来了慈禧太后那柔中有威的声音：“变法乃吾辈志。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儿可自为之。”

一语定朝纲。

一帝一太后，一个要求变法，一个同意变法，各自踏上了从戊戌变法，到戊戌政变的103天漫漫长途。

慈禧太后发了三道谕旨

6月15日（变法第五天），慈禧太后把三道谕旨交给了光绪皇帝。

第一道：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

第二道：以荣禄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第三道：太后和皇帝将于本年秋季间到天津阅操，命荣禄预备一切。

那第一道谕旨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而是慈禧太后公开宣布：她从皇帝手里收回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



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

那第二道谕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命。直隶总督是一个疆臣，也就是一个“外臣”，但他不是普通的外臣，他是全国疆臣的领袖。北洋大臣更不是普通的大臣，他是掌握军队的大臣，包括掌管保卫京师的禁卫军。现在，你改吧，你有进行改革的所有权力，但我有控制改革的所有权力。

那第三道谕旨与第二道的含义同出一辙：“阅操”就是阅兵，阅兵是兵权所属的示威性举措。这是常识：只有真正握有兵权的人才有资格检阅军队。



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



维新派的著名代表梁启超

权欲在心要发芽

太后的这些想法,在光绪皇帝发了那句索要权力的勇敢牢骚后,就在心里发了芽。当时,她听到庆亲王的报告就大怒了,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

那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变法可能:

第一种,变法在皇帝的主持下和她的助动下取得成功。

第二种,变法在皇帝的主持下和她的反对下失败。

光绪只有一种选择:把变法的事业进行下去。

慈禧却有二种选择:让变法成功或者使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的直接起因,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后来的割地赔款,难道这对光绪皇帝是一件大事,对她慈禧太后就不是一个刺激?如果实行新政能使中国富强,使她的江山更加稳固,她干吗要排斥新政?慈禧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却不是一个眼光敏锐的思想家。她的文化有限,读书不多,而且又届63岁高龄,对西方知之不多。但是,大清朝引进西方的新法,始作俑者并不是那些后来的思想家,而正是她和一批赫赫有名的政治家。30年前,她就支持恭亲王引进洋务的做法;后来,在她的同意下,才有了曾国藩和李鸿章主持的轰轰烈烈的洋

务运动,即使在戊戌变法之中,这一运动也并未中止。她不过要在变法中,希望给祖宗留点面子而已。这就是她的“改革限度”。百日维新前,光绪皇帝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答应光绪皇帝在“不违背祖宗大法”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变法,这是政治改革方面的重大许诺。

然而,慈禧反对变法的证据,似乎也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她不是在变法刚刚开始,就把人事和军队的大权操在自己手中了吗?

当我们面对慈禧太后这样的人物的时候,能否把她对改革的态度看得轻些,而把她对权力的态度看得重些;如果改革能增强她的权力,她为什么不支持改革?而如果改革要削弱甚或消灭她的权力,她又怎能不反对改革?

改革只不过是她的前台道具,权力才是她的生命之本。她放出了改革的烈马,但她随时准备收紧缰绳。

戴着镣铐跳舞

在改革的第五天就丧失了军权和人权的光绪皇帝,沉思着,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

他不是没有努力过,他有过反抗。但每次反抗,都在思想到行动的半道上,就被无情地扼杀。因此,那不能叫反抗,只能说是反抗的念头。

最早一次产生反抗念头是在他娶媳妇的那天。

一排淑女站在他面前,他手持玉如意走向前去,朝着他喜欢的珍妃。

忽然,他听到一声断喝:“皇上!”他吓了一跳,回头看,慈禧把她恶狠狠的眼光递过。他明白了,他不能自主地选自己的皇后。他只得选了一个他不喜欢、他的姨母喜欢的皇后。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他又有了又一次反抗,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句勇敢的牢骚。我们郑重地把它放在本文的开头,期待着它的下文。

于是,在慈禧拿走了军权和人权以后,历史给了后世史家一个意外的惊喜:光绪皇帝,只经过片刻惶惶不安的沉思,就再次扬起了他的头。他接连发出了两道朱谕:罢免翁同和;召见康有为。

满朝文武悚然一惊:皇上疯了!翁同和时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无论名份上还是实际上,他都是当朝的宰相;他还是总理大臣,管理着大清朝的外交事务;他也是户部尚书,手中握着朝廷钱柜的钥匙;他有会办军务之权,虽不能说掌握着军队,也算是半个国防部长;他还是光绪受读时的老师。如此权势熏天的大臣,首辅之尊,一朝遽罢,满朝岂能不惊?

翁同和完了,从此,他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退出,对整个戊戌变法,既不是一个损失,也不是一个好兆。它只证明了一点:戊戌变法,当它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助手的时候,光绪皇帝失望地发现,翁同和不是他所需要的人。改革也罢,建设也罢,首在用人。光绪皇帝急切地寻找着这个人。当他罢免翁同和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比翁同和强百倍的人,这就是康有为。

最重要的是:翁同和被罢和康有为受宠,给戊戌变法的事业上,罩上了一层吉凶未卜的阴影。

康有为亮 相紫禁城

6月16日(变法第六天),天刚刚亮,康有为就朝仁寿殿走去。这是他第一次进宫,有一种理想实现了的感觉。他在北京城里整整守了四年,等待的就是这一天。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幻想,就像昨天晚上,他在徐致靖的家里,他的学生们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所设想的那样:他要升官了,而且,他将取代翁同和的地位,成为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的旗手。他竭力使自己镇静,幻想还不等于现实,他还需要功绩,功绩!而他现在需要彪炳的最大功绩,就是说出像警钟那样响亮的,惊动一切的,摇撼一切的,让光绪皇帝赏识的,推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大业的话。

此时,荣禄已经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着全国的军队,包括禁卫军。康有为不知道的是,他能走进宫廷,荣禄的保荐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真的,康有为那时有如日中天的声望,翁同和说他的才能“胜臣十倍”,徐致靖(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长)具折上奏,请皇帝破格接见他。就是荣禄,这位被史家一致认为是“慈禧的鹰爪”的大臣,也保荐了他,这使史家至今感到迷惑不解。

但此时的荣禄已经后悔保荐了康有为。他对康有为说:“你有国家柱石般的才干,补救时局的方法是什么呢?”

康有为说:“没别的,非变法不可。”

荣禄说:“我当然知道一定要变法,但我国的法已经实行了一二百年啦,能一下子变了吗?”

康有为忿然地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啦!”

荣禄吓了一跳。他就是一品大员,而康有为充其量不过一个六品

的工部主事。而且,枪杆子、刀把子都在他手里,他都不敢说这么狂的话。他再不问什么,立刻请训出京,当天向慈禧太后辞行,并偷偷对慈禧说:“请老佛爷留神康有为这个人。”

康有为的这种狂妄之态,几乎被史家一致看好。就因为这段对话,康有为被称为“勇敢无畏的改革者”。但没有机智的顽固,就是愚蠢加荒谬。没有妥协的改革,就是不懂改革。一般来说,当一场个人的或社会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时,如果我们根据废墟上的断垣残壁探究这场灾难的根源时,我们几乎总是发现:一个庸碌无能、固执自信而又自鸣得意的人盲目地造成了这场灾难。

“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思想?他有。他有数不清的思想,中西混杂的思想,而且他认为,他的思想比一切别人的思想都高明。但思想不是刀。难道他真的认为,一切思想犹如面团,只要揉和得好,什么东西都可以捏得出来,例如,一把刀?

还有信仰。他坚定地相信,他是受着信仰支配的。多少年了,他要自己承担的时代任务就是要把新东西的火星,吹成熊熊大火,那是理性之火,他先在自己身上、自己学生的身上燃起,以便让举国的蒙昧无知的人们看见他们。五年间,他领导中国的举人们进行了五次公车上书,已经把他们的这种信仰“打”进了皇宫。但所有的改革史都告诉我们:仅仅有信仰是不够的,还要有把信仰变为现实的理智力量,否则,一切知识分子紧张繁忙的改革呐喊,便统统成了心力智慧之光的徒然耗费。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一支笔横扫千军”从来都是他们的自恃。他们只有一颗心,但“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从来都是他们的自恃。

紫禁城里终于传出召唤康有为的声音:“康有为晋见啦……”太阳出来了。又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开场了。

一个皇帝和一个 知识分子的对话

他发现光绪皇帝对他很是亲切,首先询问了他的年岁出身。但康有为似乎急于表现自己的水平,不待皇帝询问,就一下子切入了正题。

康有为说:“眼下四夷交迫,列强都要分割我国,整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呀!”

光绪皇帝说:“这都是那帮子守旧的人给弄成这样的!”

康有为说:“皇上您很圣明,一眼就洞悉了病源。既然知道了病源,那么,我的药方就有了。既然知道我们的祸事和失败是守旧者闹的,那么,我们非得把所有的旧法都改变了,都给它们维新了,否则决不能自强。”

光绪皇帝说:“是的,今天我们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说:“这些年来,不是没有变法,但是,少变而不全变,变了一个而不变第二个,连累那个已经变了的也无功啦。这就好比一间宫殿,材料都坏了,肯定会倾覆,如果只是小小的弥缝补漏,风一刮来,终要倾压下来。必须拆了它,建筑一个新的,这样才可以住人。然而,要建新房子,则这间房子要占多大地方,有多高,砖石木料需要多少,窗户要多大,门槛要多宽,还有石灰呀,钉子呀,一竹一屑等琐细的东西,都得全局统算出来,然后拿这些材料施工,这间宫殿才能建成啊!



慈禧太后

哪怕有一个小缺憾,这间房子也建不成,当然也不能防御风雨啦。”

光绪皇帝说:“你说得很有道理。”

康有为又说:“数十年啦,所有的大臣都说过变法的事情,但他们所说的,都是仅仅变某一个方面,而没有尝试变及全体。其实,所谓变法,须从制度法律变起,这才叫变法呀。而今天人们所说的变法,是‘变事’,不是‘变法’。因此,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筹全局而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面变法律,这才于变法有益呀!”

光绪皇帝说:“你说得对。”

康有为说:“臣为变法的事情,把各国变法的成败经验都稽考了一遍,选择它们中的可以施行于我国的东西,反复斟酌,坏的不要,好的留下,使他们的经验可以在我国施行。章程呀,条文呀,我都给您准备好啦。如果皇上您决意变法,您只要采纳它们,往下推行就可以了。西方人说,三百年而治。日本呢,施行变法三十年而强大。我们中国地广人多,变法三年,就可以自立啦,此后蒸蒸日上,富强之势,可以凌驾

于万国啦!以皇上您这样的圣明,要图中国的富强,翻一翻巴掌就能做到啦!”

光绪皇帝说:“你说得对。”

康有为问:“皇上既然已经明白,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变法,反而坐致国家被人分割呢?”

这时,光绪皇帝胆怯地瞅瞅窗外,长叹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没办法,有人掣肘呀!”

康有为明白了,知道光绪皇帝畏惧的是慈禧太后,便说:“就皇上现在的权力,可以有权变的事情,就变了它,这样虽然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变了,但变了主要的东西,也就可以救我们中国啦。只是现今我朝的大臣,都是又老又守旧的,对外的东西,一点不懂,皇上您要依靠这些人变法,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啊!”

光绪皇帝说:“唉,这些大臣,都不留心办事呀!”

康有为说:“倒不是大臣们不尽心办事。只是他们这些人,是依靠资格一步步爬上来的,等身居大位时,精力已经衰竭,又管着好多事情,没工夫读书,要他们不守旧也没办法呀。所以,他们过去也奉皇上的旨意,办学堂,办商务,可他们小时候没学过这些东西,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因此,皇上要想变法,只有把那些年龄不大的小臣给升了官,只要有人推荐,就予以召对,察察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才能。皇上您亲自提拔他们,给他们爵位,给他们赏赐,破格录用。现在的军机处和总署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差事,您就用京卿、御史这两种官好啦,让他们分别担任内外的差事,这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啦。至于那些旧大臣,用不着使用他们,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好啦;至于他们事事守旧,没关系,请皇上您多下诏书,告诉他们您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就可以啦。今后,凡是变法的事情,都要特别下诏,让这些守旧的大臣不敢驳议!”

光绪皇帝说:“就这么办。”

但这次召见却没给康有为升官。他在三年前就已经是工部主事,一个小小的官职。他和他的维新派们都指望皇上给他升个大点的官,但看来光绪皇帝没有这个意思。史载,这使所有的改革者都深深地失望了。按说,二品以下的官职,光绪皇帝有权独定,但为什么对据史家说“他最宠信的康有为”却没给个大点的官,而且,不仅这次召见后没给,以后也没给,始终是个无法解释的谜。

但闻新人笑 哪管旧人哭

一百多天的改革,颁发了一百多道改革谕令。改科举,兴学校,办实事,改兵制,精简机构,保护传教,这些都是实的。虚的也有不少,例如,教育大臣们,不许因循守旧;警告各衙门,不许无故请假;希望官员们,认真学习时务和外国的新观念;号召各省疆吏们,要让皇帝的变法谕令做到家喻户晓。史载:“数十日间,联翩而行之新政也,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

几乎每一道改革令都要求“速办”。各地的官员们都被搞蒙了。他们就是领会这些改革的意图都来不及,更何谈“速办”。

怎么办呢?有办法。光绪皇帝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法,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抓先进,促后进”。

所有的这些改革,慈禧太后都支持,尽管常常提醒皇帝“不要太性急”。

于是,光绪皇帝变得空前勇敢起来。8月30日(变法第79天),光绪皇帝发下一道重要谕旨,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及三省巡抚。

9月5日(变法第85天),光绪皇帝发布了令后代史家欢欣鼓舞的一道最重要谕旨:任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

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四人实则成了四位新宰相，而原来的军机大臣形同虚设，被冷落在一旁。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史上，这道任命是光绪皇帝的一大发明。他觉得他做得好聪明！不是二品以上大员的实际任命权在太后手里吗，那好，我就只任命三、四品的官吏，可我不让一、二品大员干事情，所有的事情让这些三、四品的官儿们干，这总可以吧！这聪明的措施，使康有为们在朝廷被孤立了。康有为们欢欣鼓舞，以为是皇上的特恩，是他们把持朝政的无上权柄，也果然就这样干了。但他们忘了，专制国家的专制，不仅是个人的专制，也是法典的专制。按照法典，你皇上可以任命的这些三、四品的官儿都可以随便上朝，那朝廷还不成了自由市场！

以后的事情我们在影视文学中见得多了：整个朝廷所有的一、二品大员几乎全跑到颐和园去了，“环跪于太后之前”，个个痛哭流涕，“请老佛爷作主”。按照制度，他们才有述旨和呈旨的权力，而现在，他们并没有被罢免，可所有的权力在一夜之间就全没有了。眼睁睁地瞅着四个年龄只有二三十岁的“小秘”摇头晃脑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走来走去，呼三吆四。

问题是，光绪皇帝任命了四位章京后，才知道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四位章京官只有四品，没有上朝的权力。他们有权力处理奏章，也有了可以述旨的权力，但他们不能直接面对皇帝。一切奏章，不通过军机大臣，却还要通过总属代递。于是，皇帝专设了两名“传递太监”，还有三名守宫门的太监是“自己人”。那些康有为们的改革建议、上谕草稿，就是这样写出来，传到皇帝手中的。

《密诏》疑云

光绪皇帝给杨锐的《密诏》是这

样写的：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余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谕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臻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光绪皇帝肯定没有想到，正是他这道《密诏》拉开了从戊戌变法走向戊戌改变的序幕。从《密诏》的内容我们可以分析出来，皇帝的本意是想避免政变，将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并且使用“自己人”，同时，把那些老臣，即“老谬昏庸大臣”尽行罢黜。但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不得得罪慈禧太后，《密诏》中提及的19日朱谕”就是因为王照案而“尽罢礼部六堂官”的事情，慈禧知道这件事情后不高兴了，认为皇帝对大臣的处分太过分了，因此批评了光绪。现在只有让他刚刚任命的军机四京卿帮他拿个主意，一个在妥协中进行改革的办法，中心思想是与慈禧太后、他的“皇爸爸”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皇位，千万不能让政变发生。根据史料，杨锐和四京卿进行了紧急磋商，但没拿出什么好办法。随后，这件《密诏》传到了康有为手里，他们再次磋商，而且，有过一次甚至几次针锋相对的争吵。

争吵的关键是：放慢一点改革的步伐，使改革不至于激怒太后，并且把改革的桂冠戴到慈禧的头上，以利于进一步的改革；还是坚决不妥协，甚至在没有兵权的条件下，以康有为等一批无拳无勇、空有血性的气盛之人发动一场旨在“废后”的运动！如果不带偏见，我们应该得到这样的结论：前者的改革，虽然带有保守主义色彩，但不失为正确的改革之路；后者虽然激进而且悲壮，却只能断送改革的前途和改革者的生命！

多么不幸，康有为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他给光绪皇帝上过这样四条《密折》：

第一条，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在朝廷设立参谋部，这实际上是康有为要皇帝夺掉荣禄也就是慈禧的兵权。

第二条，改变年号。建议把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这实际上是要光绪皇帝甩掉慈禧，自立山头。

第三条，变更服制。这更是针对慈禧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慈禧的改革限度是“不违反祖制”，其中就包括不能“变更服制”。

第四条，迁都上海。北京暮气太沉，只有迁都上海，才能有利于变法。康有为一定要通过这种激进的办法，达到他在“变法”中“变政”的目标。障碍只有一个，就是慈禧太后“那个不可造就的东西”！

戊戌变法的历史走到这里被浓雾笼罩了，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杨锐带出的这份《密诏》不见了，直到1909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双双殡天后，这份《密诏》的原稿才重见天日。

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在戊戌年间，被康有为拿着去鼓动袁世凯造反，去呼吁外国人到中国来救光绪皇帝的《密诏》，是康有为亲笔伪造的《伪诏》。

康有为的《伪诏》是这样说的：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对这份《密诏》，其伪造的小地方可以不论，有两处必须指出：一，康有为把皇帝交给杨锐的《密诏》伪造成是交给康有为的；二，光绪皇帝的原诏是要杨锐等人想办法是不得罪太后，以便改革顺利进行，而康有为的《伪诏》把这一层意思完全颠倒，伪造成光绪皇帝要他康有为“设法相救”。

这不是一般的伪造，这不仅使戊戌变法寿终正寝，而且导致了政变的发生，直到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在历史中，我们总是预料到世界上的一切，就是预料不到本身应当发生的事情。康有为，在他的身上，有一切的开始和一切的终结。

政变：三审 光绪皇帝

无论如何，戊戌政变真的发生了。

是在9月21日的凌晨，史载：“今日政变，诏自今日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是日，太后又幸颐和园。”就这样简单。从本义来说从来都是惊心动魄的政变，在慈禧太后的手里，好像只是一场小孩子的游戏；老太后只不过到皇宫里打了个招呼，说：从今天开始，这个国家又归我管了。然后就真的归她管了。然后，她就又回顾和园去了。这就是戊戌政变。

事情当然没有这样简单，但也并不复杂。政变嘛，总要有政变的理由。因此，一场政变的“戏”总是要演一演的，那就是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审讯。

发言的首先是慈禧，疾声厉色，询问皇上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么敢任意妄为！诸臣者，都是我多年历选出来的，留以辅佐你的，你怎么竟敢不用他们！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康有为是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是多么昏愤，多么不肖呀！”

9月22日（政变第二天），慈禧太后又单独审讯光绪皇帝。这一次。她似乎要解决的是“家法问题”。

然后，慈禧便离开了瀛台。这瀛台在西苑湖中，四面环水，只有一桥通陆。太后走上桥时，对李莲英说：“今后，皇上就住在这里。你选几个妥当的太监，服侍皇上。皇上以前所用太监，细细审问，有罪的处死，没罪的逐出宫外。”

所谓史载光绪皇帝被囚瀛台，始于此时。

9月23日（政变后第三天），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今日行临朝训政礼，当然是大喜事。所以满朝花衣锦簇，颇有气象万千之态。

但慈禧太后似乎一定要在这样的场合表明她的心迹。当着王公大臣的面，她再次审讯了光绪皇帝。面对群臣，大声说道：“这是从皇帝书房里和康有为住的地方找出来的东西！我要大家来看看。皇帝几次对我说，要变法图强。想国家富，谁不愿意。不过，变法可不是随便的。本朝最重家法，祖宗的成宪，哪里可以不守。我当时对皇帝说：‘只要你不改服饰，不剪辫子就行了！’这话的意思，谁都明白，是劝皇帝别闹得太过分！哪知道皇帝竟听不懂，也许听懂了，为了和我怄气，索性大大地胡闹！”

慈禧坚定地说道：“这几个月，是国家的大不幸！从四月以来，乱糟糟的一片，如今一定要切实整顿！你们把这几个月的新政谕旨，按日子先后，列个单子送来我看。另外，

康有为一党，决不饶！”

戊戌政变后的第一次临朝训政就这样结束了。

又过了两天（25日，政变发生后的第五天），谭嗣同等四京卿被捕。

又过三天（28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戊戌后事

日本维新人物伊藤博文在政变发生后不久，就回到了日本，公开做了一次关于戊戌政变的演说。他说：

“今试论中国内政，于9月下旬有政变之事，那些维新党……之所为，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我早料到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改掉的吗？他们还需等待有英迈逸群之皇帝出来，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才能创立一大英业。”

康有为幸亏跑得快，政变前一日就登上了日本船，飘洋到日本去了。他改写了皇帝的密诏，把诏书中的内容——光绪皇帝让他们想一个办法，既能使改革顺利进行，又不得罪慈禧太后——改写成光绪皇帝让他康有为到外国去搬救兵，杀到北京来救皇上。

他的呼吁从来都没人理睬。

而康有为逃到日本后的命运，众所周知，也是没过多久，他本人就被日本政府“送出了国”。从此，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他一直在美国、欧洲流浪。

但尽管如此，康有为先生的理想——帝制与改革相结合的理想，从来没有消失过。辛亥革命后，同样的理想被史家称为保守的，耿耿此心，永远停留在戊戌年间。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炎黄春秋



1954年，许世友、陶勇等在“南昌”舰上



1998年，任仲夷(左)接受李振盛采访

我拍摄的“文革”纪实照片主人公任仲夷
田家英临终袒露心迹的见证人
师复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徐庶之泼墨天山写风情
何忍“南昌”舰永沉海底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